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2011

译者是谁?: 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

Wenji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ran_etd

Part of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文静 (2011)。译者是谁?: 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 (博士論文, 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tran_etd.4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译者是谁？
——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

李文静

哲学博士

岭南大学

二零一一年

译者是谁？
——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

李文静

此论文为翻译哲学博士学位课程之部分要求

岭南大学

二零一一年

论文撮要

译者是谁？ ——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

李文静

哲学博士

近年来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如文化翻译、后殖民、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翻译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等，或多或少都与译者身份及其认同的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身份的概念在翻译研究中虽被一再提及，却仍缺乏清晰的界定，有待深入探讨。

通过借鉴并整合社会心理学有关身份理论的假设和分析，本文在梳理评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译者身份进行动态分析，由此提出译者身份的三种类型，即角色身份、群体身份和个人身份。本文首先从社会角色入手探讨译者的角色身份和角色期待与阐释，以及翻译角色间的互动对话等相关问题，提出翻译主体间的角色互动以内部多重对话为主要形式，译者则通过角色扮演达成内部对话。随后，本文以性别身份为例探讨译者的群体身份，运用身份选择理论讨论在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译者性别身份的不同表现形式，并特别考察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性别表演行为。再者，本文从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角度出发讨论译者个人身份，以从事翻译活动的作家为例，系统阐述了译者在再创作中表现出的与原作者之间创作与模仿的杂合冲突。随后，本文的重点转移至考察译者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重新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阐释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提升自我文化身份的倾向，说明集体身份的改写与译者的个体认同的密切关系。此外，译者身份的社会期待与个体内化、身份杂合、多重身份的承诺和选择、身份表演、角色对话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亦有所涉及。

除了借鉴和改造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理论并应用于翻译研究，本文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 D.H. Lawrence 的《狐》的三个中文译本的平行对比，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现象和文本分析，《无题的风景》英译的译者注释分析，以及互联网自发翻译现象分析等，不仅作为对本文所提论点的有力支撑，同时还有助于扩展、深化和强化相关的理论话语。

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本论文为原创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适当注明出处。

(李文静)

二零一一年二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译者身份	12
第一节 翻译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特征.....	12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中的身份概念与译者身份.....	18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整合途径.....	26
第二章 译者的角色身份与翻译对话	32
第一节 译者角色身份的内涵与实施.....	32
第二节 翻译角色间的内在多重对话.....	38
第三节 互联网翻译中的角色互动.....	49
第三章 译者的群体身份——性别身份的选择与表演	56
第一节 女性主义者还是译者？——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选择与承诺.....	56
第二节 译者的性别身份表演.....	68
第三节 《狐》的三个译本中译者的性别表演	76
第四章 译者的个人身份——作家译者的创造与再创造	91
第一节 参与翻译活动的作家.....	91
第二节 《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译者个人身份的凸现.....	98
第五章 文化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改写	110
第一节 文化身份与翻译.....	110
第二节 《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文化身份认同与改写.....	119
结 语.....	136
征引及参考书目.....	141

致 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孙艺风教授和陈德鸿教授。从选材构思到写作,从谋篇布局到修改结稿,导师悉心指导和不懈支持是论文得以完成的根本。陈德鸿教授对论文初稿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批阅。孙艺风教授不但在学术上,更在人生发展上的为我指明方向。导师的指导构筑了我今后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谭载喜教授于百忙之中担任校外评审,他对论文修改提出的意见让我受益匪浅;考试委员会的张南峰教授和龙惠珠博士不但对论文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建设性意见,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出其中的错漏之处,在此我深表感激。

感谢黄伟仪博士、唐文博士、陈美红博士、吴萼洲博士以及翻译系的各位老师,他们在开题报告和论文报告会中提出的问题,让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研究。感谢翻译系的秘书陈彩云女士和赵玉婵小姐,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离不开她们的帮助。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穆雷教授,是她为我打开了学术研究的大门,在我最消沉懈怠的时候,常常是她的鞭策与激励让我振作精神。感谢师兄李波博士,他无比耐心的倾听和宽慰伴随了我四年,帮助我渡过种种难关。感谢好友李红玉博士,她的乐观积极是我最好的榜样。感谢我的同窗好友陈丽娟博士和彭勇穗博士,感谢与他们并肩渡过的每一天。在这个起跑线之后,愿大家都有更美好的未来。

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亲友家人。远方的父亲默默支撑着我的前行。挚友王璐十一年来伴我走过了生命中的每一步。先生汪盛和他父母的理解和关爱是我心中最温暖的部分。感谢我的先生汪盛,他对我无条件的爱与支持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感谢他与我共同承担学业的艰辛和人生的风雨。谢谢!

绪 论

为什么要研究译者身份？

本研究以“译者身份”为研究对象，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取译者身份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对译者身份研究的兴趣首先产生于对译者主体研究的关注。所谓身份一定是附属于某主体的身份，而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从这方面来说，翻译研究中对翻译主体——尤其是译者——的重视和强调为译者身份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事实上，在翻译研究发展演变的进程中，译者主体经历了从被原作和原作者遮蔽，到被发现和重视，直至高扬，赞同乃至鼓励操纵的发展过程。在传统译论中，“忠实”和“对等”一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为达到这样的标准，译者被要求要尽量压抑自己的声音。而且翻译研究也大多是通过对比原文来寻找译作的不忠实和“缺陷”之处。从翻译理论的角度而言，译者的主体形象被遮蔽已久。而从翻译职业的角度来看，译者同样是被忽视的一群，译者作为一种职业被放置于作者之下的地位，被读者和评论家所忽视。然而事实上，翻译实践的译者从未停止过其作为主体的存在，译者从来都是翻译行动的主体。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暗中进行的还是公然宣称的，甚至是言行不一的，译者主体意识的存在和实现始终都是译者完成翻译任务的前提。¹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的目光由文本转向社会和文化因素，翻译活动中人的因素逐渐受到重视，译者这个在翻译过程中最为活跃的主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描述性研究方法的出现，也使得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译文缺陷论，开始发现译者的重要作用，译者的主体随之得到凸显。近十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领域内涌现出大量的论文、专著和学位论文，从各个方面入手讨论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性的问题，表现出对译者的主体的重新发现和强调。Susan Bassnett 在回顾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翻译研究发展的情况时认为，从 1965 到 1975 年翻译研究的关键词是“对等”，七十年代后期是“历史”，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化”成为主导，到了九十年代，文化转向之后的关键词就是“可见

¹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某些翻译任务中，如外交翻译、法律条文翻译等，存在着译者的主体性被降到最低，乃至完全消失的情况。本文的探讨始终围绕着文学文本的翻译而展开。

性”(visibility; Bassnett 1998: 108-111)。所谓“可见性”，指的就是译者主体从“隐形”到“可见”的变化。这一点，从 Lawrence Venuti 的《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4) 和 Douglas Robinson 的《译者的转向》(*The Translator's Turn*, 1991) 这两部著作的题目中就可见一斑。这些著作在推动翻译理论界对译者作为翻译实践主体的重新认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相对于原有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以及其它的许多理论流派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译者的地位，如翻译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改写和操纵的观点，后殖民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中权力政治关系的研究，都极力彰显了译者的主体作用。然而，在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包围之下，尽管译者主体的角色和身份经常会被提及，但常常是面目模糊的。如上文提到的Venuti的《译者的隐形》，尽管书中特别关注了译者在有关翻译的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变化，试图说明在“透明翻译”的标准下译者被忽视、被迫隐身的历史与现状，同时提倡异化 (foreignizing) 的翻译策略，强调作为弱势文化的原语语言和文化身份、以及译者本身的显形，以达到突出文化差异、抵抗强势文化和语言的霸权的目的。但是，Venuti更多关注的是翻译所牵涉到的集体文化身份的建构与重建，以及非英语的弱势语言在翻译后的可见性，他所说的身份是目的语或源语文化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²。相对而言，译者个人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认同并非是他所考虑的重点所在。诚然，如Venuti所言，翻译具有建构身份的力量 (Identity-forming power of translation; Venuti 1998: 68)，但研究者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译者的身份是影响甚至暗中左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进行判断、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外，Venuti 所讨论的译者“经常被假定为目的语文化的一员”(Schäffer & Kelly-Holmes 1995: 8)，是把英语译入其所属的弱势文化语言的那一群译者，其文化身份和立场是预先给定的，其身份和文化心理的复杂特性并未得到充分考虑。事实上，Venuti 对异化翻译策略的提倡就是基于这一假设之基础上的，似乎所有译者，无论其认同的是哪一种民族或文化身份，都应投身于异化翻译

²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文此处所说的集体身份 (collective identity) 指的是某群体共同拥有的身份，在第五章讨论文化集体身份时会再次出现。称为集体身份是为了区别于本文第一章和第三章所探讨的译者的群体身份 (group-based identity, 即 group identity)，后者指的是译者个体基于对某群体认同而产生的自我身份。二者虽相互依存，但所指并不相同。

的事业之中，而忽略了翻译策略选取中所涉及的译者个体因素。设问，如果译者是赞同并推崇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是否？异化的策略并不一定就是所有译者所情愿的第一选择。译者的立场、态度、自我认识和定位等种种社会心理因素不恰恰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之一吗？因此，可以说 Venuti 的译者仍是一个相对抽象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隐形的”。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研究范式使被遮掩的译者主体得以显现，但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译者主体被当作译语文化中一个抽象符号，受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解读和支配”（段峰 2007：65）。上述的论断虽略显偏激，因为译者不但并非完全受到这些外在因素的支配，而且可能会以某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对原文进行挪用和操纵，但从翻译理论的层面来讲，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在多元系统、目的派、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等翻译研究方法中的译者更多是一个抽象符号或群体形象，作为译者的主体因素被淹没在目的、规范、文化等概念之中，被默认作毫无保留地认同其所属文化的主体，其自我主体迷失在集体身份之中，译者自我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

当然，如果说文化转向中的所有翻译研究对译者个体都缺乏关注也是不公平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以对译者个体性别体验的关注而颇具特色。后殖民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九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建构，这两个流派都与身份认同问题紧密相关，但二者所关注的身份又各有差异。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的是发生在翻译中的各个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为此提出抵抗式的翻译策略。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从性别权力关系入手，认为译者/女性跟作者/男性相比，都处于权力阶层的底层，是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因此力图通过理论建构和翻译策略在语言和现实层面颠覆性别等级关系，彰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翻译观都是以身份认同（民族文化身份、性别身份）为出发点，希望能够通过理论的建构和特定翻译策略的应用，达到不同身份间平等对话和多样共存的目的。在这里，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对于翻译立场和策略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后殖民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对待译者主体方面有所不同。前者更注重翻译活动中集体身份的体现，而相对来说忽略译者个人的身份，个人只是集体的一个代表，因为在其理论预设中，译者的身份是从属于其所属群体的文化身份的。而女性主义

翻译理论则更侧重于译者个体的性别身份，当然这也并不违背女性群体身份这一背景。这种倾向与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女性的个体体验是相关的，女性主义以这种个体的体验来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个性的抹杀，强调差异与身份。另外，由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早就源自于女性主义者对自身翻译实践的理论反思，重视作为女性的译者在翻译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心理体验，因而带有强烈的个体特征。

如上所述，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译者的主体被淹没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中而失去了主体特性，然而，需要警惕的另一个方面是单独强调译者的个体性所带来的危险。Robinson 的《译者的转向》(*The Translator's Turn*, 1991) 和《谁在翻译?》(*Who Translates?* 2001) 这两部著作以译者作为其研究的中心，强调译者的个体作用。为了摆脱西方语言科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反抗西方主流翻译思想的二元论、工具主义、完美主义倾向，Robinson 提出了翻译的“身体论”(the somatics of Translation)，强调译者翻译的“本能”和“感觉”，希望以此唤起翻译理论界对译者作为翻译实践个体的重视和重新认识 (Robinson 1991)。Robinson 对译者主体不遗余力的强调为提高翻译研究中译者的地位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研究译者个体的“本能”并不能解释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特征，正因如此，所谓的“身体论”在学界应者寥寥。事实上，Robinson 如此强调译者个体经验的重要性，也无法否认集体经验带来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体验的普遍性，他将所谓的“个体经验”(individual experience) 定义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经验 (individual or private or personal experiences) 和我们早年被灌输的集体经验 (collective experience) 相结合的产物 (1991: 32)。尽管 Robinson 也体现试结合翻译的社会性因素的努力，但他的论述还是基本围绕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掘而展开，存在着忽视翻译社会性一面的危险。

抛开具体的语境讨论“主体性”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查明建和田雨将“译者主体性”界定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2003: 22)。固然，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核心在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文本或其它途径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与其它的因素相关联的，其中既有外部的因素（如时代

背景、意识形态、两种语言的特点、翻译规范等)；又有译者主体的个人因素(如译者的审美创造性、对翻译活动本身和译者任务的理解等)；更有不同译者主体对这些外部因素的阐释和认同的差异，而这三个方面在身份这个概念当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因此，研究译者的身份，可以将译者置于社会、文化和语言的语境之中，考察译者的能动性在这些语境中是如何作用于翻译活动的，同时联系译者主体意识，将会有利于我们深入分析主体的立场态度，以及其选择和决策的动因。

有鉴于上述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研究存在的问题，并考虑到“身份”这一概念的独特之处，笔者决定从译者的身份入手展开研究。所谓主体，在现实中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与其它主体或主体的集合(即群体)，以及语境等因素有着种种关联的主体。也就是说，所谓的主体在现实中是具有身份的主体。反之，任何的身份也都依附于主体或主体的集合，而不可能是凭空存在的。主体与身份是两个不可分隔的概念。身份与主体性一样，二者都是主体重要且不可缺少之部分。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具有某种或几种身份的主体，而身份认同的产生与再现也一定是与主体发挥自我的能动作用(主体性)相关，无论这种作用是主动做出的还是被迫产生的。

相对于身份概念，主体性的概念更偏重于自我感觉和想法，关注个体的自我感受。而身份则“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跟他人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Woodward 1997: 1)。因为身份涉及到个体跟个体，以及个体跟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乎主体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定位(position)以及对这一定位的接受情况，是主体同社会间关联的表现。Kath Woodward 在对“自我、主体和身份”三个概念进行比较时指出，

身份这一术语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它容纳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能动性(agency)跟社会建构甚或社会约束之间的复杂的可能性。(Woodward 2003: 3)

如果说主体性研究的重点在于译者自我的能动作用，那么译者的身份研究更为注重翻译活动中译者跟其他主体，以及译者跟社会和其它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关系。故此，从身份的角度切入进行译者主体研究，将会使我们更为全

面的思考译者主体的相关问题。

对“身份”概念的理解离不开一对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组合：同一与差异。“Identity”的词根是拉丁语“idem”(same, 相同的), 同源的还有另一个词“identical”。这个词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 不仅我们与自己是同一的(换言之,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同一的存在, the same being), 而且我们与他人也是同一的。也就是说, 我们之间享有共同的身份——比如说, 都是人, 此外, 在“人类”这个明显是无所不包的类别之内, 还有“女人”、“男人”、“中国人”“黄种人”等分类, 还有着许多各种各样的身份人们可以对之进行“认同”(identify)。差异, 是类别建立的另一个基础, 正是在自我群体(我们)与他者群体的相区别的基础之上, 自我分类(self-categorization)和认同才得以完成。同一与差异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构成了个体身份建立的根本。

差异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核心词汇之一, 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的差异, 如何在差异中寻求一致, 又如何在一致性中保留多样的差异, 这些都是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在翻译的范围内研究身份, 借助身份概念的引入, 将有助于我们推进翻译研究中对同一和差异的认识。此外, 在类别的同一和差异的基础上, 身份又具有个体的独特性, 也就是自我与他人的差异所在。从自我分类或认同的角度来看, 不同个体在同样的社会群体或角色中所获得的身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身份对于不同个体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我是学生”这一表述是对自我的归类, 但是仅此并不能告诉我们作为学生意味着什么。因为除了我们大家对学生这个身份公认的核心意义和期待之外(同一性), 每个人对学生身份的认同和内化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之上还存在差异(独特性)。因此, 本文中的身份概念结合了社会类别对身份的划分, 以及自我对于这种身份意义的认同和内化。

翻译一方面成为译者自我身份展现的场地——正是为此, 翻译吸引了众多译者投身其中: 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翻译某一作品, 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找到了某种共鸣, 或者这些作品能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些想说却无法直说的想法; 另一方面, 翻译也可能是译者超越自我身份, 扮演他者的舞台。Gayatri Spivak 在“翻译的政治”中提到了通过翻译超越自我身份的可能性:

写作论说文章时，一个绕过自己“身份”限制的办法就是拿别人的题目做工夫，就像运用一种属于众人的语言一样。而这，终究是翻译的诱惑之一。这是一出简单的模仿剧，模仿着自我之中的她者的踪迹。³（Spivak 2000: 397）

利用翻译的书写，人们可以绕开自我身份的界限，追寻自我身份之中他者的踪迹，抑或是在他者的话语中寻找自我。翻译中译者身份的表演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无论为了展现自我还是为了表演他者，译者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认同或排斥，都可能是其翻译选择的动因所在。从另一方面来讲，各种身份在经历翻译之后也都存在着被改写的可能，所以翻译也成为人们进行身份建（重）构的场所，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就是充分利用了翻译所具有的身份建构的力量。Sherry Simon 在《翻译中的性别》一书中指出，“女性主义理论的贡献之一在于，使我们理解到翻译像其它许多语言活动一样，也从事了多种同样积极的身份形成的过程”（1996: 164）。社会和个体因素通过个人身份对翻译产生的影响，通过译文也可能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而身份的改写就是其中一种可能，本文最后一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在对译者主体的理论追寻过程中，Sherry Simon（1996: 13）和 Douglas Robinson（2001）先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翻译？”（Who translates?）。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却道出了长久以来我们只关心“翻译”而忽视实施翻译行为的主要主体的状况。当然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我们已经无需担心这样的问题，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得到了肯定，“是译者在翻译”。这是毋庸置疑的也不容忽视的答案。然而，对译者主体的追问并不能就此止步，循着他们的论述，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进行翻译的人是译者，那么这个“译者”又是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译者？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回答的了。所谓“译者”并不是一个抽象的“the translator”，而是极具多样性的复数的“translators”。译者与译者之间千差万别，对于 Robinson 来说，译者就是创作者，是在翻译活动中充分发挥了主体意识的人的主体；对于 Simon 来说，这个译者可能是一位女性，这就意味着她作为女性译者的主体地位可能会表现在翻译当中；对于 Venuti 来说，这位译者代表了弱势文化群体，肩负着通过异化翻译策略去抵抗

³ 如非特别标明，本文中所引用的英文文献皆由笔者译为中文。

英语世界的帝国主义霸权的任务。区分这些译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们具有各不相同的身份。他/她们是带着这些身份来从事翻译活动的。无论是译者的性别身份、文化身份或是其它类型的身份认同，都有可能通过译者主体的能动作用影响翻译的结果。

研究范围与方法

在确立了以译者身份作为研究对象之后，本文的研究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然而，身份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构成了本研究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目前翻译研究范围内的相关讨论尚缺乏系统性和一定的理论根基，因此借助现有的翻译研究范围之外的有关身份的理论话语成为必要的手段。跨学科的借鉴与交流业已成为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本研究得以进行的最基本的方法。

考察相关的理论资源后（详见本文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笔者决定以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身份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在此之上构建译者身份的具体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的范围首先就包括了对社会心理学身份研究的相关内容的概览和分析。当然这样的回顾与分析并非是毫无目的的全面综述，社会心理学领域内针对身份问题的研究流派纷呈，对此进行全面的综述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因而在此领域内获取能够适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资源成为本研究的一个首要内容。此外，所谓借鉴本身就包括了对原有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思考，在理论借鉴的过程中，本研究不仅要在不损害原有理论完整性的同时选取与翻译研究相关的理论话语并应用于译者身份分析，还将在应用的过程中对原有的理论话语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也包括对不同流派身份理论的整合与调适。

理论层面的探讨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在身份理论的借鉴和应用的过程中，本文分别从译者的角色身份、群体身份、个人身份，以及国家民族的集体身份入手，结合身份理论与译者身份的具体情况进行探讨。在对译者身份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涉及到的种种相关话题构成了本研究的主体，这些话题包括译者身份的社会期待与个体内化、翻译角色间互动对话、多重身份的承诺和选择、性别身份表演、译者身份的杂合、译者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改写

等。此外，翻译研究范围内现有的针对身份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关于这些方面的述评本文虽无集中论述，但在各章中亦分别有所涉及。

各种具体的案例分析是论证和丰富本文观点的另一主要依据和手段。上述这些话题围绕着译者的身份展开，笔者在讨论的过程中一方面借鉴身份理论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另一方面又结合各种具体的翻译案例，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手段，来验证和丰富理论层面的探讨。本研究所采用的实证分析的材料包括孙艺风译《无题的风景》译者注释，互联网翻译的代表网站“译言网”，分别由文美惠、范文美和李建春翻译的 D.H. Lawrence 中篇小说《狐》(*The Fox*) 的原文及其三个中译本，以及悬疑小说作家蔡骏译写（翻译与改写）谭恩美小说《沉没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的原译文及相关文本；而本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方法包括对翻译副文本（译者注释、采访、前言等）的分析（第二、四、五章），互联网翻译过程和发布媒介分析（第二章），原译文之间的对比分析（第三、四、五章），以及不同译者翻译同一部著作的平行对比（第三章）。理论层面的探讨为实证性研究提供了分析和解释的途径，而源自具体翻译现象的实证性材料从实践的层面提供了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阐发，乃至补充和丰富的机会。在大量实证性材料的支撑下，本文力求做到在自上而下的理论探索中随时结合各种翻译现象的实际情况，避免理论探索与翻译实践这两个方面的脱节。

论文架构

以译者的身份认同为起点，本文在第一章中首先将社会心理学中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结合翻译研究，应用于译者身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译者身份认同的三种类型，即角色身份、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译者的角色身份以译者所担任的社会角色为基础，包括译者角色和其他与翻译相关的社会角色；译者的集体身份以译者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如译者的民族、国家或性别身份；译者的个体身份是译者不同于其他译者的自我的个性，代表了译者独特的风格特征。随后的第二、三、四章的论述分别以这三种身份认同类型为基础进行，并结合案例来解释具体的翻译现象，探索不同翻译现象中译者的社会心理因素。

第二章从译者的角色身份入手，探讨个体担任译者的角色身份以及与译者

角色相关的期待与阐释，以及翻译角色间的互动对话等问题。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章以一段译者的注释为例，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其对应角色进行互动对话的具体方式，提出翻译主体间的角色互动以内部对话为主要形式，译者通过角色扮演达成内部对话。而在互联网翻译这个特定的语境之中，不同于传统翻译方式的是，翻译的角色互动由内转外，翻译的组织者、译者、读者、评论者等各种角色通过网站的平台进行即时的对话互动。当然这个看似自由的平台也并不能完全免于审查，后者同样是翻译对话的参与者之一。

第三章以身份选择理论为基础，讨论在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译者性别身份的不同表现方式。运用身份选择理论，本章对影响译者（性别）身份选择的不同因素进行了分类。随后结合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具体情况，本章探讨了女性主义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身份选择及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走出加拿大之后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从女性主义身份向性别意识的转变也是本章的关注点之一。此外，翻译中译者性别身份的表演更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章最后以 D.H. Lawrence 的中篇小说《狐》的三个中译本作为案例，分析了其中性别身份的不同演绎方式以及译者性别身份在翻译中的复杂表现。

在第四章中主要关注的是译者的个人身份特征。笔者从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角度切入译者个人身份的研究，译者在再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性正是译者个人身份的体现。本章探讨了从事翻译活动的作家（即作家译者）这一特殊译者群体在翻译中个体创造性的差异，随后通过对悬疑作家蔡骏译写谭恩美的小说《沉没之鱼》的过程及文本的详细分析，尝试剖析译写者与原作者之间，以及译者自身的创作与模仿的双重身份之间的杂合与冲突、影响与被影响的相互关系。蔡骏作为悬疑作家特有的写作习惯在文本中留下痕迹。

以上各章分别从各个角度探讨译者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五章将重点转移至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重新建构及其与译者个体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文化（包括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与重构是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分析《沉没之鱼》中文版本中中国形象改写，本文发现，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提升自我文化身份的倾向，集体身份的改写与译者的文化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译者与作者作为各自所属文化群体的代表，在翻译这个

文化交流的边界地带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译者身份

本章主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借用社会心理学视角进行译者身份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在回顾现有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不足之处，并探讨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进一步推进现有研究的可能性。随后，本章借鉴社会心理学领域内身份研究两大流派的身份分析途径，在改造整合这两种身份观点以使其适应翻译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译者身份的具体情境，探讨身份理论与翻译结合的可能路径，并尝试在翻译的语境中建立译者身份分析的框架，以期能为译者身份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分类范畴和分析途径。

第一节 翻译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特征

翻译活动从本质上而言是具有社会性的。首先，翻译的社会性来自于语言的社会属性。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翻译都离不开语言符号这一基本的载体，而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的产生和存在都与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与社会相互依存，语言为社会服务。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更说明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勾连关系。此外，翻译的社会性还来自于翻译活动的语境因素。翻译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译文产生之后，更是要在社会中进行流通和消费，存在着影响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最后，翻译中人的因素的参与，更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社会性的特征。作者、译者、和读者，以及赞助人和出版社，共同构成了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翻译的文本本身、文本外的语境，还是翻译活动中人的因素，都说明了翻译是一项社会活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现象，能够在语言和文化这两个翻译研究目前最主要的研究路径之外添加新的研究视野，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观察翻译活动和现象。当然，翻译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语言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因素，在翻译中都不再是单一的不变的，而是跨越了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社会和文化，而这两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张力更是促成了影响翻译的种种不可预知的因素。正是这种复杂化的倾向使得翻译研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门领域。从这一方面来看，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能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素材和思考角度。

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对社会活动的观察和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种倾向，一类倾向于研究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把人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类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层次上，从个体出发研究社会活动。如上所述，翻译活动是两种社会之间进行交流的必经之路，是宏观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而社会宏观结构和文化等语境因素，亦都是通过译者的主体行为，以语言转换的方式体现在译文本中，并通过译文的消费又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影响的。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必须通过译者的个体行动才能实现，因而从翻译的具体过程来看，又是以译者为行动主体的社会活动，是微观层面的活动。翻译涉及到个体与个体之间（如译者与作者），个体与群体（如译者与目的语读者），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如源语与目的语的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最终都是围绕着译者的翻译活动展开。从这一方面来讲，针对译者主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究竟是如何通过译者而作用于翻译活动的，以及译者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这样一些问题。

在翻译研究的范畴之内，已经有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尝试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解释翻译现象。事实上，当我们把研究的眼光从语言转换这个领域转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来看待和研究了。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显然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对等替换，而是涉及到个体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各个层面的一项跨文化的社会活动。James Holmes 在三十多年前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最早发表于 1972 年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为当时正在日渐兴起的翻译学科的研究范围提出预见，其中提到建立翻译社会学的可能性。Holmes 提到的翻译社会学的建立是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的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发展的可能结果（Holmes 2000: 177）。Holmes 认为，以功能为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要描写的对象不是翻译本体，而是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情景中的功能，是针对语境而非文本的研究。这一范围内的研究所要回答的是“哪些文本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被翻译（或者常常更重要的是，没有被翻译）”、“翻译产生的影响如何”等问题，进一步发展将会成为翻译社会学研究（2000: 177）。Holmes 的设想中，翻译的社会学应当是对文本外的语境因素的研究。当然，正如本文上述对翻译的社会性的讨论，社会性因素并不仅仅

存在于文本之外，翻译文本本身也包含着社会性因素，翻译的文本内容、文本生产过程，无不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制约。

Holmes 提出的翻译研究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过程导向 (process-oriented) 的描写翻译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翻译心理学的建立 (2000: 177)。在这里，Holmes 将翻译过程等同于译者的心理活动，而忽略了译者心理活动实际上也是与文本内的语言转换以及文本外的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和语言在译者的心理活动和决策选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译者如何预期翻译策略可能造成的读者反应，又是如何应对的？译者的社会文化身份和认同是如何通过其心理机制作用于翻译活动，反映在译文当中，进而在读者阅读中产生作用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Holmes 尽管认识到了翻译与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存在着关联，但实际上所谓的过程导向和功能为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之间很难做出一个泾渭分明的区分，关于翻译的产品、过程、功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Toury 在其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述 (Toury 1991: 179-192)，本文不再赘述。因此，翻译产品、过程和功能导向的翻译研究最终的发展方向也不可能是像 Holmes 所设想的那样，单单发展出普遍翻译史、翻译的社会学和翻译心理学这三个分支。更有可能的——翻译研究的实际发展也证明了——是各种不同学科相互跨越甚至结合，出现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之内，为我们观察和解释翻译现象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洞见。当然，Holmes 所提出的翻译学研究框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翻译学发展的路线图，为翻译学的建立和初步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日渐全面和深入，更多的理论和视角逐渐被带入到翻译研究当中，原有的研究框架也开始显现出其不足与局限性。本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实际上就结合了 Holmes 所谓的对社会语境、译者心理过程的关注，而分析的对象也将包括翻译产品、翻译过程、以及翻译功能等各个方面。

文化转向中翻译研究就开始对翻译活动的文本外因素的积极探索，影响翻译活动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的、包括个体的因素都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和探究翻译现象，这构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更是越来越以一种独立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姿态出现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之中。多元系统论以

及翻译规范（norm）等方面的研究即是从社会宏观角度出发进行的翻译研究，而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由于其对文化资本（capital）和个体习性（habitus）等方面的论述尤其吸引了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后者开始尝试借鉴和运用Bourdieu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模式来分析影响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探究翻译活动与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和社会变迁的种种有机联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及其社会机制进行研究。⁴这些研究主要借鉴Bourdieu社会学理论中的习性、场域（field）和文化资本这几个概念，尝试将其运用在对翻译活动的描写中，从译者习性、翻译场域、和翻译对文化资本的传播控制等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翻译活动，其侧重点各有不同。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在于尝试在行动主体与社会客观结构之间建立根本性的双向联系，其文化行动理论不仅是研究社会机构的社会学，也是研究社会行动主体的社会学理论（Gouanvic 2005: 148）。研究文本生产过程、文本产品，以及文本在社会场域中的消费的社会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对Bourdieu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或外部维度，两者是一致的共同存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受到的欢迎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上述Holmes在建立翻译社会学的理论预设中存在的问题，文本内部和外部维度都应当是翻译社会学的关注内容。正是因为Bourdieu社会学理论重视主体及其与结构之间关系的这一特性引起了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并促使研究者尝试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从而建立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研究与Bourdieu的追寻是一致的。本研究同样希望能够兼顾翻译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分析中结合译者的主体因素和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译者对社会环境的内化，以及通过翻译活动对社会和个体身份的重塑作用。

然而，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翻译的外部因素，过多关注社会、环境，关注翻译产品在社会中的消费，社会主体在文学场域中争夺符号资本（即文化资本）的斗争，而忽视了翻译的生产过程和翻译产品本身。尽管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学理论，Bourdieu 的社会学理论更加注重个体的因素；但他对个体的追问依旧是通过向外界的观察来寻求答案的。Bourdieu 对个体的注重主要体现在“习

⁴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 Gerald Parks (1998), Andre Lefevere (1998), Daniel Simeoni (1998), Theo Hermans (1999), Jean-Marc Gouanvic (1999, 2005), Sela-Sheffy (2005), Michaela Wolf (2006), 李红满 (2007) 和邢杰 (2007) 等。此外，翻译研究的国际期刊《译者》(The Translator) 在 2005 年底出版了一期专刊探讨 Bourdieu 和翻译的社会学 (A Special Issue on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性”这一概念之中。“习性”与“身份”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的特质。二者都联系个体与社会结构，都是个体的特性，都在社会结构中形成又内化于个体，又都具有反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力量。然而对于翻译研究而言，“习性”的概念并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它太过宽泛，可以将包括身份在内的所有与社会相关的个体特性都囊括在内。考虑到仅仅是身份概念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的范畴，“习性”概念虽然可以为解释个体社会行动提供一定的解释，却难以在具体语境的研究中付诸实施。一些评论者指出，习性概念是一种富于启发性的宽泛想法，而并非具体而具有可操作性的假设（参见 Sela-Sheffy 2005: 3）。要在翻译研究中借用习性的概念进行针对译者的研究，还需要更加具体的分析范畴和手段，需要针对其中一些含混的概念做进一步的发展和细化。

除了 Bourdieu 的社会学理论之外，当代社会学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影响的还有德国社会学家 Niklas Luhmann 的社会系统论（Theory of Social Systems）与法国社会学家 Bruno Latour 的行为者网络论（Actor Network Theory）（参见 Hermans 1999; Buzelin 2005:193-218）。这些理论都将翻译作为一种行为置于社会宏观语境下考察，尝试重新界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开辟翻译研究的新路径；都重视对翻译中人的因素，即译者的研究。然而翻译社会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武光军就认为，翻译社会学所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即通过分析译者传记等研究翻译问题与策略——是造成其理论缺陷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这种后观式的研究对实际过程与未来很难做出预测，所以翻译社会学研究所产生的理论会在描写方面比较突出，而在预测方面比较弱（武光军 2008: 80）。应当说，“预测”并不是翻译社会学研究乃至翻译研究的目的所在，故此武光军所认为的翻译社会学在“预测方面比较弱”的不足之处也并不成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只通过分析译者传记，以及前言、后记、采访等翻译副文本来分析翻译中的问题与策略，这对于以文本为基础的翻译研究是过于片面和主观的。回顾应用 Bourdieu 社会学理论所进行的翻译研究，可以发现围绕译者习性对翻译影响的探讨也大多是从译者的个人经历等方面入手，追寻译者的“社会轨迹”，分析译者在翻译的副文本（如译者前言、后记、采访）中的言论，进而说明译者在选择文本或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倾向。因此，在本研究中，固然针对翻译副文本的分析构成了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翻译文本本身以及翻译的社会和文化

语境的分析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对象和论证依据。

总而言之，以 Bourdieu 的社会学理论为主导的翻译社会学研究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将翻译看作是社会行为的一种，从社会的角度进入翻译研究，探究在社会语境中的翻译活动和译者行为。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着眼点在于翻译的社会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描写”对象）也在于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的性质特征，以及译者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特性。然而，社会学的视角决定了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更加注重社会整体对翻译活动的调控，以及翻译对社会的影响。换言之，其理论基础决定了它重视社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特征，而相对较为忽略了译者的主体性因素，而后者已被证明是翻译活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Bourdieu 所提出的个体“习性”概念在这一方面弥补了社会学研究的不足，突出了行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翻译研究中得到较多的借鉴和应用。遗憾的是，这并未能解决上述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要么只关注文化资本通过翻译在社会语境中的分配或争夺的情况，要么聚焦于译者个体的“社会轨迹”，而没有很好地结合社会语境。此外，“习性”概念本身太过宽泛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缺陷在应用到翻译研究后并未得到改善，这更阻碍了 Bourdieu 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发展。

显然，就此宣称“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的又一次跨越性的发展”（王军 2007：140），或者说“社会学转向……是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发展的必然趋势”（武光军 2008：76）还操之过急。不过社会学的理论还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观察翻译现象的新的思考角度。翻译的社会性固然不容忽视，但其中译者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因素也应当成为翻译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同等重要性以及双方的互动作用，Gentzler 预见翻译研究的下一个转向将会是“社会心理学转向”（social-psychological turn），翻译研究的范围将会从现在以功能性方法为主拓展开来，从而将社会影响和个人情感（social effects and individual affects）囊括在内（Gentzler 2008：180）。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中的身份概念与译者身份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可以看到翻译与社会学研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跨学科的研究传统，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从社会学领域中吸取营养，获取理解和解释翻译活动的启发。然而由于社会学理论倾向于研究社会宏观结构，而导致翻译社会学研究无法兼顾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这一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何能够在研究中不放弃翻译的社会属性的同时，又兼顾其中的主体性因素，将翻译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连接起来结合起来，成为本文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笔者认为，寻求在社会语境中理解个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对身份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社会心理学针对身份认同的探讨更为系统和深入，可以为译者身份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的支撑。本文将社会心理学对身份的研究作为理论来源，通过具体的翻译现象，结合翻译文本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来分析翻译与身份，特别是与译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采取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理论框架的套用，更何况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身份研究本身亦并非一个严整而具系统性的框架。因此有必要在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一定的整合与改造，使其适应翻译研究的具体语境。如何从社会心理学中借鉴其对身份问题的洞见，从而建立翻译研究自己的关于译者身份的分析路径，构成了本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翻译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包括了方方面面，其中既有身份问题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也有翻译对于身份的建构/改变；既有对自我身份的操控，也有对他者身份改写。而其中的身份有时候与社会地位相联系，有时候又与群体认同相关；“身份”所指涉的范畴既包括了主体的个人身份，还包括了集体身份，此外还有文化的、种族的、民族国家的、和性别的身分等都在翻译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所谓的“身份”其实涵盖了相当宽泛的范畴。正如 Tajfel 和 Fraser 在试图厘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时所指出的那样，“身份”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许多学科所共有的研究主题之一（Tajfel & Fraser 1978: 25）。各个理论流派——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从各自的视角对身份问题进行讨论；而身份问题又进而与种族、性别、阶层、权力、全球化等理论问题相互交叉融合，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热点。翻译、语言、社会、文化和身

份——这些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其他几个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而在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对身份的研究对其它学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主要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汲取关于“身份”问题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在翻译的领域内观察身份现象。在此之前对这一概念的整体情况的简单了解将有助于本文厘定自身的研究范围。

由于身份这个概念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其“难以界定”的特性是几乎所有研究身份的学者的共识。正如 Stuart Hall 的观察：

身份是这样一种概念——它在撤销和出现的间隙进行着“擦除”式的运作；我们不能以原有的方式思考身份这个概念，但是如果没有它，我们又根本无从思考某些关键问题。⁵ (Hall 2000: 16)

无法确切地谈论，却又不得不谈论，成为我们探讨身份问题时所面临的一个窘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中，对身份这一概念的应用几乎无处不在，各自对身份概念的界定也千差万别，如果不做任何界定，想要在不同学科之间共同谈论“身份”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在开始讨论身份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之前，需要对身份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当然，一个绝对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定义显然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在没有任何界定的情况下想就这一问题探讨下去的努力也将无以为继。

人文学科中对人的“身份”(identity)的概念化理解大致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一方面讨论的是“我”与他者之间关系问题，“我”的身份是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才得以成立的，讨论人的归属感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讨论的是“我”与“自我”的同一性问题，是心理投射层面的讨论。前者是社会学指向的，而后者指向心理学和心理分析。

在政治科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中，身份几乎等同于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y)，是同属于某一类别的人的共有特征，例如国家身份或民族身份。根据这种身份定义，所有属于同一社会类别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身份，并区别于不属于这一身份的其它社会群体。这种身份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也较多，多指

⁵ 擦除，原文为“under erasure”。“writing under erasure”是指在写作时写下某词，又将其划去，但在发表时保留写作和删除的痕迹，如“identity”。海德格尔最早用这种手法来表明他对“Being”一词的批判，德里达则用其来传达自己的解构主义语言观。

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所代表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一种集体身份的体现，较少注重个体对这种集体的心理认同问题。而在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分析领域内，美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Erik Erikson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讨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身份”。⁶他从人格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同一性看作是一个人对自我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受（individual's subjective sense of personal sameness and continuity），以及从他/她信赖的人那里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而当人们失去这种感受的时候，就出现了“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或曰“同一性危机”；Erikson 1968）。上述的两种对“身份”的理解分别属于身份概念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其侧重各有不同。身份的社会性一面指向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一致和差异的关系；其心理学的一面指向个体内在自我的心理行为，是达成自我的一致性的途径和结果，是个人成长的心理过程。而事实上，个体自我身份的形成并不能离开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而独立完成，因此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身份研究试图采取综合性的策略，结合身份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两个方面。⁷

社会心理学领域内致力于身份研究的理论建构也并非仅是仅有一家之言，而是存在着两个理论流派，即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和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又称群体身份）。⁸简单来讲，身份理论以美国微观社会学为基础，以“角色”（role）为关键词解释个体的社会角色及社会行为；社会身份理论以欧洲社会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群体”（group）为关键词研究社会群体认同、群际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s）、以及个体与群体间关系。尽管这两种理论重点不同，对身份概念的使用也不尽一致，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身份认同提出自己的见解，相互之间互为补充又有重合之处，可以用来为译者身份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在本文中开展译者身份的综合研究，有必要追溯社会心理学中身份研究的主要观点，在明确其思想要义的基础上，探索译者身份研究的有效途径。二十

⁶ Erikson 的“identity”也被译为“同一性”。如他的代表作之一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在中文中也被译为《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明之译，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⁷ 当然，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内部也由于理论来源和研究背景的差别，分为社会学倾向和心理学倾向的社会心理学，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因此在下文中将不再做出详细区分。

⁸ 目前“Identity”一词在汉语中的译名还比较混乱。如“Identity Theory”在其它文献中可见到“认同理论”、“同一性理论”和“身份理论”等不同中文翻译。本文中统一使用“身份”作为“identity”的中译，而指涉身份形成的心理过程的“identify/identification”则译为“认同”。

世纪末开始,一些学者为了在社会学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身份研究理论,以应对当代急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开始走出原有的种种理论框架限制,提出将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进行结合,以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尽管这一整合的过程还在进行之中,一个新的整合后的理论尚未建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借用上述两种理论各自的理论优势,从而建立翻译学自己的身份分析方法。

角色身份 (Role Identity)

“身份理论”也称为角色身份理论,或认同身份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由Sheldon Stryker等人在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和William James的自我理论基础提出(Stryker 1968)。⁹身份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角色构成的,而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各种不同角色,个体扮演多少的角色就会形成多少相应的身份,所有身份的整合就构成了个体的整个自我,个体的自我也是在各种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出来。这里的身份概念再次说明了身份是自我和社会相连接的桥梁,而身份研究更是深刻地认识自我、社会结构以及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

角色的概念是身份理论的核心概念。身份理论将社会看作是由各种角色构成的关系体系,个体在其中担任特定的角色。如母亲、煤矿工人、总统、或是朋友、译者,这些都是社会体系中的角色。特定的社会角色意味着社会组织或结构中一定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同时代表了一系列的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一个角色就是一套用来指示被他人认为是适当行为的期望,在特定的情境中,个体会按特定的角色来规定自我的言行。以角色为基础建立的身份就是角色身

⁹ 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被公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William James (1842-1910), 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符号互动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由George H. Mead、Charles Horton Cooley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先驱,在理论和检验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颇具特色的一个社会学——或者更确切的说——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参见John P. Hewitt 2000: 2-6),后由Mead的学生Herbert George Blumer命名为符号互动论。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大多数人都承认,符号互动理论“是致力于研究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过程包括主观意识和人际互动动力学的指导性理论之一”(D.P. 约翰逊 1988: 409)。符号互动论对人的主观意识和自我概念(self-concept, 亦即我们将来讨论的“角色-身份”)的重视,以及它对个体间微观互动模式的研究,将有助于分析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观意识作用以及角色间互动模式。身份理论接受了互动论“社会通过自我来影响社会行为”的观点(Hogg et al. 1995: 255),以此为基础,我们这里讨论的身份理论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汲取了符号互动论的思想:其一,角色身份理论并不认为自我是一种自动的心理单位,而是导源于人们在社会扮演的各种角色的一种多重社会建构;其二,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决定了人们自我概念的不同。(参见周晓虹 2008: 48)

份。角色身份的建立经过了个体对角色意义的认同（identifica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个体在其间经历自我确认（self-verification）的认知过程。“认同”是身份确立的一个重要过程和结果，是个体对社会角色产生认可和归属感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对角色意义或群体规则的内化过程。角色身份是对自我概念、自我指称的认知；也可以说是鉴于他们在结构中所占有的角色位置，并通过标签的过程而形成的自我定义；或是作为某特定社会类别的成员的自我定义。（参见 Hogg, Terry & White 1995; Burke 1980; Thoits 1991）

从角色身份理论的分析维度入手来看译者身份，有助于发掘许多翻译现象的深层社会心理原因，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翻译作为由译者个体实施的社会活动的具体意义，社会结构和译者个人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译者角色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个人实施“翻译”这一社会功能时，他的角色身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同样的，当某人从事写作时，他就具有了“作家”的身份，而当他的作品被译入其它语言时，他就成了翻译研究中的“原作者”。角色身份概念结合了社会期望与个体认同这两个方面。它认为身份所代表的自我意义是对公认的核心意义和期待的内化，同时承认这种内化又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译者”不但意味着一套符合社会基本期望的行为规范（具有双语能力、完成语言转换、达到交流的目的），还意味着个体对“译者”角色的认同和内化，意味不同的译者个体对自己译者身份的阐释的差异（如一些译者认为自己应当“完全服从原作”而另一些认为应当“在译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里的身份概念结合了身份的社会意义以及自我对于这种身份意义的认同和内化这两个方面，从而联接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自我认同，因此有利于我们分析译者行为在相似性基础上的个体特征。当然，一个人通常在社会中担任的不只有一种角色，译者所担任的其他角色身份的总和，就构成了译者的整个自我，而这一自我会在译者的活动中体现出来。关于译者的角色身份，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采用角色身份理论来分析译者身份，就意味着本文接受角色身份理论“将社会看作是由各种角色构成的关系体系”这样一个观点。事实上，翻译活动本身就可以恰如其分地为这一观点做出注解。参与翻译活动的主体都承担着相关的社会角色，其中在翻译研究中讨论较多的如原作者、译者、原文以及译文的读者、译作评论者、还有发起人/赞助人/出版社等。这些社会角色，围绕着翻译活动共

同组成了一个微型的社会关系群体，各方在其中都承担各自的角色功能，实施相应的角色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角色身份理论及其相关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翻译活动中的各个角色之间是如何进行互动和协调的，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主体是如何在角色期待和自我认同之间进行调节，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主体（主要是译者）身份选择等相关问题。

尽管角色身份理论对我们分析翻译微观活动层面有所帮助，但是当涉及到跨文化交际层面的民族文化等宏观的集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时候，角色身份还是缺少了相应的解释力。而社会身份理论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Social Identity）

与上述的源自美国的身份理论不同，本文将谈到的另外一种身份理论——社会身份理论——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现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社会心理学家 Henri Tajfel 依据社会知觉方式和对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认知提出了社会身份理论。后来 John Turner 又提出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进一步完善了社会身份理论。¹⁰ 社会身份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它产生于对群体间行为的解释。这里的“身份”是基于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而建立起来，因此称为“社会身份”，或曰“群体身份”。¹¹ 所谓社会群体是指有共同的社会认同或将自己视为相同的社会类别成员的一群个体（Stets and Burke 2000: 225）；社会身份就是“由于身为某一群体成员而具有的那部分自我意识，以及作为群体成员所附属的价

¹⁰ 社会身份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它们都依靠同样的反简化论的原理，并且都援引社会身份这个概念。在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自我分类理论延续了社会身份理论所开创的传统，扩展并详细阐述了后者的观点，即理解集体行为的根本在于社会身份的认同过程。尽管存在差异，这两个理论是相互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因此，社会身份理论这个词有时候也会被用来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指涉上述两个理论。在本研究中亦不会对社会身份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做出进一步的区分，而将在“社会身份理论”这个术语之下探讨包括自我分类理论相关范畴的、群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关于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具体比较可参见 John C. Turner, “Some Current Issues in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ies”, (载于 *Social Identity: Context, Commitment, Content*. Ed. Naomi Ellemers, Russell Spears, and Ber Tjan Doosj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6-34), 以及 Michael A. Hogg and Craig McGarty, “Self-categoriz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载于 *Social Identity Theory: 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Advances*. Ed. Dominic Abrams and Michael A. Hog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c1990. 10-27)。

¹¹ 基本上，社会身份理论内部将其所研究的身份称为“社会身份”，同时由于社会身份是建立以群体的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因此也被称为“群体身份”。是在整合角色身份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这两个流派主要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由于两种身份类型都具有社会性，故此以“社会身份”专指其中一种就很有可能造成读者误解，不便理解和区分。因此，本文中分别以“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来分别指涉以社会角色为基础建立的身份（身份理论），以及以社会群体为基础建立的身份（社会身份理论），以方便讨论。

价值和情感意义”（Tajfel 1981）；或者，简单而言，是作为群体成员而带来的自我概念（Abrams and Hogg 1990: 2）。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心理因素来解释，要全面地理解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Ng *et al.* 2004）。其基本思想是，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即人们总是自觉地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并给予评价，个体会在评价的基础上来确定自我的身份，最终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in-group and out-group*）。个体的言行总趋于与内群体成员的特征相一致，以此来区分自己的身份与外群体成员身份的不同。在身份差异的基础上产生了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in-group favourism and out-group discrimination*）；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身份来提高自尊（*self-esteem*）（参见 Tajfel 1981）。

与角色身份不同，群体身份是指如同中国人、汉族、女性等这些以社会群体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身份。群体身份能够令人们将群体特性冠于己身，对社会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故此，社会身份理论特别关注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社会思维和社会行动造成的影响。个人的群体身份的形成涉及到个体在社会中以群组为单位进行自我分类、认同和比较（*comparison*）的过程（Tajfel & Turner 1986: 7-24.）。与角色身份理论相同，社会身份理论也非常注重心理与社会过程的勾连关系；但不同的是，社会身份理论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关系的。

参与翻译活动的主体，譬如译者，除了在承担自己的角色身份进行翻译的同时，他/她的群体身份，如性别、种族、阶层等，也都存在着影响译者活动，或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的潜在可能。在翻译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冲突，而社会身份理论对个人的群体认同、群际关系以及群体认同对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翻译现象背后所存在的社会心理动机和原理。

个人身份（*person identity*）

尽管身份理论与角色身份理论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分别致力于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的研究，但这两种理论都承认个人身份的存在及其对个体行为

的重要作用。在整合上述两种理论的过程中，个人身份成为个体所具有的、有别于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的另外一种身份，也是译者身份分析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

基于个人特征的身份被称为“个人身份”。尽管对个体身份的研究并不如对角色身份的研究更广泛和深入，但对个体身份的存在和意义仍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简单而言，个体身份是不同于他人的自我的个性，是个人维持自我作为个体的意义，是区分于其它的个体的特性（Stets and Burke 2000: 229）。

跟群体身份和角色身份不同的是，个人身份无论在何种群体、角色还是情境中，都具有相关性。故此，Burke认为个人身份是一种主身份（master identity, Burke 2004: 10）。¹²在具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个人身份在个体对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的选择中是具有影响力的（同上: 11）。个体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个人身份具有共同意义的角色或社会身份。这样，在一致意义的基础之上，个人身份可以通过其他两种身份的实现来达成。此外，Stets和Burke观察到，当与角色身份相关的意义和期待与个人身份相互冲突的时候，个体的行动有可能会不考虑角色身份，以此来保持其个人身份（Stets and Burke 2000: 229）。因此，尽管角色身份需要得以保持，个体身份同样有此需要。总体而言，人们需要在角色身份的要求和个人身份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点。

译者的个人身份也是译者身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译者的个人身份具体体现为译者的审美特征、语言习惯、和个人品格等，反映在译文中，就成为独特的译者风格。一般而言，文学翻译要求译者个体创造性的发挥，而翻译再创造的过程恰恰是译者个人身份体现的主要场所。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译者个人身份对其身份选择的影响作用，以及个人身份与译者角色身份相互冲突时译者的选择。译者如何在自我身份的各种需求中寻求平衡也是翻译研究中一个有趣的话题。

¹² 所谓“主身份”（如男/女性，白人/非白人，青年/老年），是与“情境身份”（situated identities；如父母，工人等角色身份）相对的。后者是指与特定环境中的角色相关联的意义，而前者是指与那些在无论何种情境中都适用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角色相关联的意义（Stets and Burke 1996: 196）。译者这一角色身份就属于情境身份。个体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担任着译者的角色；但当译者回到家里，或者与朋友相处时，大多数情况下，他作为“译者”的身份在这些环境中不再具有关联意义；而另一方面，个体无论处于任何环境、扮演何种角色，性别、人种和种族等群体身份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直存在并具有相关性的身份。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整合途径

社会身份理论以社会分类为依据，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身份，而角色身份理论以角色获得为依据，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身份。这种不同与两种理论的背景有关，由此形成了对身份的不同定义。同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内的这两种针对身份的理论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对身份概念的使用也不尽一致，但两者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自我概念的社会基础和规范行为的性质，正如 Hogg 等人所言，二者都致力于由社会构建的自我的社会属性，而避免将自我视为是独立于社会的；二者都把自我看作是属于特定实践活动（如规范或角色）的多重身份构成的；二者使用相似的术语和语言（Hogg *et al* 1995: 255）。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于研究角度和强调的重点上，而不是在理论的性质上（Stets and Burke 2000: 224）。这两个理论占据了平行却又独立的领域，相互之间几乎并无交集。两个显然是如此相似的解释性框架的共存对与社会科学而言是成问题的。幸而，社会心理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鼓励二者之间的对话和对比研究。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有必要将这两种理论进行整合，以便于各取所长，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研究社会与个体行动关系的理论系统。从九十年代开始，Stets, Burke, Hogg 等人在《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将身份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并置比较，探讨理论整合的可能性，并寻求整合的具体方式。

无论是从角色还是群体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都不排斥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性。两种理论的身份概念都与对社会群体的划分相关。基于某群体或类别的成员资格而建立起来的群体身份意味着个体具有与其他群体成员共享的自我意义，以及与外群体之间的差异。角色身份理论虽然把个体性和目的作为其中心观点，但同时也承认作为群体成员对任何一个人的意义都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有着一致性的根基。（Stets and Burke 1996: 194；参见 Stryker 1980）。角色身份理论并没有否认群体概念，相反，群体也是身份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角色身份理论中的群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具有相同角色的人的集合，其内涵与群体身份理论的社会群体概念是一致的。例如，所有译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译者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内的成员共同享有译者这一

身份，像“译协”这样的组织，就是将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组织在一起的机构。角色身份理论中的另外一种群体是相互关联的不同角色之间组成的互动关系集合，就像一个微型的社会关系。如上文曾提到的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社等，围绕着翻译活动共同构成一个角色群体。这一群体概念不同于上述基于共同社会类别的群体，而是以社会活动为单位由承担不同角色的个体构成的。由此可见，角色与群体的身份概念的互补特性可以让我们更全面的分析译者个体与社会中的其他个体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此外，这两种理论非常强调结构以及由社会建构的自我（角色身份或群体身份）的功能，自我这种动力结构能够作为连接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换言之，无论是角色身份理论还是群体身份理论都强调了社会和自我之间的交互联系。它们都认为行为是被组织到有意义的、经过特定的自我界定分类的单位中去的：角色身份理论讨论的是行为是如何根据角色来组织的，而群体身份理论则关注群体规范、刻板印象、原型对行为的影响。最后，这两种理论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它们都讨论了身份的内化并用来界定自我的方式：群体身份理论侧重社会认同作用（social identification）和自我分类的过程；而角色身份理论则着眼于将一个人标签（labeling）或命名（naming）为某种社会类别以及承诺（commitment）的过程（Hogg et al 1995: 255-269）。

至于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本文在上文分别介绍时已经有所交待，在此无须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二者之间某些方面的差异是具有互补的特性的。比如，角色理论关注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角色，以及这些角色所赋予的各种认同相互间的关系，重点是由角色身份或社会期望所影响的个体行为；而群体身份理论关注的则是群体间的关系和群体过程，其重点是群体中身份的创造性作用以及行为的群际因素（周晓虹 2008: 52）。此外，群体身份理论对身份是如何内化的、背景因素是如何造成不同的身份显著性的，以及身份是怎样产生与之相符的行为的，有比较细致的了解；而角色身份虽然不太重视认知过程在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但却较好地解释了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是如何作为一种有效的影响对身份发生作用的（同上）。如果说上述两种理论在观念上的相似之处为理论整合提供了可行的基础，而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的差异，更使得整合之举变得更有意义。通过结合这两种对身份研究的不同视角，可以达到一种互补的

优势,从而建立一个更全面的关于自我的整体性观点(Stets and Burke 2000: 224)。比如说,角色身份理论在处理长期身份与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方面更为有效,而群体身份理论更适宜于群体间层面的探讨和详细叙述动态身份的社会认知生产的细节(Hogg et al 1995: 255; 前者见本文第二章;后者见本文第三、五章)。两个理论之间的融合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个体的整个自我。利用现有的身份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译者的身份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剖析,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把译者主体放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观察,从一个更加立体的角度认识译者身份。

本研究中所谈论的“身份”指的是译者基于角色、群体或是个人的自我意义,译者在对自己意义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行为。由于个人总是在占有某一角色的同时又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群体,所以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总是同时关联并且影响着个人的感知、情感、和行为。所以不难看出,所谓的个人身份并不是独立于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而存在的,它可以在个体承担角色的时候显现出来。甚至在很多时候,主体的个人身份受到他所担任的角色和所属的群体的共同影响而形成的。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性别身份,当我们从社会的层面来理解人的性别身份的时候,它意味着个人所属的性别群体,以及在某些情境中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性别身份,因为一个人的性别还意味着他/她看待自己的方式和与他人互动的方式(Stets and Burk 1996: 193)。与此同时,性别身份还可能影响到个人性格的养成。

角色身份理论强调的是行为角色和角色的认同,而群体身份理论强调的则是更为广阔的社会类别身份。两者相互区别却又无法完全界分,同时又与个体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这就为这两个存在互补性差异的理论之间的整合提供了基础。Stets和Burke认为,“要建立一种有关自我的综合性理论,我们就必须理解群体、角色和个人认同是怎样发生相互联系的”(Stets & Burke 2000: 228)。群体身份、角色身份和个人身份,共同构成了一个人自我概念的核心成分。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人—角色—群体”之间的一种微观(micro)、中观(meso)和宏观(macro)关系,角色既受制于群体或社会客观期望,也依赖于个人的主观表演。

反观翻译研究,一个完整的身份概念既可以分析译者如何履行自己的角色

职能，如何内化并实施译者角色的职业要求和社会期待，以及如何与角色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实现角色互动；又可以分析译者对社会群体的认同感对翻译行为的影响；群体身份对个人的群体认同以及群际关系的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从更宏观的群体关系层面来观察翻译中涉及的群体关系问题，以及这种群际关系是如何再现在译文中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概念结合了翻译活动中社会结构与个人认同这两个层面，可以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中的个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作用。

在上述的努力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将尝试在翻译研究的范围内围绕着译者的角色、群体和个人身份进行分析，初步厘定译者身份分析主要范畴和途径。本文做出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能更细致地了解身份概念，而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更侧重于某一个角度来入手，但不能排除另外的一种理解和解释身份的方式。例如在分析译者的角色身份时，既可以从译者担任这一角色，与其它对应角色的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译者群体的角度来看待。总之，这两种身份分析手段在翻译研究中可以并行不悖，反而有利于我们对翻译行为有更全面的研究和理解。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许有可能导致理论架构或存在缺漏的问题，但采用单一的理论框架也并非可以完全避免上述问题。反而吸取各种有用的观点和分析模式会有利于翻译研究发展出自己的身份研究模式。

如上所述，译者的身份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理解，即群体身份、角色身份与个人身份；而结合翻译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可以从“译者身份本体”和“译者的其它身份”这两个角度来看译者的身份分类。

翻译研究中常常说到的“译者的身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所谓“译者”本身就是一种身份（*translator as an identity*），也就是“译者角色的身份”。无论是谁，当他/她从事翻译活动时，这个人就具有了“译者”这一身份。具有这一身份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把译者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当某人实施“翻译”活动、承担“译者”这一社会角色的时候，他/她的身份就是——“译者”。这是以角色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译者身份，可以从角色身份的建立、角色与其他角色的互动、角色评估等角度进行分析。这一类的研究包括对主体完成“译者”角色所需条件、翻译过程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译者职业等方面的研究等。譬如对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的研究就涉及到译者完成角色任务所需的种种

条件，与译者培训密切相关。其二，“译者的身份”还可以理解为“译者群体的身份”：在建立角色身份之后，具有相同角色的个体的组合就构成了一个群体，也就是所有译者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组成的集合，即“译者的群体身份”。针对译者群体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

上述两种“译者的身份”可以称之为“译者的身份本体”，是个体参与翻译活动时直接相关联的身份。这一身份的建立有赖于翻译活动的实施。对译者身份本体的研究，也就是对个体身为译者的研究。角色身份并不仅仅是个人所扮演角色的一个标签，它还意味着社会对这一角色身份的期待和规范，以及个人对这种期待的内化和施行情况（performance; Stets and Peter 2000: 225）。社会对某一角色的期待会形成相应的评估标准和行为准则，在无形中影响着个体在角色实施过程中的选择和行动。而个人对社会期待内化程度和阐释方式的不同也会产生在一致性基础上的个体差异（McCall and Simmons 1978: 68-69）。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相同角色的个体在角色实施时所做出的行动在具有相似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角色规范的历时性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也是社会期待形成的重要原因。如传统翻译观对译者本身这个身份的期待就是“忠实”地翻译，认为译者应当如实地把原文中的信息传达到译文中，应当保留原作的风味，应当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等等。这些期待进一步成为译者的工作准则和评价标准。然而由于个人对翻译的认识不同，再加上社会历史语境和个人特质的差异——如个人所具有的其他身份的影响——“千译千面”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了。关于译者的角色身份，本文将会在后文详细讨论，并将会结合网络自发翻译现象来讨论互联网时代自发译者的角色特征，及其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译者角色的启发。

从事翻译活动的个体所具有的、除身为译者之外的其他身份，本研究称之为“译者的其它身份”。除了担任译者角色之外，个体还具有许多其它各种各样的身份，这些身份都是构成个体自我的一部分，同时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可能。其中既包括建立在群体认同基础上的身份，如性别身份、文化身份或民族身份，也包括建立在社会角色基础上的身份，如作家、母亲等等。可见译者的其它身份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个体除了作为译者之外的所有身份。

在个体所具有的众多身份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身份都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其中有些可能会影响到译者实施自己的译者角色，而有些则可能并不相关。本研究所关心的是那些已证明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或者可能对翻译产生影响的身份，主要包括性别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以及译者的个人身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盛极一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使笔者产生感兴趣的问题是，性别身份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能够成为左右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否每一位译者的性别认同都可以成为影响其译文的活跃因素？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活动，译者处于作者和译文读者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之间，担任着协调和沟通的作用，但这位中间人的民族文化身份是否与翻译活动是否相关，以及关系究竟为何，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最后，译者的作为独立的个体，其个人的独特性是翻译活动中最无法确定又不能忽视的活跃因素，也是本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

个体的身份并非是单一的存在，而常常是不同的身份共同才构成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多重身份的并存意味着主体在不同的层面上，可能同时受到各种不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制约或影响。当一位作家去从事翻译工作时，他原本的作家身份所带来的写作习惯和创作冲动是否会对他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抑或是有助于其完成翻译？或者，一位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认同感的译者面对原文中有损自己国家形象的描述时，他会如何选择？又或者，当一位男译者在翻译一个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谴责批判男权思想的著作时，是否会产生反感的心理而影响译文？这些问题，最终都涉及到译者的其它种种身份与译者身份本体之间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从第二章开始，本文将从译者的身份本体出发，就译者身份的种种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第二章 译者的角色身份与翻译对话

译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个体的主要身份。本章从译者的角色身份入手，首先尝试运用角色身份的相关概念分析译者角色的各个方面，包括译者角色的期待和评估标准、译者对角色的认同与阐释、角色实施的具体条件以及与角色互动等。并着重分析译者在实施角色行为的过程中与翻译对应角色之间的互动对话的具体形式，提出以内在对话来解释翻译对话的完成途径，随后分析在互联网翻译语境中翻译角色对话的特殊形式及其为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

第一节 译者角色身份的内涵与实施

理解身份概念的一个重要角度在于“角色”。正如本文第一章所介绍的，个体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是个体角色身份建立的基础，个体对社会角色不同程度的认同和内化构成了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期待。通过将译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进行研究，在宏观上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特征，在微观上有助于分析译者在实施角色行为，进行翻译时的心理过程及通过译者而作用于翻译的各种因素。研究译者的角色身份，必须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角色、什么是角色身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此外还有角色理论范围内的一系列相关概念与分析模式。这些都有利于从角色身份这个角度来更加深入和系统地理解译者的翻译活动。与此同时，角色概念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将为我们下文将要探讨的译者的角色扮演、主体间对话、以及译者多重身份的选择与身份杂合等问题奠定基础。

从历史渊源上说，角色概念取自古希腊罗马剧场中的戏剧和舞台，指演员在戏剧舞台上按照剧本规定所扮演的某一特定人物的专门术语。这一含义在现代戏剧和舞台表演中依然延续。其实，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社会与戏剧舞台、社会行动者与演员角色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好比是一个天然的舞台，人类活动就犹如一幕社会剧，人们在这个社会剧中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演着一场场绚丽多彩的社会话剧。我们可以借助莎士比亚在其剧本《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中的一段话来简单说明这一观点: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演员, 他们各有自己上场和下场的时间, 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发展, “角色”这个概念带着其舞台原意进入社会科学领域, 用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行为, 使戏剧角色变成社会角色, 产生了“社会角色”的概念, 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与舞台角色的基本原意相差不远, 社会学中的角色是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处于特定社会地位, 并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角色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 Georg Simmel (1858-1918), 他最早使用了“角色”概念。这一概念后来为其他社会学家所发挥, 特别是 20 世纪 30-50 年代, 美国涌现出一批研究角色理论的学者, 其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G. H. Mead (1863-1931) 所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 (也就是后来的符号互动论学派) 的研究最为著名, 也影响最大。Mead 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人们在交往中可以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以及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角色是在互动中形成的, 角色表演并没有一个先定的剧本, 文化只能为角色表演规定大致的范围。Mead 的理论的重点在于社会中的互动模式, 并强调互动对角色的形成作用, 同时也不否认文化和社会的规范作用。

基本上而言, 现代社会心理学对角色的分析存在着两种倾向。其一在于角色的结构性特征 (structural role theory), 即客观性, 将个体视为剧场里的演员, 而人类行为则是发生在剧场中的, 由剧本、导演、其他演员和观众所高度结构化而形成的; 其二在于角色过程性特征 (process role theory), 亦即主观性, 将个体看作是游戏的参与者, 角色间的互动受到更大范围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上述 Mead 的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从社会的角度而言, 前者把角色当作一定的社会权力和义务的体现, 当作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 强调社会角色的客观性和制约性; 而后者则视角色为互动过程中的表现形式, 强调社会角色的主观性和创造性。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翻译活动以及对翻译的理论研究, 同样也体现了上述的两种倾向, 在翻译中对原作者和原文的忠实要求体现出翻译活动的客观性一面, 而对读者反应的重视, 以及译者的主体意识及翻译主体间的互动则体现出翻译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因素。这两个方面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都有所体

现,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然而,割裂角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并由此强调角色的某一方面,这无论是在社会学研究还是在翻译研究中都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警醒。结构角色论的非人格观点,抹杀了角色扮演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使角色成了单纯接受社会指令的机械对象,使译者成为原文的奴隶;而过程角色论的纯主观色彩,则掩盖了角色同客观社会关系的联系,使角色成了凌驾于社会结构之上的唯意志论者,而给了译者滥用翻译带来的权力的自由。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注意角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平衡,避免单纯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亦是本研究需要注意的。

角色身份内涵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还代表了角色的理想状态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别。McCall 和 Simmons 把角色身份定义为“占据某个特定社会位置的个体为自己设定的特征和角色”(McCall and Simmons 1978: 65)。McCall 和 Simmons 进一步阐述,这种角色身份是“个体想象出来的自我形象,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看作是这一位置的占有者和实行者”(同上)。这一定义中的角色身份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是个体在实施行动之前对自己所担任的社会角色的认识,在翻译中是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或者是翻译过程中对自己所担任角色的认识和定位,也意味着译者对自己的翻译活动设定的标准和为此而可能采取的策略。角色身份理想的状态既包括社会对角色的期待,也包括个体根据社会的期待而对自己担任这一角色所设想的状态,后者与前者在大体上常常是一致的,译者作为个体很少“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期待,但译者也有“暗度陈仓”的可能,这在翻译实践中并不鲜见。此外,译者间也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然而,如上所述,理想中的定位并不代表个体在角色行为中真正的行动表现,并不能由此而确信翻译的结果,因为翻译的过程总是有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在角色的实际互动中完成的,与最初所预想的状态出现偏差也是正常现象。也正是因此,翻译研究不能脱离文本而仅以诸如译者序言的一家之言为依据——尽管很多时候译者并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声音——而应当时刻关注翻译文本的最终呈现,并小心考察其中的差异所在,从而关注翻译的互动过程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因素的介入而影响了译者对自我角色设定的实施。

身份理论认为社会是相对稳定且延续的。一个稳定的身份不仅有利于个体自身,而且有利于交往中的他人。稳定的身份让个体的行为表现在他人眼里是

可预测的，这一可预测性稳定了他人对个体行为的反馈。这样，他人对个体的稳定的反馈反过来又进一步稳定了个体对自身的定义。这一稳定的相互反馈，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就形成了对某种身份的期待。与角色身份相关的是社会对某种角色的期待（expectations），对角色期待和社会规范构成了对角色的评估（evaluation）的标准。角色期待对人们的角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成为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依据，以及为人们提供评估自身实际表现的标准。我们对译者这个角色都抱有一定的期待，如译者应当如实地把原文中的信息传达到译文中，应当保留原作的风味，应当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等等。这些期待或多或少地构成了译者工作的衡量标准。同样，译者对自己的工作也抱有期待，并以此作为自己完成该角色功能的行为准则。当然，社会身份理论强调身份具有稳定性，并不是说身份是一成不变的。从一个较长时间跨度来看，身份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对身份的期待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演变。不过，身份的变化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较小的变化更为普遍些。

在相对稳定的普遍的期待之中，不同的译者对自己工作又会产生出的不同标准，乃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或者面对不同的翻译任务，都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标准和策略。我们可以用个人对角色及角色期待的阐释和内化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角色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单单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期待与规范的结构制约，还要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协商与安排（Castells 1997: 6-7），因而并不能看作是单方面由角色规范所决定的。在翻译中协商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结构，如出版社等，还应当包括那些并没有以“组织结构”这一形式而存在的语言和文化规范的制约，以及读者这一潜在的互动群体。此外，就像是演员的表演要遵循剧本，但演员个人对角色的阐释和再现也不容忽视。“角色”并不完全等同于“角色身份”。所谓角色身份，正如在本文第一章中简单提到的，是以“角色”作为基础的个体身份（role-based identity）。如果我们把角色理解为个人在社会组织或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一角色同时存在的社会期待和组织规范，那么角色身份就还包括了个人对角色规范的个人解读和阐释（idiosyncratic interpretations and elaborations; McCall and Simmons 1978: 68）。当行动者将角色内化的时候，才形成身份，行动者围绕着这一内化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角色身份的形成涉及自我建构和个性化的过程。简言之，

身份带来了自我意义，而角色代表的则是社会功能（Castells 1997: 7）。如果我们说译者是一种社会角色，代表了社会中的某一位置以及社会对译者角色所持有的期待；当某个人从事翻译活动，内化并实施了译者角色的社会期待，同时赋予了译者角色一定的自我特色的时候，角色就成为了某个译者的身份。可以看到，所谓的角色身份是由两个方面的意义组成的：一方面是个人在实施某一角色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期待或组织规范；而另一方面则是个人承担角色时所带来的具有自我特色的阐释和再现。这两个方面就是社会角色的常规性和个人认同的特异性。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所承担的角色身份都包含了常规性和特异性这两个方面（the conventional and the idiosyncratic aspects of role-identity, McCall and Simmons 1978: 68-69）。而这两个方面的相对比例因人而异，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所体现的常规性和特异性的比例也不相同。有些人对他们所习得的角色期待添加甚少，而有些人则会对取决于文化界定的角色进行较为极端的修正和阐发，产生“不像翻译”的翻译，乃至其他人无法辨认这一角色，将该个体视为怪人或精神病患者。在翻译实践中，清末译者对原文的大举改写和归化，在当时的社会或被视为常规，但却与现代社会对翻译方法的认识大相径庭；而在翻译理论中也不乏较为激进的主张，如食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是在译者这一角色身份的基础上体现出强烈的特异性。只不过这种特异性的表现在理论层面上并非是译者个体的特异，而是某一群体共同身份（对食人翻译而言是民族，对女性主义翻译而言是女性群体）与其它群体相比的特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这种主张进入到翻译实践的层面，必然是通过作用于某个具体的译者而产生效果的，因此也离不开对译者个体认同的考察。（本文最后一章将要探讨的就是个体与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互动。）

个体承担社会角色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各种对应角色（counter-role）的存在。角色身份是在与他人的角色身份的相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人类社会中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社会角色。个体通过与对应角色之间多种形式的互动和协商来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角色身份（Stets and Burke 2000: 227）。如果说群体身份与相似的其他个体相联系，那么，角色身份就是与相异的他者相联系（Burke 2000: 9-10）。角色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而非平行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一组角色当中，各种不同的角色与其对应角色相互联系和依存，他们在

其中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角色同对应角色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几种。首先同一团体之内不同功能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如在学校中,教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某一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跟译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还有相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如教师同教师之间的关系,译者跟其他译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不同角色看作是一个角色组,其中应该包括了作者、译者、翻译发起人、出版社以及读者等等。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微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像译协这样的组织则是具有相同身份的人(即译者)组成的群体,其目的就在于加强成员间的合作沟通,加入其中的译者通来确认和加强他们共享的群体身份。

综合上述的主要观点,如上图所示,从角色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中译者的翻译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因素在其中的影响:首先是译者的社会角色本身所带有的期待和规范的意义,其次,是译者个体在承担角色之前,在社会期待和规范的基础上对这一角色的理解和阐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实施这一角色的预想;然后是译者在实施角色行为,即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与翻译活动中其他角色的互动时实际的行动表现,也就是翻译结果的体现。此外,翻译活动的具体情境,以及目的等其它因素也都有可能影响到译者角色行为最终的实施情况。

第二节 翻译角色间的内在多重对话

对话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方式。对翻译主体间性的研究虽然确认了翻译并非单一主体的行为以及翻译对话性的存在，但主体间互动对话的途径和方式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从角色互动的角度出发，本文将进一步阐发翻译中以译者为中心的互动对话和角色扮演，并辅以对翻译副文本的分析，提出译者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主体间对话的具体过程，推进翻译主体间性的研究。

一、翻译的互动与内在对话

身份的实现同语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是身份的建构、协商和交流的主要途径（McAdams，转引自 Howard 2000: 371-2）。社会心理学中身份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Mead 所创立的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就包括：人是通过语言来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的，人际的符号互动主要通过自然语言进行。而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有待于协商的中心对象就是身份和身份的意义。身份并不存在于自身当中，而是存在于互动之中。通过语言的互动，人们的身份被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协商、和交流。而随着互动的进行，身份也可能随之改变。通过对一些公共演讲的分析，身份研究的学者尝试说明语言/话语对身份形成和建构的重要作用（如 Woodward 2003: 2-3）。演讲者通过语言区分敌我身份，增强民众对国家身份的认同和凝聚力。

翻译的过程是各种翻译主体都参与其中的对话过程，作者译者以及读者在对话中相互协商和交流，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译者以及其他翻译主体的对话交流过程。对话的结果不仅产生了译文，其中各个主体的身份也得以确立。角色身份既是个体进行互动对话的基础，因为个体的声音一定是基于某一身份而发出的；同时也是对话的结果，因为身份是在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对应角色——也就是互动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说话人当时的身份。译者的身份有赖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存在，正如译文读者的身份有赖于原作者和译者的存在一样。翻译超越了作者跟读者之间的交流，还涉及到译者和译文读者，因此对话的过程变得复杂化，跨越了两种文化，经历了至少两次的交流对话，参与这个过程的主体的身份也通过了两次的建立、协商和交流，前后两次的身

份建构，由于对话者和对话的语境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有些是有意为之，有些则是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考察翻译中的对话，即是对译者翻译过程中心理活动和决策形成的考察，也是对译者在两种文化语境的不同对话者之间如何进行协商调解的探究。如上所述，身份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的交流互动建立起来的，因此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语言当中。翻译中身份的书写主要通过翻译的文本来表现，在选择原文、进行翻译、校对译作的过程中，种种身份的迹象通过最终的译本体现出来。在翻译活动中，译入语文本是主体间对话的场所，在这里，自我的和他者的身份被树立或改变。

在翻译活动中，创作文本的原作者和最终阅读译著的目的语读者作为与译者对话的主要主体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地在场的。这些主体对翻译活动的互动作用就主要是通过译者的内在对话而完成。Douglas Robinson较早注意到了翻译的对话，他在《译者转向》中引述Martin Buber把翻译看作是我-你在当下的对话，而非我-它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并提出了翻译的“对话转向”(dialogic turns; Robison 1991: 97)。然而Robinson并没有就这一主题继续探索下去，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中讨论过关于翻译主体间性的问题，认为“翻译主体”包括如原文作者、目标读者、客户、编辑等其他主体，但他认为这些主体都是“译者的想象”(imagination; Robinson 2001: 164)。Robinson的目的在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但没能够进一步说明其他翻译主体的积极作用，因而走入了过度强调译者能动作用的极端。应当承认，译者积极地进行角色扮演和视角转换是不在场的翻译主体能够影响翻译活动的主要途径，是对话得以展开的根本。如果译者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拒绝与外界的对话互动，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失败的译文。尽管有可能出现歪打正着而受到欢迎的情况，但这种巧合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是大多数译者所采用的工作方式。

实际上，关于“想象”，可以理解为译者“想象”着这些主体对其翻译活动的期待、要求或是反应，在此基础上设想自己的策略，以及对方更进一步的反应。所谓的“想象”也不可以凭空的设想，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译者将其他的主体看作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从他人主体的角度来看自己，此时的自己成为被考虑的客体。即便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一旦被创作出来，也是相对独立的，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也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影响着译者

的决策。

外部的沟通和内在的思维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外在的对话”——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互动都是必须要通过外在的、可见的对话才能完成的，内在的阐释过程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互动方式，符号互动论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可以用对话来说明：“人类社会显示出流动、发展、创造性与变迁的特质……事实上，人类社会是由内在与外在的对话所构成的”（克莱博 1986：113）。

Mead提出，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辨认出他人具有意义的行为，学习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想象他人的意图和期待，并会逐渐扩展视野，从某些群体——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也就是说，学会扮演“普遍他者”（generalized other）的角色，“对自己扮演他人的角色”（“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 toward oneself”；Mead 1934：152-164；McCall 1966：53-54）。¹³由此而产生了自我内部的“内在对话”（internal conversation，Mead 1934：156）。内在对话是个体思维的主要方式，它形成一个渠道，所有外在的对话或互动模式必须由此穿过。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中，普遍他者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指在某个社会中，人们所认识到的，他人关于行动和思想的普遍期待，“普遍他者的态度就是整个社会的态度”（Mead 1934：154）只要是行动者试图想象他人对自己的期待，就可以说他采取了普遍他者的视角。这时，他就学会了以社会整体的眼光来看自己，开始拥有某种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个体可以在自我的内部扮演普遍他者的角色，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从普遍他者的角度来看自己，实际上也是角色扮演（role-taking）的一种情况，只不过这种角色扮演并不是外在的、明确的扮演，而常常是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体现在个体对外界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行动。普遍他者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人们按照这种普遍他者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各种行动路线。当然，这里所强调的乃是有意识地解决问题或实现人际沟通的那种思维过程，而不是无意识或是半意识状态的思维活动。翻译活动显然是属于前者的。译者的翻译过程是有意识的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意识地 from 其他群体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自己的翻译所可能产生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¹³ Generalized other, 又译概括化的他者、概化他人。

关于翻译的对话性研究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中方兴未艾。这与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研究的兴起不无关联。在研究翻译的对话性理论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在于翻译对话发生的方式和途径。正如上文的分析所指出的，翻译中的对话并不全部都是外在的对话，而主要是通过内在对话来完成的。因此，作者和译者之间的时空差距并不会构成交流的障碍。事实上，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早已超越了这一狭隘的理解，将对话看作是不同主体意识间相互作用的不同形式，而并非一定是在相同时空中的直接交流。在巴赫金那里，言语交际并非是单向地从说者到听者的流动，听者的心理活动也是对话的一部分：

实际上，当听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语的意义（语言意义）时，他同时就要对这一言语采取积极的对应的立场：同意或是不同意（全部还是部分同意），补充它、应用它、准备实现它等等，而听者的这一应对立场是从他开始聆听和理解时起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有时简直就是从说者的第一句话开始形成的。（巴赫金 1998d: 150；转引自 李波 2008: 29）

在巴赫金看来，说者在说话时总要考虑听者的各种因素，并据此而选择说话的话题、语调、表述方式，因而，在说者的表述中，总暗含了听者的因素；而听者在言谈中也绝不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也总在积极揣摩说者的意图及其它相关因素，并对此作出反应，从而影响说者。所以，任何表述都是双向的，都具有对话性（参见 李波 2008: 121）。巴赫金的这一论述与 Mead 的符号互动论中关于普遍他者和内部论坛的观点不谋而合。对话的过程就是互动的过程，强调的不仅仅是说和听，而更多的意味着对“说出的和听到的”，乃至是对“将要说出的和将要听到的”，做出回应的准备，强调的是对话的互动和潜在的影响。在这里，尽管对于对话的方式没有明确的讨论，巴赫金的有关论述中也涉及到说者与听者之间对话发生的途径。与巴赫金对话理论为基础的翻译对话研究最大的不同是，本研究将译文看作是对话的结果，而不是对话的方式或桥梁。当然，译文的产生同时意味着新的对话的开始，但并不是说在译文出现之前，对话就无从开始。事实上，翻译的对话在译者考虑从事翻译工作，担任译者角色的这一刻就开始了。此外，说者也并不单是信息的输出者，说者在言说、表达的同时，也在从听者的角度来反观自我，根据他者可能的反应而随时调整自己

的表达。内部对话是个体在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中不断进行的思维活动。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也应合了翻译主体间性的研究。以巴赫金的理论作为其主要理论来源,李波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翻译活动界定为“基于表述的主体间言语交际过程”。所谓的“言语交际”,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意识间的对话。李波正是在巴赫金的对话性概念的基础上,讨论翻译中的对话:

这个渗透着作者表述的声音、先于作者的他者表述的声音、以及译者应答的声音的新的表述,模糊了原文与译文的界限,而它本身作为一个新的表述,即体现和渗透着众声喧哗,却也始终以开放地姿态,对译文读者发出召唤,吸引译文读者参与到新一轮的应答和对话中来。(李波 2008: 115)

李波对翻译“对话性”的讨论是从巴赫金的理论出发的,以“杂语”、“声音”和“众声喧哗”等概念作为其讨论的基础,这里的对话是“众声喧哗”的对话,强调的是各个主体在表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李波进一步将对话放置在主体间性问题之下,分别重点探讨了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前者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过程中——无论理解的结果是否达成一致;而后者则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目的语读者的考虑,如在选择翻译文本时的考虑。当然,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解读应当也是对话一种。综上所述,以巴赫金理论为基础的翻译对话性研究认可了非直接对话交流的可能性,其根本在于译文中“众声喧哗”的特征。但正如李波所言,关于“对话是怎样展开”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李波 2008: 124)。而这一点,正是本小节尝试解决的问题。

自我的内在对话与公开对话的行为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比如说,人们在公开发言之前会计划好他要讲的话和怎样去讲,设想听众的反应并想好对策。再比如,译者在落笔写出译文,以及译文发表之前,要考虑他的翻译和阐释与作者的想法、原文的意义之间的关联,以及译文在目的读者那里产生的效果。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通过各种选择进行暗中思考,尤其是在谈话的对方可能会误解其陈述时。这种主观上的思维过程涉及一个人自己的观点和他人观点之间的位置的反复变换。这一过程在译者翻译的时候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翻译和修改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反复思考他做出的翻译选择会产生怎样的效果,相对于原作和原作者的意图有何不同,以及在译文读者眼中会如何呈现。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他人的态度和期待会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可能每一个译者都完全按照社会对译者工作的期待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个体的自由性和自发性依然拥有者极大的空间。此外还有情景、目的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更何况读者群体也是由众多个体而组成的，互动的对象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和复杂的存在。

二、翻译对话的过程分析与对话的多重性

译文作为翻译的最终产品，体现的是译者思考的结果而非过程，这成为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内部对话”进行实证研究的最大困难，使之由于缺乏考量的依据而成为“纸上谈兵”。在这种情况下，将译者对自己翻译思考过程的记录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可以帮助我们验证翻译内部对话实现的具体方式，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依据，同时丰富和拓展原有的理论探讨。¹⁴

本小节的分析对象是一篇短文英译的译者注释，以此来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内部对话，考虑作者、读者等其他主体的想法以及对译文可能产生的反应，并以此来决定译文的情况。这种身份的转换以内部对话的形式，完成了译者与翻译活动中其它参与角色的对话，参与翻译的各个主体的角色身份也由此建立。

《无题的风景》是一位女作家于晓丹的微型小说，全文四百余字，讲述了一个女人在女友的陪伴下拜访离婚一年的前夫，而其前夫不在家中，无缘再见的情景。短文主要是描写该女友在他们以前的家门口徘徊等待，猜测前夫是否回家的过程，表现出女性微妙的心理感受。原文第二句如下：

原文：

“一个女友让我陪她去那个老地方。”

译文：

“A female friend of mine asked me to accompany her to that same old place.”

（孙艺风 2003：165）

¹⁴ 一般而言，文学翻译作品中并不会出现译者详细阐释自身翻译过程和考量的注释。本文分析的这篇短文原载于翻译学术刊物《中国翻译》，译者孙艺风本身亦是一名翻译研究者。译者作为研究者的身份特征在其对自己翻译的注释和分析中体现出来，他在注释中详细阐释了自己的思考的过程和翻译选择的原因，成为本研究和分析对象之一。

译者在注释中详尽地解释了他将“一个女友”译为“a female friend of mine”，而不是一般习惯所用的“girl friend”的原因。他讲到：

从本文的语境，读者可以感觉到文中的“我”是女性，依据是：如指男人的女朋友，一般会说“一个女友”。再者，一个想念自己前夫的女人，大约不会带一个男人一同去看他，除非想故意气他。女人的同性朋友，不用girl friend为好，以免产生误读：1) 以为“我”是男性。2) “我”是女同性恋。本文的语境几乎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孙艺风 2003：166）¹⁵

细读这段译者注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译者孙艺风思考的角度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首先他说“读者可以感觉到”，很明显，这里的“读者”是指汉语原文的读者，译者此时是从原文读者的角度在解读原文，身处于源语文化语境当中。译者从事翻译，首先要做的就是阅读原文，成为原作的读者，之后的翻译才有可能进行。译者的解读（或者说阐释）又要比一般的读者更加深入详细，因为一般的读者不会在阅读过程中做如此细致的分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译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差异。

作为一名读者在对原文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译者认为首先考虑的是关于叙述者的性别的问题，因为原文中并没有明确表明叙述者的性别，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明确“女友”这个可能会引起误会的词的译法。在解决叙述者的性别的问题时，译者没有仅仅停留在一个角度来考虑。他判断的依据有两个，这两个依据都是基于“叙述者是男性”这一个假设：依据之一，如果这位叙述者（即文中的“我”）是男性，他不会称自己的女性朋友为“一个女友”，既然称作“一个女友”，那么“我”很可能是女性。这个依据是发自叙述者的角度，译者的考虑是“如指男人的女朋友”，也就是说如果叙述者是男性他会用什么词。这里，孙不只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而且是男性的角度考虑的。此时，译者的思考角度是多重的，不仅从叙述者的角度来考虑，而且加入了性别的纬度。

依据之二，“想念自己前夫的女人”，即文中拜访前夫的那位女性，“大约不会带一个男人一同去看他，除非想故意气他”。根据这篇短文的情节可以推断，

¹⁵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略同。

“我”并不想惹前夫生气，因此“我”应是女性。这里，译者的思维角度再次转换，把自己置于小说中的场景中，并且跨越性别的疆界，站在文中**女性人物**的角度，设想如果一位女性带男人同去前夫家里，会是怎样的心态。他的视角在这里仍然是双重的，并且与他自身的视角——男性译者——完全不同。根据以上两点，译者判断叙述者为女性，因此决定将“女友”译为“a female friend of mine”（中文直译为“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译者如此翻译“女友”是为了避免按照通常办法将其译为“girl friend”——这毫无疑问是最普通常见的译法——因为可能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是译文读者的误读，可见译者此时的思维角度是发自**译文读者**的，考虑译文读者看到“girl friend”产生的理解。此时的孙艺风是身处于目的语文化语境当中。他把自己放置于目的语读者的位置审视译文，预测可能出现的误读，从而在译文中采取措施，预防这种误读的发生。

本研究的目的并非要评论这个译文是否是最佳选择，而是尝试从中分析译者翻译心理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与其他翻译主体之间的互动对话。从这段短短的译者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孙艺风在翻译“一个女友”这个看似简单的词语的过程中试图扮演的多种角色和采用的多向度视角。从参与翻译活动的角色群来看，他分别充当了原文读者、译文读者、叙述者和文中人物的不同角色；在文化层面上，他穿梭于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之间，甚至进入了小说虚拟的空间（这是属于原语文化语境的一部分，并随着翻译的完成而进入目的语的文化语境）；而在性别身份的扮演而言，他既从男性的角度，也从女性的角度，还包括了同性恋的角度，来审视原文和自己的译文。

这段译者的翻译注释展示了角色互动对话在翻译中的复杂体现，充实了在上文理论探讨中未能涉及的一些方面。通过想象的角色扮演而完成的对话，其对话的对象并不仅仅代表整个社会的所有其他人的整体。普遍他者也是多元化的，如家庭、政党、朋友圈等等，都是不同的普遍他者的群体。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显然就代表了翻译活动中与译者进行互动对话的两种不同的他者群体。然而，就某一作品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其作者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是具体的而非概括的，尽管作者也会带有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普遍性特征，但其特殊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这一点，在互动理论中也有所

论及，但并未深入讨论。人们通过扮演他者的角色来进行互动，这个他者可以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他者，也可以是更为具体的某个群体，甚至某个个体，当个人思考的是与某一特定的人之间的互动活动时，他所考虑的就是这个特定的人会对自己的反应。事实上，除了考虑普遍他者，也就是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期待之外，个体在大多数社会角色行为中进行互动对话的对象多为其对应角色，即较具体的他者（more specific others）。符号互动论和身份理论作为关于社会行为的普适性理论尽管在分析社会角色行为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具体到不同的研究领域，比如本文所讨论的翻译活动，还是有必要针对互动对象进行细分。这也是在理论借鉴中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之处。

此外，如上这段译者注释体现的另外一个现象是，翻译中的互动对话并非是一对一分别完成的，它不只是译者同作者，译者同读者间的双向对话，而是包括了多个主体以及不同层面的和多向度的交流互动和协商。完成社会角色的个体——在这里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进行的互动对话，既包括外部对话，也包括通过角色扮演进行的内在互动对话；对话的对象既有代表整个社会群体的目的语读者，或者目的语读者中的某个特殊群体（如女性读者），也有作为特定的他者的原作者，还有以机构或集团形式出现的赞助人或组织者。此外，在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被创作完成之后，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他/她同作、译、读三者之间同样存在着对话关系。此外，他/她们的关系也不是单一的，正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多重身份，翻译的角色对话也是多重的。他/她们在身为译者、作者、读者和文中人物进行对话的同时，也同时进行着性别间的对话，同时也可能是文化间的对话。多重的角色对话关系在翻译中交叠重合，构成翻译主体间性的多重空间。译者在其间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尽力去理解各种不同的他者、力图从他者的角度考虑，只要译者的努力是有效的，他者的声音就可以透过译者传达出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通过角色扮演和内部对话的方式，使其它主体参加到翻译活动中，与译者主体构成主体间、性别间和文化间交互对话的关系，参与译文的完成。

无论是中文的“对话”还是英文的“dialogue”都暗含着进行表述与应答的是两个主体。但事实上，翻译活动中互动着的主体并非只有两个，并且译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常常是同时交互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Mead 在描

述内部对话时所使用的另一个词“内部论坛”(inner forum)就显得更为合适(Mead 1922: 160; 1925: 272)。Forum 的概念超越了 dialogue 所暗含的只有听者和说者双方参与的意义,展示了翻译中以译者为中心的多向度对话。在翻译的互动对话中,同时存在着说者、听者和协调者,一个说者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听者,而一个听者,常常也需要考虑不止一个说者。译者对话的对象并非单一的,而是同时面对着原作者、译文读者,以及翻译赞助人(组织者、审查者)等多个主体,而翻译的结果也并不是译者仅仅与其中某一方对话的结果,而是各方主体互动协商的结果。在《无题的风景》中,主要人物(前妻)的性别身份是女性。所以译者不单要从人物的角度进行分析,还要考虑人物的性别身份是女性,而且是一位在离婚一年后想念前夫的女性。当然,这只是身份的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原文读者和目标读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中,文化因素也增加了身份的复杂性。因此,翻译中的对话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层面的概念,而是涉及了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性别身份的不同主体。

如前文所述,翻译主体间的对话是通过译者的换位思考和角色扮演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味强调其对应角色的主体作用,而忽视译者自身的主体意识,译者也许就成了缺少自我意识的传声筒,而导致译者的自我迷失在他人的观点和声音之中,只听到他人的声音而他自己变成了无声的(沉默的)。此时若不同的主体的声音出现冲突(在翻译中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如作者的意图同赞助人的要求有冲突),对话就变成了混乱的喧哗,而造成翻译结果的不可理解。在这个时候,译者的主体意识是必要的。他/她必须在这些翻译主体间进行协调、周旋,做出适当的判断和决定。译者角色的完成要求角色与对应角色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互动,过于强调或者忽视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无效的翻译。译者自我的过度张扬也有可能导致翻译成为译者的独白。译者有必要倾听他者的声音、与他者进行交流,这是翻译得以完成的前提。

即使是在女性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大鼓励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他者的声音也得到充分的尊重。例如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译者”的 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 提倡在翻译中采取的女性化语言,但她会“在取得雇主的同意后,会添加译者注释,清晰地表明‘您将要读到的译文采用了每一种可能的语

言策略来使女性在文本中显现”（1991：101；着重为笔者所加）。de Lotbiniere-Harwood 的译者注释是译者、雇主、及目的语读者之间协调的产物。但如果她的注释策略不被雇主或目的语读者接受，de Lotbiniere-Harwood 也承认说，根据不同语境，她“也可以被迫翻译作者使用的男性特征”（同上）。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决定违背她自己的女性政治，而跟其他翻译主体妥协。当然，她也可以拒绝进行翻译，以忠实于她的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这是在协调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的两种极端结果，要么是译者被迫妥协，自我认同遭到伤害；要么是译者拒绝翻译，导致跨文化的交际无法实现。当然，de Lotbiniere-Harwood 在这里与雇主的对话是外在的交流协商，而不是内在的角色扮演。

如上所述，翻译活动虽然表面上看来是由译者一个人独立完成，但在译者实施角色行为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其对应角色的影响，是在跟其他角色的互动和对话中完成自己的译者角色的。除了译者角色之外，翻译活动的完成还有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社、原作者、原文和译文读者，以及文学人物等其它角色的参与，他们就是译者的对应角色，与译者共同组成翻译活动的角色关系网。译者通过角色扮演，以内部对话的方式与他的对应角色进行互动、磋商和对话，从而完成翻译活动。

通过对翻译的副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的其它角色声音的发出和被听到要求译者积极主动地角色扮演。译者翻译是在对话中完成的，对话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其界限和限制。翻译并不是作者的独白话语，也不是译者或其他翻译主体的独白。相反，翻译是一场所有主体都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对话，而译者角色的完成意味着他成为这场对话的协调者和中心。

必须承认的是，翻译研究中对译者的“inner forum”的研究在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人类心理和思维的复杂性和非直观的特性成为对译者心理状态研究的最大障碍。如本文所采用的译者注释此类的分析材料，也大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毕竟大多数译者都不会专门去记录自己翻译时的心理活动，更何况这类的考虑很多时候也都是一闪而过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 简称 TAP）也许可以用来进一步地为翻译内部对话提供实证性的资料，这也是本研究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之一。

第三节 互联网翻译中的角色互动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信息全球化的到来,译者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除了为译者获取信息带来了便利,还改变了翻译出版的模式和发布渠道,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翻译这种新的翻译形式开拓了翻译互动对话的视野,对传统的译者/读者/评论者的角色身份认识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翻译方式以纸质出版为主要发布的渠道,造成了出版社在翻译的策划、发起和出版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译者虽然在选材上仍有一定的自由,但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制于出版的限制。如果译文无所发表,那么翻译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社会活动的价值,成为译者个人的行为,无法造成相应的社会影响。出版方式决定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对话很大程度只能通过内部对话的形式,读者作为主动的主体直接对翻译结果产生影响几率很小。然而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译者的工作方式,成为完成翻译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布平台,译者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着他的社会功能。在这里,译者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出版的限制,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布自己的译文。本节将以互联网的自发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这一平台上译者角色的具体表现,在互联网这一平台上直接体现的翻译中各个角色间的互动表现也是将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任何与网络相关的翻译形式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是应用型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在此类翻译中,译者的角色并未呈现根本性的差异,改变的只是帮助译者工作的手段。此外,还有一种与互联网紧密相关的翻译活动是利用网络作为交易平台,为译者和客户提供信息和媒介。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所扮演的是翻译公司的角色,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¹⁶在这种翻译模式中的译者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译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因此也不属于本文目前要讨论的范畴。本文所指的“互联网自发翻译”是指具有双语知识互联网用户自发无偿地翻译各种外语资料,并将译文发布在网上与其他互联网用户共享的一种翻译活动。他们并不以获取酬劳为目的。

¹⁶ 相对于翻译公司而言,互联网这个平台的信息交换和选择都更为开放和自主,译者通过竞争的方式承接翻译任务。供求双方可以进行自主的选择,而双方利益也都可以通过网上付费系统得到有效的保障。此类网站上涉及到的翻译的文本大多属于应用性质的,如合同、说明书等。

这些翻译可能是单独进行的，也可能是多人共同进行的协作翻译。

互联网为媒介发布译作的翻译活动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是 2007 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简称哈 7) 中文网络版本的流行。2007 年 7 月 1 日,《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的英文版在全球同步发行,中国一群喜爱《哈利·波特》的读者随即开始自发组织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在 9 天内发布在网站上。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方中文版在 3 个月后才推出市场(陈赛 2008: 108)。《三联生活周刊》对此次翻译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韩斌进行了采访,据韩斌所言,参与翻译的网民是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哈利·波特迷中招募的,主力是大学生,还有不少是高中生。他们通过网络组织分配任务、合作翻译。他们的翻译工具和资源也主要来自网络,并且参考前六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哈利·波特》,期望在语言风格上保持一致,并表示对曾翻译了五部《哈利·波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者马氏姐妹的尊重(陈赛 2008: 108)。¹⁷事实上,哈 7 的网络翻译风波只是长期以来网络翻译日渐兴盛的局势引起媒体关注的一次事件。在此前后,在网络上各式各样的自发翻译形式早已悄然兴起——从热门美剧、电影,到网络游戏;从日本漫画、体育新闻,到科普文章;从到西方精英媒体,到著名博客内容——翻译的内容涵盖范围极广。这些“互联网翻译家”(陈赛 2008)渐渐聚集在一起,在特定的网站和空间发布自己翻译的内容,逐渐形成规模,并开始合作翻译一些较大规模的翻译项目。一些提供相应平台的网站也应运而生。

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然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却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文信息远远落后于以英文发布的第一手信息和理论,而传统的翻译出版方式跟不上整个社会对于信息的大量和即时地需求。自发翻译网站“译言”的创始人之一赵嘉敏认为,“如果没有网络翻译,国内的信息比国外至少落后半年以上”(朱步冲 2008: 11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译言网”(yeeyan)等一批以翻译外文信息为主要内容的

¹⁷ 事实上,2003 年的《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和 2005 年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都曾引发网络翻译的风潮。哈 7 的翻译之所以引起如此的关注是因为其引发的版权问题。据美联社 8 月 1 日报道,拥有中文版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此感到不满,投诉了有关翻译版本。尽管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的法律行动,这个“哈迷”的网站主动停止了其翻译活动,并发出告示:“翻译组即日解散,翻译活动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停止!!! 翻译哈利波特 7 不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只是网友间的兴趣爱好交流,只是学术研究而已!!”。版权问题成为互联网翻译继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网站。¹⁸ 这些网站的目的，可以从它们的自我定位中窥见一斑。成立于 2006 年的“译言网”旨在打破互联网上的语言壁垒，将目标指向“发现、翻译、阅读中文互联网外的一切精华”。这是译言被封锁改版之前的“宣传口号”。在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之下，译言网曾被封锁一段时间后重新改版，改版后的口号是“发现、翻译、阅读外文精化”。改版后的译言少了翻译“一切”的雄心，对政治新闻和评论方面的翻译也明显减少。随后出现的同类型网站“驿路”在自称“精品双语译文，通向世界之门”，并以“你喜欢看外文吗？喜欢翻译东西分享给别人吗？”来招徕翻译志愿者。¹⁹ 另外一个以科普文章为主要内容的网站的翻译项目“小红猪翻译项目”则以“抓住当前翻译界漏网的大鱼（主要是《新科学家》和《纽约客》）为目标，戏言要“将鬼子的秘密文件毫不怜惜地窃取，并将破译事业进行到底”。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类似网站及个人博客等，本文不再赘述。

在互联网上，译者不再是少部分人从事的职业，而成为任何懂外语的人随时都可以参加的一种业余活动，兴趣与爱好是他/她们进行翻译的主要动力。对于普通的互联网用户而言，这一平台使得任何有兴趣的人都获得了参与翻译活动、沟通中西文化的机会。翻译的原文可以从网站提供的原文库中获得，也自己提供原文，还可以推荐原文供其他人翻译。完成的译文将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互联网用户阅读。

而作为读者，可以随时阅读其他人翻译出来的最新信息。有趣的是，在网站的阅读版面上，读者可以选择只读中文译文，也可以阅读双语对照版本。这一点是与传统的翻译出版方式较大的差别。一般而言，除非是某些双语对照读物，大部分的翻译文本是以目的语出版的。因此而若非对翻译情况有较大的兴趣，一般读者是不会特地再去找来原文对照阅读的。网站提供的双语对照阅读模式显然为对原文和翻译感兴趣的读者带来了极大地便利，也为译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切磋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译文质量的监督和改进提供了条件。

由于网络带来的便利条件，一般的读者可以积极直接地参与译文的评价甚至修改的过程中。在每一篇译文的下面，读者可以点击“顶”字（网络语言，意为“支持”）来表达对译文内容或质量认可，以及对译者工作的支持。²⁰ 除了表示支持，

¹⁸ 译言网址为：<http://www.yeeyan.org/>。

¹⁹ 网址为：<http://www.eluu.com/>。

²⁰ 译言的旧版甚至还有“评分”的选项，读者可以就译文的质量进行评分，最低 0 分、最高 5 分。改版后的

读者还可以在译文的文本中插入“眉批找茬”，就具体词句的翻译进行讨论；或者在译文后进行评论，评论既可以是针对译文质量，也可以是针对译文内容。在这里，读者可以随时转换角色成为译文的评论者，而且其评论相对于传统的翻译评论而言，对译文和译者，以及其后的读者都能够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互联网翻译的模式打破了传统翻译手段中译者大部分时间要独自完成工作的局面，它不但为译者与译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且也打开了译者与读者和评论者之间直接交流的通道。从译者这方面来说，网络为译者的工作开辟了新的局面。译文前的简介部分主要用于介绍译文的主要内容，很多译者也在其中说明自己选择翻译该文的原因、翻译的策略等情况。简介实际上发挥了传统翻译手段中“译者前言”的作用，而且更加自由。译者甚至可以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寻求帮助，利用眉批、注释和简介等方式，把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考量依据、思考过程、以及不能确定的地方指出标明，向具有相关知识的读者征询意见。就读者而言，仅仅通过点击就可以地表达自己对某篇译文的看法，如“感谢译者”和“译作评分”；也可以通过“眉批”和“评论”等网络交流手段发表自己的看法，指出译文的不足，甚至提供修改意见。所谓的读者不再是仅仅阅读翻译最终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积极参与翻译的过程，将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意见。具有双语能力的读者还可以通过阅读双语对照版本对译文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在互联网翻译中，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得到加强，对译文的影响更为直接。译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随时得到读者的反馈信息，使得译文在发布之后也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而发布的译文不再是最终的版本，译者可以根据读者/评论者的意见随时进行修改。一些协作翻译项目中，合作的译者还可以直接动手修改，完善译文。除了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之外，通过网络，译者与译者、译者与网站组织者等不同的角色之间的沟通也更加灵活和及时，不同的角色在互动对话中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共同促成诸如网站功能、译文生产与发布等各方面与翻译直接相关活动的完成。

以“译言”为代表的翻译网站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的是类似于出版社的角色，但又有所不同。他们负责提供原文、组织译者翻译（以更松散的方式）、译文质

量审核、提供译文发布的平台等，这些功能与传统的出版社所担任的角色并无太大差别。但是相对而言，网络译者群体有更多的自由。网络译者的群体比传统的译者更为广泛。开放的注册系统使得任何人，只要具有双语能力并且对翻译感兴趣，都可以成为网络译者的一员，为翻译和传播外文信息做出贡献。网站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翻译志愿者（包括读者/评论者），这些大量潜在译者的汇集形成了一股不同于传统译者社会角色的自发翻译力量。尽管其中一些人的目的可能是以翻译为途径来学习英文，但这并不妨碍其进行跨语际的交流，为其他不懂外语的互联网用户提供帮助。从社会角色身份的定义而言，这些人同样也担任了译者的角色。此外，译者在翻译的选材、翻译的时间等方面获得更多自由。从表面上看来，自由发布的机制难以保证发布译文的质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读者（其实也包括了大量其他的译者）可以随时阅读双语对照版本，再加上读者可以以各种方式对译作进行评价，这就使得任何一篇译文都被放在了放大镜之下，译文的优劣在通过评分、推荐和评论可以一目了然，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译文的质量，或者至少后来的读者可以根据之前的评价或者译者的经验等信息而决定是否阅读某篇译文。此外，网站本身也设有译文检查制度以及优秀译文的奖励制度，以防止低劣译文的出现。

翻译中的内在对话在互联网翻译模式当中以外在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过程中的内在对话因此而停止，相反，由于读者/评论者的随时在场，反而会更促进译者对读者/评论者反映的积极想象和应对。翻译得内在与外在对话共存于互联网翻译这一形式之中，其中内在的对话是任何译者进行翻译的根本，而外在对话是在网络翻译这一特殊的语境中所外在表现的角色互动形式。

在本章写作的过程当中，“译言网”经历了从创立发展到逐步兴盛，从“被封”到重新定位后再次运行的经历。“译言”被查封的事件意味着所谓网络也并不是能够免于审查（*copyright-free*）而完全自由，大量的时政评论和外媒报道是译言被封的主要原因。²¹译言的被封锁与回归再次证实了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必然是各方协调互动的结果，而协调的各方不仅仅是直接参与翻译的个体，还

²¹ 译言曾经取得包括《卫报》、“读写网”、《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创业者杂志》《科学美国人》等等国外媒体的许可，获准翻译并发布来自这些出版物的文章内容。

包括了代表社会各方利益的组织机构，甚至国家政府。因此可以说，在微观语言层面上，译者必须要考虑译文中的文化传达和语言选择的问题，以达到交流的目的；而从较宏观的角度而言，译者（这里并不是指某个单个的译者，而是指译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这里以“译言”为其代表）也必须考虑政治意识形态、出版市场、以及其它相关组织机构等因素，只有将这些内容纳入对话，才有可能真正达成有效的翻译。与其说重新明确网站发展方向是对政治审查制度的妥协，倒不如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毕竟时政的内容只是交流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保留并壮大自我是进一步的对话协商的基本前提。在译言查封与重开这个互动过程中，由译言所代表的译者群体以减少时政题材的翻译为代价，换取网站生存，使得互联网翻译这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可以有更稳妥的发展和壮大，使更多的译者和读者可以从中获益。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翻译的代表网站“译言”在改版之后的发展呈现与实体出版社合作、集结网络翻译出版的转型趋势，不少译者通过这种方式获取酬劳。这种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尝试解决网络自发翻译最棘手的问题——版权——的努力。关于这一点并非本文的重点，不再深入探讨。但即便如此，译言这样的网站的存在也并非完全沦为实体出版的一个转介站而已。以兴趣和分享为其基础的翻译网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翻译体系所存在的缺漏之处。网络翻译集结大量的译者，构成了一股社会力量。尽管译者个体进行文本转换翻译的过程并未有实质性变化，但出于兴趣而进行翻译分享的志愿者译者群体出现及其对译者社会角色的改变确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目前，关于互联网翻译这一新的翻译形式只是有一些媒体关注（如《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尚未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本文的探讨基本上围绕着网络译者的角色互动进行的，新的翻译形式下译者工作方式的转变及其对翻译研究带来的启发虽在本节中略有涉及，但仍需深入发掘。此外，关于互联网翻译的研究话题还有很多，除上文所提及的网络译者群体的社会角色之外，还可以就翻译文本的类型和题材选择进行分析、此外译文对比分析、翻译副文本（包括文章简介、译者前言、尤其是译文眉批评论和译者的反馈）等都是翻译研究尚未触及的范围。

本章小节：

译者的角色身份研究是针对译者之为译者的身份本体的研究。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来探讨译者身份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从译者这一社会角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属于对译者个体与整个社会的关联的研究；其二，在微观范围内研究译者角色的实施情况以及翻译群体中不同角色间的对话互动，是对译者与翻译相关的其他个体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本章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后者。除了译者身份本体之外，作为译者个体的一些其它身份也在翻译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或影响，在随后的各章中，本文将分别讨论译者的其它身份与翻译活动的关联。

第三章 译者的群体身份——性别身份的选择与表演

与角色身份不同的是，群体身份是一种更具有弥散性质的身份类型，也就是说它并不与某一特定的技能或社会角色相关联，而是一种主身份（Sets and Burke 1996: 195）。²² 无论是在翻译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一个女性的性别身份总是有意义的，总是可能影响其在互动中的行为方式。在许多情况下性别身份都可能超越主体的其他身份特征，成为影响其行为的主要身份。性别身份的这一特性也构成了性别问题能够与翻译相结合的基本条件。性别身份在翻译活动中并不是处于隐匿的状态，相反，性别是一直在场的，而且在特定情况中被激发就会成为直接影响翻译结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性别与翻译结合的过程中，身份，尤其是性别身份，始终是其中的根本问题之一。女性主义翻译的出现源自女性译者对女性身份的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男性文本的抵制和疏离。这种身份的认同或疏离通过译者的主体行为表现在目的语文本和相关的副文本中，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在这里，性别、身份、语言、翻译与主体等概念之间相互勾连交错，正如Simon所指出的，“性别与翻译为研究语言中的身份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母体”（matrix；Simon 1996: X）。在这个母体中翻译与身份的关系得以充分展现，本章的主要任务在于从身份的角度分析和解释女性主义的和与性别相关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通过参考身份理论中关于身份的显著性（identity salience）和身份激活（the activation of identity）等相关概念，分析译者的性别身份在翻译中被激活的各种情况和影响因素，为女性主义翻译活动提供另一个解释的角度。²³

第一节 女性主义者还是译者？——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选择与承诺

女性主义翻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多重身份的选择和排序。本文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对进行女性主义翻译的译者而言，她究竟是作为一位译者在进行

²² 关于“主身份”，参看本文第一章注释 12。

²³ Salience，在另外一些文献中也译为“突显”。如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第 48 页，（载于《社会科学》4（2008）：46-53）。

翻译工作，还是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进行女性运动，或者是这两者兼而有之？是否可以用身份选择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节首先以社会心理学中的身份选择理论出发，讨论在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结合的过程中，翻译实践及其相关讨论中出现的不同的性别身份认同方式，并将其总结为女性主义的和具有性别意识的译者。

一、身份选择的理论分析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性别（gender）的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当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性别，性别可以作为一种位置或地位（position/status），那么研究的方向就是考察某一特定类别的人们（男人、女人、或其他）的地位和所附加社会期待，他/她们是如何行动，以及在互动中是如何被对待的；而当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性别，它就可以被作为一种个人的身份，那么研究问题就是人们反省自身作为女性或男性的意义所在，以及这种自我意义是如何指导人们在互动中的行为的（Sets & Burke 1996: 193）。但事实上，性别的社会地位和性别的身分是在互动中同时产生并保持的（simultaneously produced and maintained；同上）。个人对自我性别的认识和以此为基础的互动行为的形成，与这种性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期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性别”同时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和他/她对自己的看法。反观在翻译研究中，女性主义翻译在讨论翻译与女性在各自等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时，就是从某种性别（女性）的社会地位出发来探讨翻译中的性别问题的；从译者个体出发，探讨译者的性别身份对其翻译结果的影响的时候，则偏重于考察译者对自身性别意义的认识以及这种性别意义是如何影响其互动中的行为的。如上所述，这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译者对自我所认同的性别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地位的认识，恰恰成为其在互动行为（即翻译）中采取态度立场的重要依据。译者与女性在各自等级关系中被贬抑的状况也正是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和理论肇始的根本原因。

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理论对身份选择的解释开始于对个体多重身份的活跃（active）和不活跃状态的区分。个体是由不同的身份构成的，每个人所认同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身份的组合。这些身份并非同时都处于活跃的状态。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的身份。当身份由隐性被表现

出来的时候，我们称某一身份被**激活**了(activate)。被激活的身份不同，也就决定了个体所选择行为的差异。“某种身份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激活”就成为身份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针对这一问题，Stryker 和 Serpe 用实证研究验证了“承诺塑造身份显著性，进而塑造角色选择行为”的等式(commitment shapes identity salience shapes role choice behavior)，他们认为，身份的显著性是影响在什么情况下、哪一个身份会被激活的条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Stryker and Serpe 1982: 199-218)。所谓身份的**显著性**(salience)就是指身份被激活的可能性，或者是被激活的准备状态(the readiness to be activated)，显著性越高的身份越容易被激活。决定显著性排序高低的因素多种多样，身份理论用承诺(commitment)这个概念来概括。所谓**承诺**是指个体跟某些活动、组织或角色伙伴联系程度的强弱，这些活动、组织或角色伙伴同个体的某一身份相联系。承诺的程度越强烈，则身份的显著程度越高，在某情境下激发该身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Stryker and Serpe 用承诺和显著性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在一个闲暇的下午，为什么一个男人带他的孩子去动物园，而另一个跟同伴去打高尔夫？”根据身份理论的解释，答案在于这两个男人以家庭为基础(如父母儿女)的身份和以友谊或娱乐为基础(如打高尔夫)的身份的显著性不同，而这又来源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庭和娱乐活动的承诺的程度不同。如果一个人对家庭的承诺远远高于他对娱乐活动的承诺，在同等条件下，这个人会倾向于选择履行自己与家庭相关的身份职责。当然，除了由身份承诺导致的行为选择之外，影响个体在某一时间选择某一特定活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在女性主义翻译活动中，女性主义译者选择突出自己的性别身份，在翻译中为女性说话的做法，同样可以解释为这些译者对自身作为“女性”的身份有强烈的承诺，因而她们的女性身份，或者说女性主义者身份，在她们的翻译过程中被激活，处于活跃状态，进而影响她们在翻译互动中的行为。然而，仅仅以承诺程度不同来解释身份选择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显然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通过身份显著性的高低来体现的承诺强调的是个体对于自我的定位，是个体内在的因素。除此之外，外部的因素，如**情境**(situation)或曰**语境**(context)也是影响身份选择的重要因素。有时候，特定的情境就限定了个体被激活的身

份。此外，**对应角色**（counter-role）也可以被看做是情境的一个方面，比如当一个学生面对老师的时候，被激活的身份是学生，而当他/她面对家人的时候，被激活的是其与家庭相关的身份（儿子、女儿、兄弟姐妹等）。除了内部和外部这两大因素之外，也不可排除其它的一些因素会影响身份激活，比如个人的**目标**或者目的，激活某一身份后可能的**得失**（这里的得失并非只是物质方面的），这些都会影响个体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形下的身份选择和角色行为。本章随后的讨论过程中将分别涉及这些影响译者身份选择的因素。

译者的身份当然不止是“译者”这一个而已，除此之外，译者还具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份，而这些身份所带来的译者对自我的界定和期望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的其他身份在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是处于隐性的状态，是不活跃的，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翻译的结果。但是，像民族国家、文化和性别身份这些属于主身份的一些身份认同，已经被深刻地内化为主体的自我概念，构成了主体自我认同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此随时可能在翻译中显露出来，构成影响翻译结果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当翻译的文本、语境、原作者等条件构成某一身份激活的外部因素，再加之译者自我概念的內部条件，共同促成了翻译活动中被激活的身份和导致的行为选择。

二、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选择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其出现、发展到广泛传播，都伴随着对身份问题的追问。女性主义翻译始于一批加拿大从事翻译活动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中的一些人原本就是女性主义者，还有一些是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的过程中开始认同女性主义思想的。性别身份对这些译者而言并不仅表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区分和社会期待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意识，而更多的是对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深刻认识，以及投身于改变现有性别等级制度的强烈的使命感。对于这些人而言，性别身份——或者更准确的说，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是她们的**主控性身份**，她们对性别相关问题非常敏感，在社会的互动行为中会更多地受到其性别认同的影响。这些女性主义译者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她们既是译者，又是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者”和“译者”这两个身份的选择或者侧重不同，就可能导致翻译策略上的巨大差别。

女性主义的发展以及女性试验性写作的出现构成了女性主义翻译出现的具体语境。在这一背景之下,女性主义译者的性别身份更容易被“激活”或曰“激活”。女性主义者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改革派,认为语言中的女性歧视内容是社会现象的反映,是可以通过诸如采用“非性别歧视语言”(non-sexist language)等方法来改变的;另外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导致女性被压迫的重要原因,认为语言是男性的父权的语言(patriarchal language),女性是被排除在外、无法言说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对父权语言进行大规模修整。在后一观点的基础之上,女性主义作家们开始进行写作试验,她们批判、重写、甚至颠覆已确立的语言规范、标准句法和文学类别,试图通过这种彻底的改变使语言能够为女性所用。试验性的女性写作形式多样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女性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欧洲与英美及世界其他女性主义者间的合作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具有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而对女性实验作品翻译的需要使问题更为复杂化。在魁北克,多种语言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性,语言以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翻译,常常被用来作为教化的手段和重塑身份的支柱(Brisset 2000: 343-375)。而法语的性别显性词汇使性别中的语言问题更为凸显。正是翻译这些试验作品的一批女性主义译者的实践和理论反思构成了女性主义和性别的话题在翻译研究界兴起的开端。

女性主义翻译观在其形成初期即以女性运动为其时代背景,以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特殊的双语社会为其社会背景,以激进的性别语言观为其理论支撑,以鼓励语言改写的女性主义试验写作为对象,由女性主义译者和作家共同参与而产生的。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译者身份激活的具体语境。女性主义、性别与语言的发展,以及翻译研究中对语言和翻译的政治性的发现和重视都说明了女性主义翻译出现的必然性。正如 Flotow 所总结的,女性主义翻译是魁北克女性作家实验作品的直接副产品;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中特定的写作实践亲密相关的现象,是上述社会实践相联系后的特定产物(Flotow 1991: 74),女性主义翻译可以说是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主义译者虽然人数不多,却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一种译者的身份选择方式,对女性身份的强烈认同和承诺感极大地影响着她们的翻译选择。

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造就了一大批的女性主义译者,她们对“女性主义者”

的身份有着更强烈的承诺，女性（主义）的身份相对其他身份更为显著，因此更容易在某种情境下激活她们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被“政治化”了（politicized）的这些女译者在重新面对存在着意识形态冲突的文本时，认识到中性的写作或翻译是不可能的，其性别身份（女性主义者身份）在翻译女性作品的过程中被激活。她们认为“以女性的名义重写”应当是一种自觉的行为（de Lotbiniere-Harwood，转引自 von Flotow 1997: 27）。因此，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的基础上，她们采取了介入式的（interventionist）翻译方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她们选择在翻译中把“女性主义”的政治议题置于优先地位，重新制定翻译的标准，要让女性/译者的声音被听见。如果原文中存在着同女性主义原则相抵触的一些因素，而按照普遍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可能会与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认同发生冲突，这时一些女性主义译者会选择不再遵从于对译者角色的传统期待和评价标准，而采取颠覆性的翻译策略，积极干涉原文当中“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改正偏离女性主义的文本，宣扬女性主义精神（Flotow 2004: 24）。如 Levine 在翻译 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 充满操纵、压迫的男权作品时，就对原文进行了改动，削弱了文中的父权思想（Levine 1991）。这种干涉主义的翻译被称为挪用或者劫持（appropriation or hijacking, Flotow 1991: 69）。此时，女性主义译者的“女性主义者”身份超越了她们的“译者”身份，她们更多地是作为女性主义者在从事翻译活动。

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才会导致女性主义翻译的出现，对原作或原作者的女性议题的认同同样也能成为激活译者的女性主义者身份的条件。一些译者正是出于这种认同感而选择女性文本作为自己翻译的对象，如 Barbara Godard 翻译 Nicole Brossard 的作品、Howard Scott 翻译 Louky Bersianik 的作品，原作者都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女性身份使译者、作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女性主义的同盟阵线。作者在作品中采取各种的语言策略以反抗男性压迫、让女性发出声音；译者也因此承担了同样的责任，在译文中采取创造性的策略，以达到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系统中起到类似的效果的目的。如 Godard 的翻译就选择遵从于原作中的意义生成方式，而非严格的语言表面现象（Simon 1996: 26）。这种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并非译者的一厢情愿，而是作者与文本被翻译的要求，译者响应文本的号召而进行的。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

以说翻译忠实的对象是作者与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翻译女性主义的作品，de Lotbiniere-Harwood仍以自己的方式，而非完全遵从原作者的方式，来强化作品中的政治性议题，在她看来，“Lise Gauvin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是，但我不是她”（1989：9）。²⁴所以她依然对Gauvin的作品进行了女性主义的重写，以实现自己的政治议题。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女性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的差异。存在“意识形态冲突”的文本并不一定都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包括女性作家、甚至是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她们各自作为独立的个体，虽然同为女性主义者，有着同样的政治议题，但个体间的差异并不会因此而被抹杀，个人身份也是一种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对行为产生作用的主控性身份。关于译者个人身份的凸显，本文将在第四章中详述。

身份理论所探讨的身份选择问题常常是非此即彼的选项，而忽略了多种身份同时实现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中，身份的选择更多地体现在多种身份有条件的共存状态。这一点发现，可以说是身份理论在应用于翻译研究时对原有理论假设的贡献之一。如上所言，即使是采用介入式的翻译方法，也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译者是完全忽视自身作为译者的角色。女性主义者和译者这两个身份在同一个个体的身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共存的。这种共存也并不以一个处于活跃状态而另一个就一定处于隐藏状态为条件，笔者将之称为女性主义译者的双重身份在个体身上“有着优先次序的共存”。她们以女性主义的翻译道德观为自己辩护，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应当在翻译之前向原文作者、出版商、赞助人等告知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将采用的翻译策略，这是女性主义译者应该遵守的道德（de Lotbiniere-Harwood 1991：120-125，166-168）。而所谓“告知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将采用的翻译策略”正是本文上一章所讨论的翻译互动对话的具体体现。女性主义译者在尊重其他翻译角色（包括作者、出版商、赞助人）的意见的基础上采取自己的女性主义策略，意味着她们在翻译的互动过程中不仅追求自身女性主义身份的实现，同时也尊重自己身为译者的角色规范，她们在女性主义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中寻找着平衡。女性主义译者在前言和译注中对读者的交代自己的翻译策略同样体现了这一努力。

²⁴ 原文为：“Lise Gauvin is a feminist, so am I. But I am not her.”（de Lotbiniere-Harwood 1989：9）。

女性主义译者作为一个译者群体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她们对于翻译研究的启发却是不容忽视的。在她们那里，译者不再是抽象的“*the translator*”，而是具体的“*translators*”，其个体特征和身份成为翻译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非抽离的。一些翻译学者在论著和文章中甚至开始仅用女性人称代词“*she, her, herself*”来指称译者的第三人称（如 Naoki Sakai 在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1997 中用 *she, her* 来指称译者；第三人称排序时也不是传统的 *he/she*，而是 *her/him/them* 的顺序或 *herself or himself*）。这种异于常规的指代方式无疑是引起阅读者对译者主体的注意的有效手段。

以翻译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先锋试验作品为开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包容了多样的理论关怀和研究方向。其中包括了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史研究、女性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译者主体性研究、翻译批评、圣经翻译、与性别相关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如同性恋文学的翻译）等等。可以说，文学翻译研究中几乎各个方面都可以与女性/性别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也体现出性别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顽强的生命力。仅以翻译史方面的研究为例，就包括了这样几个方向：整理翻译中与性别相关的隐喻（Chamberline 1988）、发掘女性从事翻译实践和讨论翻译理论的历史（Zwarg 1995: 59-96; Hyun c2004; 张筠艇 2004: 113-119;）、翻译并讨论曾被遗忘的女性作品（Kadish & Massardier-Kenney 1994）、以及对整理女性作品的译介情况并探讨翻译中性别意识的体现（如李红玉 200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女性”为着眼点，关注女性/译者被迫隐形和失声的情况，并提倡种种翻译策略来改变这种情形。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一些研究者会尽量避免过于激进或极端的女性议题，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女性译者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或女性意识的显现，或是男性译者的男性中心意识，但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隐含的女权主义政治议题常常因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要求而屡屡遭人诟病。这种研究范式常常是建立在性别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基础上，远远落后于女性主义的实际发展（Martín 2005: 27-39）。当然，这种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它在揭示翻译的政治性、挑战传统的翻译道德观、忠实观，启发译者主体性研究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女性主义译者在两种身份之间的选择与取舍也成为译者身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开始，翻译与女性的问题开始为人所注意，在以 Simon 和 Flotow 为主的一些学者的介绍和总结下，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逐步成形，形成了一套理论、策略、研究方法和一批研究者，并走出加拿大魁北克这个特有的社会环境，为其它国家的翻译研究学者所认识、应用和发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走出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为人所接受和研究，说明了女性/译者身份问题的普遍性。女性主义翻译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对女性/译者主体身份的宣扬，但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女性主义”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其唯一的认同方式。加拿大女性译者的代表之一 Carol Maier 表示更愿意把自己界定为“具有女性身份认同的译者”（woman-identified translator）而非“女性主义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 Maier in Godayol Nogué 1998: 161）。对“女性主义”身份的拒绝或曰排斥反映出女性主义翻译存在的局限性。此时，性别或者说女性概念的出现为性别与翻译的进一步结合打开了出路。因而，在介绍、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女性主义研究本身的发展轨迹，女性主义的翻译与实践都逐步走出了“女性主义”的单一身份，呈现出更广泛的适应性，这一点在其关键词由“女性”向“性别”的转变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性别译者

从单一的女性身份到更具包容性的性别身份翻译的转变首先是由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生存其中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一旦脱离魁北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缺少了可行的条件（作品、译者、出版社、读者群等），与此相应的理论研究也随之转变，转而探讨更适合于本地特征的女性翻译。这一点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和理论与中国语境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缺乏西方妇女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无论是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不能完全适合中国语境。所以在中国语境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经过评介西方理论的阶段之后，便开始了本地化的过程，积极地结合本土的文本、作者、译者、文化背景等进行研究（参见李红玉 2007: 49-52）。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都不具有激进的女性主义政治特征，而是表现得较为温和，反映出一定的性别意识，而非明显的女性主义政治特征。而这并非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特征，一些其他国家奥地利、

加拿大及美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也同样呈现了这样的转变，表现出对更多样化的性别问题的关注。²⁵

在实践方面，除了上述较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译者之外，还存在一部分具有性别意识的译者。这些译者具有一定的性别意识，她们或者是对女性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或者是对女性经历有着自然的认同感，但她们并未自我标签为“女性主义者”，她们对女性身份的承诺没有那么强烈，对女性身份的承诺尚不足以使她们颠覆自己作为译者的角色身份。故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大多数的女性译者并没有在翻译中实践女性主义翻译的政治议题。这些女性译者并不会采取颠覆式的翻译策略对译文进行干涉，以达到突出其女性议题的目的，作品本身也多数并非女性主义的实验作品；她们与作者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合作共谋。但这并不是说性别身份对她们的翻译活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在翻译中，一些女性译者会在译文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表现出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和一定的女性意识。从事汉译英的译者朱虹就是这一类的女性译者。她在采访中表示她翻译选材时特别注意女性作者和反映女性经验的作品；她还特别选择一些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来翻译，目的是向国外读者介绍当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穆雷 2003：43）。朱虹在翻译选材方面的倾向性与她自身的女性身份意识不无关联。此外，尽管朱虹在翻译时没有使用颠覆性的语言和翻译策略，但一些文本对比研究发现她在译文中亦并非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将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融入其中，加强并延伸了原作中的女性主义议题（参见穆雷等 2008：46-54；杨朝燕,胡素芬 2007：118-120）。朱虹的女性意识既来自于她自己身为女性的一些共同感受，也来自她对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了解（穆雷 2003：41-44）。对共同的女性经历的认识和同情成为女性译者在翻译具有性别特征的文本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具有女性意识的译者而言，对女性身份的熟悉而带来的认同感和对男性思维的陌生而带来的距离感在译者的翻译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具有男性意识的译者在翻译中也可能对原作或原作者产生类似的认同或疏离的感觉。与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多注意女性与翻译的情况不同，性别的

²⁵ 翻译研究者和译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女性主义之外的翻译中的多样化的性别问题的关注，如加拿大的 Louis von Flotow（1998；1999）、奥地利的 Amy Lai（2007），美国的 Carol Maier 和 Françoise Massardier-Kenney（1996）以及 Carol Maier（1998）等。

概念囊括了包括男性在内的性别认同方式。同性恋身份的翻译也成为翻译研究的所关注的对象(如 Harvey 1998: 295-320, 2000: 137-165; Li Bo 2006: 69-84)。译者的性别身份意识可能会影响其翻译活动,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女性译者都一定会在翻译中带入其女性的身份意识。有一些女性译者,可能认同并内化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义,因而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甚而,她们还有可能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认同或内化了男性价值观,并在无意中(或者是有意识地)将这些价值观在译文当中再现。

翻译的性别研究是作为对较为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和补充而逐步出现的,但其研究范围和理论关怀却比后者更为宽广,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诉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别。翻译的性别研究避开了女性主义的政治议题,代之以相对客观的“性别”概念,试图从较为客观中立的角度研究与翻译相关的性别问题。例如,通过对男性和女性翻译文本进行对比分析,或采用实证性的方法,来探寻译者性别身份与其翻译活动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如 Santaemilia 2005: 117-136; 王建国 2005: 80-83)。在这些研究中,“女性主义”不再是核心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对翻译中任何与性别身份相关问题的关注。

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和不同阵营的存在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推动因素。女性主义发展到六七十年代时期开始自我反思,意识到以反抗和颠覆为核心的女权主义的性别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特性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平等,而是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同样在质疑与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发展。Martín 从女性主义最新发展的角度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反思,指出从简单的“以女性为中心”(woman-centered)到更为全面的“性别意识”(gender-conscious)不仅是女性主义的新发展,同时也代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2005: 27-39)。Godayol 对女性译者主体的探讨就来自女性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她在文章中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对诸如女性、主体、性别和历史等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有理由质疑一种单一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存在的可信度(2005: 9-14)。故此要研究女性翻译实践中的女性主体问题,必须首先审视其定义本身。Godayol 进一步从“女性”概念的流动性入手,指出作为“女性主体”的译者位于边界地带(borderland),其身份具有多重性;女性译者的主体

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从而动摇了僵化的父权话语主体（同上）。

综上所述，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中，对译者性别身份的认识和理解基于两种身份模式，一种是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认同为基础，表现为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和相应的翻译主张；另外一种是以“性别意识”为基础，表现为较为温和的性别意识，不主张采取颠覆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而代之以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看译文中的译者性别表现。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层面上仍局限于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而具有一定性别意识的翻译实践被证明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广泛存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性别身份对翻译影响的普遍性。性别与翻译的结合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在女性主义翻译的启发下产生，在较大范围内关注译者在选材和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性别倾向性。然而，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还有性别意识的翻译活动，甚或是无明显性别倾向的翻译活动，其中的性别表现都绝非单纯而一致的，而是如 Godayol 所言，女性身份是具有流动性的，是在不停地移动和转换的过程中达成的（2005：9-14）。

第二节 译者的性别身份表演

随着对女性主义翻译问题探讨的深入，以及女性主义译者对自身翻译实践反思的继续，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身份选择”、或者“性别意识”，并不能完全解释翻译活动中译者性别身份的复杂表现。事实证明，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的性别特征并不一定都与译者自身的性别认同相一致。关于这一点，译者孔慧仪就自身的经验表示，尽管女性经验使自己更能够投入地翻译女性作家作品，但有些男译者的译作也非常能表达“阴柔的一面”（穆雷，孔慧仪 2002：110）；而从理论上讲，“跨越性别的疆界也是对翻译必不可少的要求”（孙艺风 2004：271）。女性主义翻译也并不能否认实践中性别“伪装”的可能，Simon 在她的女性主义翻译著作《翻译中的性别》一书的注释中指出，

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不仅跟女性有关，也跟男性有关系，男性可以采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规则；女性也可以成功地翻译男性的作品……可供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领域是性别身份是如何通过翻译被伪装起来的。
（Simon 1996：168）

翻译中的性别身份是如何被“超越”或者说被“伪装”的，恰恰是女性主义和性别意识的翻译研究所未能解释的问题，而这又是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常常出现的现象。女性主义译者常常面对着这样一个悖论：面对意识形态上冒犯女性的文本，无论是选择翻译还是拒绝翻译，似乎都不能算作是对男性文本彻底的抵抗：若选择翻译，无论她们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意味着首先必须要与原作/原作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并传播男性的文本；而如果拒绝翻译，正如 Chamberlain 注意到的，那是“向那种将权力赋予原作的逻辑投降”的行为（Chamberlain 1988：471）。这又违背了女性主义翻译反抗权威的初衷。激进的女性主义译者，如 Levine 在翻译 Cabrera Infante 的男性话语时选择了颠覆文本，以不忠对抗不忠，戏仿原文的逻辑方式（Levine 1984：92）。尽管这意味着她首先要进入对方的作品，而进入对方的作品同时意味着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超越。可以说翻译对于女性话语而言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媒介，因为它既隐藏了，同时又显示了（both hid and revealed）男性权力背后的女性话语（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34)。Maier——正如 Levine 一样——她们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同时又通过翻译进行抵抗。女性主义译者实现自我的方式不单单是要“对抗”，而是首先要“对话”。通过在“为”（for）“主人”（master）说话的同时拒绝压制自己的声音。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女性主义的翻译主张——即通过翻译发出女性/译者的声音、颠覆父权的语言——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她们必须首先进入父权的语言，才能通过她们所要对抗的父权的语言本身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许多时候，女性译者面临着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况：她们要么翻译男性文本，结果可能是自我在翻译中遭受异化和伤害；要么拒绝翻译，结果是使女性/译者的声音保持沉默。在追述女性与翻译之间的隐喻时，Chamberlain 指出，翻译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处于双重束缚之下的实践活动，这样的一种理论所依赖的是翻译作为协作的一把双刃剑——作者和译者共同工作，她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的也是颠覆的（Chamberlain 1988: 470）。那么女译者面临的疑问就是，作为一个男性传统（中）的女性译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有鉴于此，Chamberlain 对女性主义翻译提出警告：如果固守在传统的等级秩序中，无论是何种性别类型的翻译活动都将被同样的权力关系所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女性主义理论有可能最终成为乌托邦的空想”。必须颠覆的是翻译遵从于性别建构的那个过程（the process by which translation complies with gender constructs），以此来警惕事实上是倒转了的（故此也增强了）性别二元对立的“新的”隐喻的形成（Chamberlain 1988: 472）。尽管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性别暴力的重演，但也常常落入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无法解释翻译实践中性别身份的复杂表现。

如上所述，女性主义译者的挑战之一就是超越作者或是译者的性别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女性主义者 Judith Butler 在其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1999）中提出的性别表演理论为女性主义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条出路。Butler 认为，对生理的“性别”（sex）与社会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进行区分的努力并未能真正解决性别本质主义的问题，她提出了性别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认为性别身份是一种话语表演，是对某种性别规范的反复练习和强化的一种表演，并在重复的表演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性别的认同意识

(Butler 1999)。尽管 Butler 的性别表演理论着重于对“性别的社会建构论”的消解，但她的理论却为翻译研究中的译者性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可以用来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性别转换的现象。

翻译中译者的性别表现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表演，在这个表演中，原作就像是剧本，而译者作为演员是在对剧本阐释的基础上进行表演。在进行表演时，译者的自我身份处于不显著的状态，而是根据需要在译文中再现各种各样的身份，从而达成翻译任务。即便是像女性主义译者这样对自我的性别身份具有强烈承诺感的译者，如上文所述，在面对男性文本时，都必须要在进入对方作品进行“对话”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其“对抗”的目的。换言之，女性译者想要让女性/译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努力，又必须通过表演他人的声音才能实现。因此，尽管译者可能认同的是某一性别，但为了翻译另外一种，将自我的性别搁置一旁 (set aside) 就是必要的 (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31)。

翻译作为身份表演的舞台，译者——无论她/他的身份承诺如何——在这里都有可能需要暂时搁置自己的身份认同，表演另外一种身份。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还存在着译者是否愿意搁置自己身份的问题，女性主义译者拒绝翻译男性作品就是对这种搁置自我性别身份的拒绝，但这同时也拒绝了通过翻译进行对抗的机会。女性主义译者首先必须要进入男性的语言，才会有颠覆破坏的可能。因此，在更广泛的语境中讨论女性认同译者 (women-identified translators) 的贡献，才会扩展我们对性别与翻译的讨论范围。例如，Suzanne Jill Levine 作为女性，在实际上将性别差异搁置，与男性作家们合作，并将其作品中可能只是隐含的“破坏”或“潜文本” (subtext) 明确地表示出来；而 Howard Scott 在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要“作为男性”来翻译 Madeleine Gagnon 对“传统男性话语的颠覆”；而同性恋-女性主义作家 Monique Witting 赞赏她的译者 David LeVay 的翻译时并特别点出，给翻译带来困难的是法语和英语语法的差异，而不是译者的男性性别造成的 (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32)。在这些翻译活动中，译者都没有遵从自身性别认同的需要，而是在译文中表演着与自我不同的性别身份。

需要进行区分的是，Butler 的性别表演理论为翻译中的译者性别表演分析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但 Butler 的理论中的性别是一种重复的表演行为，并且最

终将其当做真实并内化了的表演，而翻译中译者的性别表演并不是重复进行的，而是即时的、短暂的，并且可能随时准备进行转换的。如果按照 Butler 的论述继续下去，译者在表演中暂时搁置的自我性别身份实质上也不过是在不断地表演中所而产生的性别认同。那么女性主义翻译所建立的根基也随之被解构。

种种的翻译现象都表明译者的性别身份在大多数的翻译中是具有表演性质的。当曾翻译过两篇小说的主人公被人问到“女人还是男人？”时，她回答到：“都不是……，我是译者”（转引自 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31）。²⁶译者性别身份的可表演性在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显示。译者，即是又不是“女人”或“男人”。从译者的对自我个体的性别身份的认识来看，他/她当然是认同于某一种的性别身份；而从译者在翻译中的理解与再现的过程来看，他/她可能表演任何一种性别。译者在翻译中进行着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表演。因此，寻求拓展常规的翻译/性别定义和话语的方式成为 Maier 和 Massardier-Kenney 在研究中努力方向（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25-242）。在笔者的硕士研究中对译者性别视角转换的研究亦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通过对双性同体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阐发和借用，以及实证研究阐释了译者是如何在翻译中实现性别视角的转换和身份表演的（李文静 2008: 97-101）。

除了译者自主的选择之外，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言，外部的情境和语境也是作用于个体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译者亦有可能迫于外部因素而压制自己的主体意识，顺从于原作中的性别倾向，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 就是一例。她在著作中描述自己在确定女性主义者身份之前翻译男性摇滚诗人的作品时的感受。de Lotbinière-Harwood 表示，出于专业职责的要求，她为了翻译男性作者不得不从男作者的角度出发，压抑自己身为女性的自我，用他的眼睛观察女性，将自己置于男性的语言暴力之下，使自己遭受耻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她自己遭受了伤害和异化（转引自 Wheeler 2003: 439）。翻译男性作品的过程让她觉得十分痛苦，因为自己不得不被迫“扮演着男性窥淫狂的角色”（de Lotbinière-Harwood 1991: 97）。在这里，尽管 de Lotbinière-Harwood 在翻译中扮演着男性的性别角色，但这显然并非是一个自觉的选择，而是在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充分了解女性主义思想，因而是作为“译者”而不是作为“女性”或“女性

²⁶ 原文为：“Woman or man?” “Neither...I’m a translator”, B. Wilson, *Gaudi Afternoon*, Seal Press, Seattle (WA) 1990: 74, 转引自 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31。

译者”来翻译这个文本的。对译者“专业职责”的承诺超越了她对自我“女性身份”的承诺。然而她的女性身份虽被暂时搁置，但作为一种主控身份，依然在自我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所扮演的男性身份产生了冲突并受到伤害。

由此可见，翻译中所表现出的性别身份，并不一定都是译者自发的身份选择，也完全有可能是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而导致的。当译者的其他身份同社会对于译者这一角色身份的传统期待产生冲突的时候，译者最终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其中包括译者的自我认同（即承诺和身份的显著性），外部的情境，还有译者个人的目的等等。Massardier-Kenney 亦认为，译者应当尽量“关照到与某文本的所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Massardier-Kenney 1994: 17）。身份选择的冲突在翻译过程中时有发生，冲突的结果也并非简单地选择或放弃，而常常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产生的是参杂了各种不同的身份踪迹的文本。因此在考察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时更要小心谨慎，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就这一点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即使忽略文本的其他方面，而将焦点放在“性别”之上。Spivak 对性别指向的狭隘关注提出警告，认为其可能导致译者无法识别在不同的语境（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下的文本意义（2000: 397-416）。

然而，对自我性别身份的搁置并不意味着这一身份对个体而言就完全隐匿而不具有任何意义。实际上，扮演男性角色有可能导致被搁置的女性自我遭到伤害，所扮演的身份与自我身份认同产生冲突，因此，在上述翻译经历之后，de Lotbiniere-Harwood 在女性主义作品的影响之下确立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者身份，明确地宣称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译者”，在告知出版社和读者的前提下，提倡女性主义译者通过签名、前言和注脚等手段表明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拒绝再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并与女性主义作家 Brossard 合作翻译了多部作品。de Lotbiniere-Harwood 从具有模糊性别意识的译者转变为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译者的经历说明了译者自我认同的可变性，个体对自我某种身份承诺的程度是可能随着外部条件以及自我认识的发展而改变的。

在翻译男性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感到女性自我遭到压抑的译者，也可能选择以反抗的方式进行翻译。另一位女性主义译者 Suzanne Jill Levine 与 de Lotbiniere-Harwood 的经历相似。她在翻译 Infante 的小说 *Three Trapped Tigers*

时, 感觉自己不但作为译者处于低于作者的地位, 而且作为女性也处于男性话语的压迫之下, 工作虽然具有创作性, 但仍然感到压抑。她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 坠入男性话语的魔咒之下” (Levine 1991: 181)。与 de Lotbiniere-Harwood 不同的是, Levine 在背叛自我的同时, 也以不忠来作为对抗的方式, “以颠覆性的书写, ‘创译’ (transcreating) 那延展父权话语的边界的写作” (同上)。在她看来, 译者在为原作服务 (serve) 而同时又以某种方式颠覆 (subvert) 了原作。因此, 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不应该假定原作与译作这两个极端; 相反, 翻译是一种全新的基本的空间状态, 即无边界状态 (a state of borderlessness), 是原作与译作间连续的存在 (continuity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无边界的状态, 那么, 我们就可以不将翻译看作是对原作的暴力行为, 而是一种协调的过程 (reconciliation process), 是“文本、语言和自我的碎片”之间的相互协调 (Levine 1991: 184)。Levine 的观点不仅挑战了将翻译视为低于原作的、次生的活动这一观点, 而且在理论上阐释了翻译在服务与颠覆原作这两个貌似矛盾的目标实现的可能。翻译, 不仅是译者被动地进行身份表演的舞台, 也是其发出自我声音的地方。对原作中性别身份的阐释甚至对抗, 都是译者表达自我身份的途径。

性别表演的观点与社会心理学身份理论中关于身份的社会期待与规范的观点是一致的。对某一身份的期待与规范恰恰是“表演”的可能性存在的前提。“表演者”需要熟悉这些社会期待和规范, 并迎合这些规范进行表演。de Lotbinière-Harwood 认为她之所以能够进入男性诗人的思想并从相同的角度进行翻译, 是因为作为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鼓励并塑造她们从男性中心的角度来看待和解释现实的 (转引自 Wheeler 2003: 434)。这个意义上来讲, 有许多女性译者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 并且译得相当好, 可以解释为她们对男性的语言符码的熟悉和掌握。这也正是 de Lotbinière-Harwood 所翻译的女性主义者 Brossard 的观点, 她认为男性语言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外语”, 所有女性早已适应这种语言, 用带有口音的男性语言说话 (转引自 Wheeler 2003: 439)。对“带有口音的话语”的强调, 提醒了我们翻译的表演性: 女性在日常话语中模仿父权的口音, 译者也尝试着采用不同的口音。“口音”这个比喻恰当地反映了女性主义翻译的特性, 她们通过男性的语言发出自己的声音, 混杂的口音在表现男性

语言的同时，也带出了女性的声音。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男性译者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翻译也不一定就是无法掌握女性的语言。尽管思维方式或角度存在差异，但并不能就此否认了存在理解和同情的可能性，更何况，由于差异的存在可能会使得表演者更能捕捉到细节之处，表演得惟妙惟肖。在此前提之下，表演才有可能顺利进行，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如 Amy Lai 通过对中国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中的一篇《叶限》（故事情节与《灰姑娘》类似）的两个英译文的对比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译者的译文，男译者 Arthur Waley 的译文中建构了女性主义的张力，明晰了原文中原本只是可能存在的女性主义思想（Lai 2007: 49-56）。正如 Maier 和 Massardier-Kenney 指出，在性别这里，不仅是女性特质（femininity），男性特质（masculinity）也进入了对差异的思考（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difference）（Maier and Massardier-Kenney 1996: 225）。因此，她们拒绝使用“女性主义译者”来形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所讨论的各种译者，而是采用了“女性认同”这一说法来指代“或是自己认同为女性，或是仅关注那些认同为女性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者或实践者”；她们还特别指出，这些译者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她们可能将自己看作是“女性主义者”，也可能不是；此外她们对“女性主义”的认识也各不相同（Maier & Massardier-Kenney 1996: 227）。而作者在文章中采用人称代词“她”也并非是想排除男性译者的做法，而是因为事实上“女性认同”的译者中女性确实占多数（同上：238）。从这些细致谨慎的区分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其实早已超越了争取女性权力的单方面理解，“女性认同”并不等同于女性，而是也包括了在文本生产过程中认同女性的男性，而“女性认同”更不等同于单一的“女性主义”，而是包容了多样性的存在。

此外，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点是性别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性别的定义本身并不是对固有差异的普遍或是绝对地展现，而是视乎多重历史和文化因素而定，具有相对地方性，并不断改变的意义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涉及不同文化历史语境的翻译中的性别问题更不可在单一的性别概念之下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相应的历史和文化语境进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走出加拿大的魁北克，在更多地区范围的应用和适应就说明了这一点。Harvey 对同性恋身份翻译的研究亦是坚持了对不同语境的考察，充分考虑不同文化中同性恋身份的差异和身

份的表演性特征（1998：295-320）。而 Mira 则通过从英语译入西班牙语的同性恋文本的分析说明，即使是支持男同性恋的译者，由于目的语语言或政治条件的不足，也会造成原作中同性恋的积极意义无法得到再现；但这样的差异，恰恰又为译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Mira 1999：109-123）。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性别概念的发展更是对翻译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 Wahrman 对古罗马讽刺诗人 Juvenal 针对女性的讽刺诗 *Sixth Satire* 在 1644-1815 年间 16 个不同版本的英译进行比较，发现不同时期的译文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对女性以及性别概念的不同理解，说明译者对“sex, gender and sexuality”等这些词语和概念的理解空间是受到历史语境的限制的（Wahrman 1999：1-41）。考察译者对性别话语和实践的介入，必须要检验过去的以及当前的语境，以及译者工作的现实条件，才能决定我们目前对译者在历史上的“女性”（feminine）角色的认识的准确程度，才能以尽可能全面地厘定目前关于性别、身份和翻译的探讨。

第三节 《狐》的三个译本中译者的性别表演

翻译中所涉及的身份问题往往不仅仅是译者的身份，译者的性别表演往往是与原作者以及作者在作品中所刻划人物的性别身份密切相关的。较为关注性别问题的文本的翻译，更易激发译者自我性别意识的显现，或表演的欲望。本节将以D.H. Lawrence的中篇小说《狐》（*The Fox*, 1923）的三个中文译本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其中与性别身份相关的问题及其在不同中文译本中的表现。²⁷

D.H. Lawrence 以刻画男女两性的情爱关系著称，评论界对其对待女性的态度褒贬不一，既有对其作品中的厌女情结的强烈批评，也有对其作品中对女性细腻描绘的称赞（Simpson 1982 : 13）。从性别表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 Lawrence 对于女性经验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够使他深入女性心理，在作品中扮演女性角色。而他自身的男性价值观也在作品中体现出来，最终造成了其作品中看似矛盾的杂糅现象。Lawrence 对女性这种矛盾的表现体现在《狐》这篇小说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一方面，《狐》的故事体现了 Lawrence 对女性之间发展同性伴侣关系的反对态度，对“男性化的女性”不赞成的态度，以及女性依赖和需求男性的观点；另一方面，Lawrence 在结尾部分对婚后女性想要勉力维持自我独立意识的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显示出他对女性的理解与同情。其结尾尽管是开放式的，却又暗示了女性独立意识必然的失败。《狐》这篇小说的文本本身传达的对待女性的态度是矛盾和挣扎的，又或者说，是有其时代的特性的。莱辛在其前言中多次强调，《狐》这个故事中充满了女性主义的意味，也许现在看起来是简单而天真的，但“毕竟那是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女性主义”（Lessing 2002: xi）。这样一个充满了性别矛盾的文本在翻译后会呈现什么样的面目？Lawrence 的“女性主义”又是否为现在的女性译者所接受？不同的译者是如何表演译文中复杂的性别视角？他/她们的性别意识在译文中是否有所体现？这正是本节通过文本分析想要探寻的问题。

中篇小说《狐》目前共有五个中文译本，本文主要分析其中的三个译文。

²⁷ David Herbert Lawrence （中文译名，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是二十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儿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1）等。Lawrence 的作品大多以探讨男女之间的情爱为主题，中篇小说《狐》（1923）就是其中一篇。

其中最早的译本是台湾开今文化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译者李建春；中国大陆的译本由文美惠翻译，最早由 1997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于《劳伦斯性爱小说》；2001 年、2004 年和 2007 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小说集《狐》）、安徽文艺出版社（单行本《狐》）和中国文联出版社（收录于《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分别再版；²⁸此外，台湾女译者范文美也翻译了这篇小说，2005 年由台北洪范书店出版。²⁹除李建春的资料不明外，另外两名译者范文美和文美惠都是女性译者，笔者认为追查译者的性别虽然在分析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但同时也有可能误导研究者的思考方向。因此，从身份表演的角度而言，本文暂时不考虑这位译者自身的性别身份，而是从文本出发，考察译者在译文中的具体表现，随后再结合译者的相关背景信息来分析其翻译策略。

一战期间，由于众多男性奔赴战场，英国国内劳动力大减，留在后方的女性被鼓励承担原先是由男性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些女性因此而相互做伴，共同维持生计。而随着战争的结束，男人们开始返回家乡，社会也开始要求男女回归各自传统的性别角色。《狐》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战刚刚结束时的英国，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共同经营着一个农场，她们相依为命，生活艰难孤苦。在战时男劳力匮乏的情况下，强健的 March 承担着男人的工作，而她的伙伴 Banford 敏感纤弱，负责料理家务。她们二人的关系暧昧，似乎是一对同性夫妻，但小说中从未说明二人究竟是否同性恋关系。此时，一位男青年 Henry 闯入了她们的生活，展开了对 March 的追求。小说在交代两个女人间的关系时提到：

原文：

Although they were usually the best of friends..... (5) ³⁰

范译：

两人大多时候相处极好..... (148)

文译：

²⁸ 这四个版本改动不大，本研究引文主要来自 2007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版本，同时参考另外两个版本。

²⁹ 此外还有易林译，《狐》（台中：草石堂出版社，1998）和主万、朱炯强合译，《狐》（《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名著名译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这两个译本。从选取译文的质量角度出发，本文暂不考虑将这两个版本作为分析对象。

³⁰ 如未有特别说明，本章译例均出自下列译本，引文后仅标明页码：D. H. Lawrence, *The Fox* (New York: Bantam Book, 1967)；范文美译，《狐》（台北市：洪范书店，2005），简称“范译”；文美惠译《狐》（《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冯季庆选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简称“文译”；李建春译《狐》（台北市：开今文化出版，1995），简称“李译”。

这一对朋友平常还是非常要好的……（174）

李译：

她们是最亲密的朋友……（12）

如上所述，小说中 March 与 Banford 之间的关系是类似于同性恋的伴侣关系，尽管小说并未点明，但暗示二人同床共枕，而且 Banford 对 March 与 Henry 之间发展婚恋关系的极力阻挠以及 March 的犹豫不决都一再暗示着她们之间并非简单的“朋友”。关于这一点，正如 Doris Lessing 在小说的前言中所点出的，D.H. Lawrence 显然并不是羞于露骨地描述性关系，而是想要体现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才是更重要的（Lessing 2002: xi）。在上例所在的这部分原文中，简单介绍了两位女主角各自的性格特征和二人之间的关系情况——大多时候是好朋友，但在漫长孤寂的生活中，两人关系也开始出现了矛盾。尽管原文使用了“the best of friends”（直译为“最好的朋友”），文和李的译文亦都采用了“朋友”这一词语来表现二人的关系，但范的译文却没有使用跟原文最直接对应的“朋友”一词，而是将两人的关系描述为“相处极好”。尽管，“朋友”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排除了恋人关系的可能性，但范译避开“朋友”这样一个具有直接界定二人关系性质的词语，会使译文读者对两位女性之间关系的认知保持着开放的可能。

这两位女性之间尽管关系亲密，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原文：

They seemed to be *losing ground*, somehow, losing hope as the months went by. There alone in the fields by the wood, with the wide country stretching hollow and dim to the round hill of the White Horse, in the far distance, they seemed to have to *live too much off themselves*. *There was nothing to keep them up* – and no hope. （5）

范译：

两人似乎失去了重心，随着日夜的流逝，不知怎的，也失去了希望。她们孤孤单单处身林边田野上，举目一片原野，朦朦胧胧，一路延伸直达远方白马山圆形的山丘，日子似乎过得孤苦无靠。毫无精神支柱——且无希望。（148）

文译：

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流逝，不知怎么搞的，她们好像总是失利，她们在渐渐地丧失希望。她们两个人孤独地住在树林边上那块田野里，广漠的原野空旷寂寥，一直延伸到远处白马山的圆锥形峰顶下面。她们住的那

个地方好像太孤单了。没有什么能让她们打起精神——也没有什么希望。
(174)

李译:

随着时间一月月地流失,她们似乎在失去土地,从某种意义上,她们在失去希望。她们在田野里靠着一片树林孤独地居住着。空旷的田野显得空虚朦胧,遥远地伸向怀特灵斯山。她们的生活似乎失去太多东西。这里在没有什么能使她们振作,也没有任何希望。(12)

在这样一段专门交代二人关系和相处方式的语境之下,“lose ground”一词并不是单指两人经营农场不善而处于亏损的状态,而更多地是指两人之间出现摩擦,关系日益恶化的状态,并因之而失去希望。随后,借着对农场偏僻的地理位置的交代,原文进一步说明二人的孤单和无望:“they seemed to have to live too much off themselves. There was nothing to keep them up—and no hope.”“live off”原意是指依赖什么生活,在这里是借农场的偏僻指二人与世隔绝,完全靠自己生活。“too much”一词显示出叙述者对她们这种生活方式不赞同的态度。她们二人经济处于亏损状态,关系日益恶化,又孤独地住在与世隔绝的农场之上,因而也没有了生活的希望。这就为后来那只象征男性的狐狸以及代替了狐狸位置的男青年 Henry 闯入她们的生活埋下了伏笔。作者 Lawrence 认为:“两性之间的隔离将意味着全人类的死亡,而男性的活动如由女性承担则会造成女性对我青春的可怕的摧残……”(劳伦斯 1995: 352)。《狐》的故事恰恰是他这一观点的注解。

范译将“lose ground”译为“两人似乎失去了重心”,意义的重点放在了二人的相互关系之上;随后将“live too much off themselves”译为“日子似乎过得孤苦无靠”重点依然是二人的精神世界,强调生活的孤独和精神的空虚,使得下文中 March 轻易被男性所吸引和打动变得顺理成章。最后直接点明她们的无望是在于没有“精神支柱”,而不止是无聊或是穷困所至。相比之下,文译“她们好像总是失利”这一表达则可以兼顾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既可以指关系的倒退,也可以兼指农场的经济状况;随后“她们住的那个地方好像太孤单了。没有什么能让她们打起精神——也没有什么希望”同样点出了“孤单”的意义,但将其归因为“她们住的那个地方”太过偏僻,无法与外界沟通。而相对于范译的“毫无精神支柱”而言,文译“没什么能人她们打起精神”也更偏重于生活的平淡无聊。李译直接

按字面将“lose ground”译为“失去土地”，不单没能再现出两位女性的相互关系和精神状况，更何况农场亏损也并非表现在“失去土地”之上；随后的李译将“live too much off themselves”理解为“失去太多东西”，显然是对英文理解错误，从“失去土地”到“失去太多东西”的错误推断。

综合上述分析，在对两位女性的介绍中，尽管三个译文的意义相差并不太远，中心意义都是讲二人生活的孤独与无望，但范译显然更加偏重于精神层面的孤独空虚，文译则更偏重于二人生活物质层面的损失和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李译则暴露出译者对英文把握不足所引致的意义再现的偏差。本节分析也主要围绕文美惠和范文美的译文展开，李建春的译本多作为参照，而非重点分析的对象。

正当两位女性生活空虚无聊之际，男青年 Henry 来到农场，就像是外地归来的主人，针对两位女性的经营情况说道：

原文：

“There wants a man about the place,” said the youth softly. (18)

范译：

“这儿需要个男人，”年轻人轻轻地说。(161)

文译：

“这里缺个干杂活的男人。”小伙子轻轻说道。(183)

李译：

“这里确实需要有个男人。”小伙子轻轻地说道。(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女性带来了选举权，还有在男性的世界中受雇工作的权利，使得女性有了新的经济独立和新的期望，其中包括性的自由。女性开始采纳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确认对自我的生活的控制。女性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力量。Lawrence 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女性解放的时代，“一方面，他关注妇女的生存境遇，塑造追求自我实现的新女性；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女人的真正独立”（罗婷 2002：232）。Lawrence 认为现代女人承担男性社会角色是“悲剧”，会对女性造成可怕的摧残（Lawrence 1950: 33）。总有一天，女人会发现她所做的一切（投票权、写作、经商），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pure nothingness），而她同时也错失了自己的生活，最终一无所获（同上：34）。在《狐》这篇小说中，从战场归来的

年轻士兵 Henry 闯入了两个女性的生活，开始追求 March，并通过一桩精心设计的意外谋杀了阻挠他跟 March 结合的 Banford，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故事情节表达出一个清晰的观点——两个女性组成的家庭仅仅是短暂的试验，战争结束，男性与女性需要回到其应有的性别角色中去 (Simpson 1982: 73-74)。在上例中，Lawrence 借 Henry 之口表明了自己对同性伴侣关系的看法。原文中的“*There wants a man about the place*”有两重意义，其一是指两个女人对农场经营不善，需要有男劳力的帮忙；其二，也暗指两个女性构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需要男性的存在。范译和李译基本上按照原文的结构直译，都保留了两种阐释的可能。

有趣的是，文译中的“男人”被加上了一个定语，变成“干杂活的男人”，这样就限制了另外一种阐释的可能，制约了译文读者对作者立场的理解。从“需要男人”到“需要干杂活的男人”的转变，显然是译者有意识的选择，其原因可能有两种：其一是由于译者文美蕙对性别问题的不敏感而并未领会原文中所潜藏的第二层意义，只是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进行了明晰化的处理。其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是译者理解了这一层意义，但在译文中故意通过增加“干杂活”这一定语而对“男人”的意义进行限定。考虑到上例中对两位女性关系的翻译中，文美蕙也是从偏重于经济和地理位置来解释，可以发现文美蕙在译文中对性别相关问题似乎呈现一种淡化处理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后文的例证中愈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作者 Lawrence 在故事中不但暗示了女性同性关系必然失败的结局，同时也极力展示异性间性爱关系的强大力量。正如译者文美蕙所言，“在这篇小说里他运用狐狸的情节微妙地暗示了 March 处于感情饥渴状态中被异性吸引的复杂情绪” (文美蕙 2004: 4)。小说中对性爱并没有直接地描述，大多是通过“狐”的意象来隐喻男性/阳具对女性的吸引力，表现女主人公 March 被激发的对异性的渴望。如前例中所指出的，正当 March 和 Banford 二人的生活孤独乏味百无聊赖之时，出现了一只狐狸不断地骚扰农场，偷吃她们饲养的鸡，给她们带来经济损失。于是承担农场大部分工作的 March 开始捕猎狐狸。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March 不但没能够猎杀狐狸，反而被象征着男性魅力的狐狸迷住，燃起了对异性的渴望：

原文:

She lowered her eyes, and suddenly saw the fox. *He* was looking up at her. His chin was pressed down, and his eyes were looking up. They met her eyes. And *he knew her*. She was spellbound – *she knew he knew her*. So he looked into her eyes, and her soul failed her. He knew her, he was not daunted. (6-7)

范译:

她垂下眼睛, 猛然看到了那只狐狸。他正举眼望着她。他下巴向下收缩, 眼睛向上眺望, 与她四目相遇。他, 认得她。她意乱情迷——她知道他认得她。他看穿她, 叫她的灵魂无法招架。他认得她, 一点也不畏惧。(149)

文译:

她垂下眼睛, 突然看见了那只狐狸, 它抬起脸来正在望着她。它的下巴往回收缩, 眼睛朝上望, 正好和她的眼睛相遇。它认识她。她像被迷住似的动弹不得。她明白它是认识她的。所以它才那样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她的勇气消失了。它认识她, 而且一点也不害怕。(174-175)

李译:

她收回自己的目光, 忽然看见那狐狸。牠正看着她。牠的下巴贴着地, 眼睛向上望着。她和牠的目光相遇了。她被迷住了——她知道牠了解她。牠盯着她的双眼。她的精神崩溃了。牠了解她, 一点都不害怕。(013, 015)

(014 页插图: “狡黠的狐狸, 蜷伏在她脚边, 不害怕的大胆接近她, 令她迷惑。”))

原文中 Lawrence 使用了表示男性的第三人称代词“he”来指代这只神秘的狐狸, 三个中译版本中只有范译中保留了代词的性别指称, 用汉语的第三人称单数“他”来指称那只狐狸。另外的两个译本中分别采用了用以指称动物第三人称的“牠”和“它”。无论是在英语还是汉语中, 用有性别的人称代词来指称动物都并不少见, 起到拟人的作用, 或有助于表现动物的感情色彩。在《狐》这篇小说中, “狐狸”的形象并不单单是指偷吃农场鸡鸭的狐狸, 而是唤醒了女主角心中懵懂的女性意识、代表了男性的诱惑的重要象征。后文中 Henry 出现, March 多次提及他就是那只狐狸, Henry 与狐狸在 March 心中是重合的。他们二人之间感情的开始并不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 而是性的相互吸引。正是在这段文字中, 女主角 March 在狐狸的诱惑下, 萌发了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对异性

的渴望。文译和李译在完全有可能采用汉语男性人称代词“他”的情况下，依然选用指代动物的“它”或“牠”来指称狐狸，结果削弱了原文中“狐狸”作为异性诱惑的象征意义。

除此之外，范译的“四目相遇”、“他，认得她”、“她意乱情迷”、“他看穿她”、“叫她的灵魂无法招架”这一系列的措辞更是将“狐”的诱惑和女主角迷失的过程与两性吸引之间的关联表达地清晰无误。另外的两个译文中，虽然在上下文的帮助下并不会使得这种隐喻完全丢失，但女主角与“狐”第一次近距离对望，欲望被激发那一刻所展现的张力却被削弱了不少。将“he looked into her eyes”译为“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文译）或“盯着她的双眼”（李译）更贴近原文字面意义，相比之下，范译的“他看穿她”更多了灵魂层面的交流与震撼。李将“her soul failed her”译为“她的精神崩溃了”多少显得突兀，因为上下文并无女主角精神崩溃的迹象，而更多的是沉迷和出神的状态；李译中此页插图的说明文字将“令她迷惑”的原因归为“不害怕的大胆接近她”则更是对原文的进一步误解。文译“她的勇气消失了”则使场面更像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这一点而言，范译的“他看穿她，叫她的灵魂无法招架”就更加到位，因为“狐”的出现给 March 带来的震撼实际上与“精神崩溃”和“勇气消失”无关，而是灵魂深处欲望的激发和征服。

事实上，如果只单独看范译的这一个段落，而不知道这个“他”实际上是一只狐狸的时候，这段话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一见钟情之态生动地描摹。这其中显然“他”占据着主动的位置，这从一系列以“他”为主语的短句可以看出。此外，范译还采用强调主题的句式，将主语单独列出：“他，认得她。”更是凸现了“他”在其中主动的诱惑。在下例中，范译的用汉语的强调句型，进一步将原文中 March 被动的姿态，以及男性的主导、进攻性的姿态展现了出来：

原文：

She did not so much think of him: *she was possessed by him.* (8)

范译：

并不是她在想他；是他缠住了她。(151)

文译：

她不是在想着它，她已经被它迷住了。(175)

李译：

她并没有对它过多的思考，她只是被迷住了心窍。(016)

“并不是她……；是他……”这一句式中的强调与对比，要比文译和李译的版本中“她被……”的被动句型更有力地体现了在这个过程中男性的主导和女性的被动顺从。并且相对于原文而言，汉语的“并不是她……；是他……”还多了一层责任分配的隐含意义，在范译中，造成这一结果的责任不在于女性，而在于男性“缠住”了女性。“缠”这个词的使用更是别具意味，进一步将造成 March 现有状态的责任指向了“他”。此外，“spellbound”一词在故事中多次出现（7；7；8；12），用以描述 March 被狐狸，以及其后的男青年 Henry 所诱惑的情形，在三个译作中，分别出现如下的不同的选词：

范译：

意乱情迷（149）；意乱情迷（150）；心神不宁（150）；着魔似的（155）；

文译：

被迷住似的动弹不得（175）；好像被什么迷惑住了（175）；如醉如痴（175）；

像着了魔似的（179）；

李译：

被迷住了（015）；中了邪似的（016）；像中了邪似的被迷住了（016）；

像被符咒迷住了似的（023）；

可以看到，相对于另外两个译本，范的译文更倾向于情欲吸引的表现，“意乱情迷”一词的使用使得这一点更加明确无误。试问，一般情况下，有谁用“意乱情迷”来描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呢？而文和李的译本中“被迷住了”、“被迷惑了”、“中了邪似的”，以及“被符咒迷住了”等措辞，更容易让中国的读者联想到志怪小说中的“狐狸精”，而并非发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所致。相比之下，范译在这一方面表达得更为彻底和直白。范译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贯穿整个译文的一致性，全文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的翻译也颇值得玩味。在 Henry 猎杀了那只狐狸之后，March 抚摸着他被倒吊在门廊前的死狐：

原文：

And his wonderful black-glintoned brush was full and frictional, wonderful. She passed her hand down this also, and quivered. Time after time she took the full fur of that thick tail between her fingers, and passed her hand slowly downwards. Wonderful, sharp, thick, splendour of a tail. (57)

范译：

他美丽闪亮黑色的尾巴丰满，却又扎手，美妙极了。这个，她也摸了摸，手微微颤抖。她一再把那粗粗的尾巴捧在手中，然后慢慢向下抚摸。多么明亮美丽粗壮华丽的尾巴啊。（201）

文译：

那条发着乌亮光泽的尾巴蓬松而丰满，太美妙了，她也用手摸了它一下，然后她颤抖了。她隔一会儿就握住那条厚实尾巴上的蓬松的毛皮，轻轻地顺毛抚着。多么美妙、机灵、厚实，多么美丽的一条尾巴！（211）

李译：

牠那条漂亮黑色的闪光尾巴是那么丰满，摸着牠感到非常舒适。她用手抚摸着牠的尾巴，不由得感到轻微的颤抖。一次又一次地她让那丰满的粗大尾巴在她手指中间，慢慢地向下滑动她的手指。这是一条多么粗大，多么美丽的尾巴啊。（93-94）

多数 Lawrence 研究者都将这一场景认定为 Lawrence 的阳具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那只狐狸就是阳具神”（the ithyphallic god; Holbrook 1992: 89）。狐狸，尤其是狐狸的尾巴，在这段引文中具有非常明确的象征意味。原文中除了用“wonderful, splendor”，还使用“black-glintoned, full, frictional, thick”这几个词来描述这条充满了象征意义的狐尾，其中“wonderful, full, thick”更是分别重复了两次。“thick”一词与“tail”搭配，可以产生两种理解：其一是狐狸尾巴的毛皮蓬松而浓密，其二，英文中“thick”也可用来形容阴茎“thick penis”，表示“粗壮”的意思。重复出现的“thick tail”，文译为“厚实”，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两种含义，但比较倾向于对毛皮的描述；在范和李译文中，不约而同地译为“粗粗、粗壮、粗大”等这些在汉语中较常用来形容男性阴茎的词，从而使原文中以“thick tail”来指向男性的“thick penis”隐含意义就更加清晰。“thick tail”，再加上“frictional”一词，与 March 一再抚摸死狐尾巴的动作相呼应，如 Holbrook 所言，“不知‘frictional’一词在这里除了暗示这条尾巴与阴茎的关联外还能有什么确切的含义？”（Holbrook 1992: 89）。这段文字中，狐尾代表男性阴茎的意义更是昭然若揭。在三个译文当中，文译并未直接翻译“frictional”一词的意义，依然沿用常用语毛皮词语来形容尾巴：“蓬松而丰满”。而李译则代之为“摸着牠感到非常舒适”，而这种所谓的“舒适”与下文中 March 不断抚摸狐尾时“颤抖”（quivered）的感觉是不一致的。正如 March 梦到狐狸的尾巴扫过她的嘴唇时被“灼伤”的感觉一样

(seared and burned her mouth with a great pain), 这时 March 的颤抖与性爱和欲望的激发不无关联, 显然并非“摸着牠感到非常舒适”的感觉。范译将其译为“扎手”, 可以说是三个版本中最接近“frictional”本意的一种尝试。

简言之, 这三个不同的译文中, 文译的描写对“尾巴”这一意象的描写更倾向于其与毛皮相关的一面(蓬松、丰满、厚实、毛皮、顺毛抚), 因而减轻了原文中尾巴象征着男性阳具的意指, 以及这一场景中暗指的性爱意味。文译的这一倾向是贯穿整篇故事的翻译的, 如上文偏重以经济和地理原因来解释女性间关系出现的问题, 将需要“男人”具体化为需要“干杂活的男人”; 又如, 故事中有一段描写 Henry 想象 March 的胸部的柔软和性感的情形, 在文译中被删除, 这也是三个译文中唯一一处删节现象, 而这一删节仅在文美蕙译文的较早版本中得以保留, 而该版本是收录于名为《劳伦斯性爱小说选》的选集当中的。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文译中淡化性别/性关系的倾向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译者缺乏足够的性别意识, 在 2004 年版本的译者前言中, 文美蕙表现出对 Lawrence 这篇小说主题的充分认识, 她说:

他指出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像她们从事的事业一样是, 既不符合自然, 也难以维持的。……劳伦斯是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人生哲学不一定被每个读者接受。然而, 使他具有持久生命力和意义的是艺术, 而不是他的‘哲学’。今天我们介绍劳伦斯的作品, 着眼点也在于此。(文美蕙 2004: 3-5)

这段文字充分地表明了文美蕙对原作者 Lawrence 的性别观的认识以及她翻译策略的着眼点所在。此外, 文美蕙自己也是一位作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 曾与朱虹合编的《外国妇女文学词典》(1989), 她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具有一定的了解和并持支持态度。³¹ 因此如果结论说文美蕙未能理解原文中的隐喻和观点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 文美蕙译文中淡化性别/性关系的选择并非是偶尔才出现的, 而是在整篇译文中一以贯之的, 因此可以说是译者有意采取的策略。³²

³¹ 在《外国妇女文学史》的前言中, 编者朱虹和文美蕙写道: “我们的任务, 不仅介绍在世界文学史中已有定论的杰出的女性作家和作品, 还要对她们和她们作品进行新的评价和发掘。同时, 对于古往今来大量受社会主导的男性歧视和被忽略的、埋没的妇女作家以及没有得到正确估价的妇女作家, 我们也要一一拭去历史偏见给她们蒙上的灰尘, 还她们以本来的面目”(1989:15)。

³² 此类的例子不一而足, 还包括将男主角求婚时较为强硬和居高临下的口气“Don't you think, we ought to get married before I go”, 译做较为柔和的商量的语气“你看在我要离开以前, 我们是不是先举行婚

正如她自己在前言中所说明的，翻译的着眼点在于Lawrence的“艺术”，而非他的“哲学”。尽管对于“艺术”和“哲学”究竟所指为何文美蕙并未进一步解释，但可以看到的是，她对于劳伦斯的某些性别观点有意地采取淡化的措施，这种策略可以理解为文美蕙对某些性别观的一种反抗方式，她在翻译Lawrence是拒绝完全地投入表演，而是与原作者的观点保持距离，并且有意弱化其中的性别/性指向，淡化译文中男性的进攻和主导姿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译文读者对Lawrence的性别观点的解读。之所以强调这是“一定程度上”的阻碍，是因为文美蕙的译文并没有做出任何激进地颠覆或介入原文，原文的情节和主要思想最终还是得到传达。

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种有意的“表演不足”（underact）虽然表现出译者抗拒的意愿，但起到的效果可以说是反抗，也可以说是“粉饰”，造成的结果是缓解冲突、粉饰现实，掩盖原作者的观点，从而导致译文读者无从了解所谓的真相，反而有可能不利于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当然，译文在读者中可能产生的效果还需要结合目的语读者的情况具体分析，本研究所关注的是译者在译文中的性别表演。如果文美蕙故意以不足表演来阐释原文的性别观点，那么另一位译者范文美的译文就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倾向。

相对于另外两个译文，范文美的译文自始至终表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极力展现原文中性别/性关系的张力，投入地表演着原作者的男性价值观。她避免使用“朋友”来翻译原文的“friends”一词，从而使得女同性关系更为明晰化；她更着重于性别间精神层面的关系的传达，而避免以农场经营的经济失利或位置偏远来解读两位女性关系紧张的原因；她着力传达女主角被象征着男性的狐狸所吸引时被激发的欲望和她抚摸狐尾这一场景的性的隐喻。所有这些，都为点题的一笔“这儿需要个男人”这句话进行铺垫。范译中对两位女性关系的描述可以说不但附和了原文，而且增强了原作者 Lawrence 对女性同性关系看法的表达，同样，这种倾向在译文中并不是偶然出现，而是一以贯之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译者范文美在译作中完全认同原作者的男性视角还有待商榷，因为附和并强化原作者的性别观点并不一定就是认同的表现。淡化男性观点固然是一种反抗

礼……”；将男主角还未开始追求班福德的女伴之前班福德同样被他所吸引的“Banford was quite charmed by him”译为“班福德还挺喜欢他”等，这些译例中都体现了同样的淡化倾向。

的手段，但对抗男性价值观还可以以相反的方式进行，即在翻译中充分再现（甚至是过度再现乃至强化）原作者的男性观点，通过明晰和强化而暴露其男性视角，从而引导译文读者对文本解读的种种可能，使译文读者能够较为轻易地读出其中的性别差异和矛盾，从而达到激发女性意识、传播女性思想的目的。女性主义译者 Carol Maier 主张：

译者追求的是发出声音而不是保持沉默，是让读者可以接触到那些提出问题的文本并打开视野。女性作为译者，其根本是不仅要进入同情的作品、也要进入敌对的作品之中。她们必须变成独立的、“抵抗的”阐释者，不仅让敌对作品说话……而且要与他们交谈，并且通过讨论他们以及讨论翻译的过程将其放置于更大的语境当中。（Maier 1985: 4）

“让敌对作品说话”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翻译抵抗的策略之一。而范文美不仅仅是让 Lawrence 说话，而且还加大了音量，让他以更清晰的声音说话。如果说译者在译文中再现原作者/叙述者的男性声音是一种充分地表演，那么明晰和强化男性声音的倾向就可以称之为“过度表演”（overact），过度表演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通过让男性发出声音的方式来达成对话、交流、乃至对抗的目的，暗含着通过揭露而反抗的愿望。那么范文美表演究竟是认同还是反抗的结果，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支持。

事实上，范文美的译文中也会看到译者不同于原作者观点的流露。例如，在 Henry 在暗自思忖如何向 March 求婚以占有她们的农场时，小说描述 Henry 的心理活动时用了这样一些词如“Shrewdly; subtly; sly and subtle (28-29); subtle and cunning (44)”这些词语在文译中大多保留了偏中性的词义，如“精明、狡猾、仔细 (189-190)”等，李译中甚至还用到“野心勃勃”一词。而在范译中，除一次用到“狡猾”外，大都译做带有更浓厚地贬义色彩的词语，如“阴阴地；狡诈，阴险；狡黠、阴险 (171-172)；奸诈 (189)”等。两相对比之下，范译中对 Henry 向 March 求婚一事的描述在文译明显多了一层道德判断的意味（“阴险、狡诈、奸诈”对比“精明、狡猾、仔细”），这些选词流露出表现了译者范文美对男主角阴谋的态度，她显然并不认同这种行为的发生，有意或者是无意地将自己对 Henry 这种计划的看法表露在译文当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译者范文美的表演中并非盲目的认同，而是带有自我意识的表演。从范文美的研究和译著等各方面

来看，她也是一位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的译者。她的主要译著包括了对 Doris Lessing 以女性为题材的系列小说，而在译著序言中就 Doris Lessing 的女性主义观点进行评述（参见范文美 1999：110-121）。与文美惠不同的是，她的性别意识表现在对原作和原作者性别观点的充分再现，无论译者在选择这一翻译策略时是否抱有对抗的目的，最后都达成了充分对话的客观效果，而对话恰恰是实现对抗的必要前提。

翻译中性别的表演常常是带有译者自我意识的表演，这种表演常常会带有译者自己的特性。如本节所分析的三位译者，李建春在整个译文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意识，常常由于对原文理解的偏差而造成表演失误。而范文美和文美惠两位译者的表现却可谓有千秋。范文美对译文中的性/性别冲突和相关隐喻表现出明显的意识，试图在译文中充分地进行再现，充分表演、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过度表演原作者的男性价值观；而文美惠的译文则对原文中的性/性别冲突自始至终地进行淡化处理，弱化原作中的男性价值观。两位译者都对女性主义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却在各自的翻译中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这种现象正说明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译者的性别表演不仅取决于译者的性别认同、性别意识、社会的性别身份和翻译规范的期待，还包括了原文和译文所存在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当时当地社会的性别观念等等多种因素。

本章小节：

译者在翻译中进行性别表演的观点解释了翻译实践中多样性的性别表现。本章的前两节主要针对翻译活动中译者性别的表现方式进行讨论，并具体划分了三种不同的译者性别表现方式。这三种性别表现相互之间并不是排它性的分类，而是在理论探索中呈递进发展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与提升。从女性主义到性别意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走出了“提升女性/译者地位”的政治议题，以描写的研究方式关注更广范围内的性别与翻译的问题。以上这两种译者性别表现——即女性主义译者和具有性别意识的译者——是基于传统性别认识的分析方式，即假定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可以被划分为男性与女性。而本文所讲的译者性别认同的第三种表现方式——对翻译性别表演可能性的承认与探索——则是基于将性别看作是话语表演行为的观点之上的，其核心在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

对性别身份的超越（或伪装）以及其性别视角的转换。可以说，对性别身份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如上两种针对译者性别的不同分析研究模式。在翻译研究领域，Flotow 同样也注意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内部所潜藏着的差异和分歧。她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归为两种研究范式（Flotow 1999），第一种范式是以“常规的”（conventional）的性别假定为基础；而第二种研究范式承认差异和多样性的存在，采用的是多样化的性别观念，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在第二种研究范式中强调性别作为话语的和姿势的表演（gender as discursive, gestural performance），以及翻译的表演性，又称为表演范式（“performativity” paradigm；同上：275）。性别表演的研究范式削弱了第一种范式的基础，把多样化性别话语表演的可能性与作为表演的翻译的观点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不仅是与性别身份相关的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多的可能性。

本章中对译者性别身份的考察始于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选择，并尝试走出对性别身份本质主义的认识，从译者在译文中进行性别身份表演的角度出发，考察对同一文本的翻译中不同译者的性别表现。研究表明，尽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着明确而单纯的政治性特征，但在翻译实践中的译者性别表现常常是复杂而多变的。在保留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译文可以成为译者表演不同身份的舞台。译者的表演可能是全情投入，也可能是有所保留，甚至是暗中破坏。这不但取决于译者的态度和立场，其它的种种因素也都应当列入考察的范围。

第四章 译者的个人身份——作家译者的创造与再创造

本章从译者个人身份的角度切入译者主体创造性的研究，译者在再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性正是译者个人身份的体现。从事翻译活动的作家（即作家译者）这一特殊的译者群体中，创作与再创作的混杂身份表现得更为突出。悬疑作家蔡骏对谭恩美的小说《沉没之鱼》的“译写”体现了译写者与原作者之间，以及译者自身的创作与模仿的双重身份之间的杂合与冲突、影响与被影响的相互关系。作家写作习惯对其翻译的影响亦不能忽视。蔡骏作为悬疑作家特有的写作习惯在文本中留下痕迹。

第一节 参与翻译活动的作家

在后现代研究的语境中，主体的身份不再是单一的和固定的，身份的混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翻译中的身份的边界被打破的模糊与杂合的认同状态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在探讨拉丁美洲英语写作的专著《翻译中的文体与意识形态》（*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 2008）中，Munday 指出，明确区分的原文和译文的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前提被越来越多地质疑，与之相伴的是特定“身份”范畴的问题化。在后现代的学术话语之中，身份越来越被看作是或有的、脆弱的和不完全的，因此也更容易被修改和重构。换言之，一些特定的范畴——在身份研究中是男人、黑人、工作、国家等，对我们而言是原语、译语、作者、译者——都不再是密闭的空间，其边界开始被打破（Munday 2008: 197）。Munday 注意到目前许多文化学者（如 Stuart Hall, Paul Du Gay 等）的研究指向了传统身份范畴的可渗透性，单一身份的不合理性（impracticality of a single unified identity），以及个人通过与社会机构的相互关联而“获得”的身份元素。据此，他提出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换到翻译的领域内，就意味着最相关的问题也许就不再是我们之前认为相对稳定的性别和国家身份是否对译者的风格产生影响，而是源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的边界地带变得模糊不清。这就使我们不再去追寻“美国译者和英国译者译文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男性译者与女性译者的翻译

是否不同”、“男译者翻译女作者会出现什么情况”等等这类的问题，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对翻译概念的考察之上（Munday 2008: 197）。关于研究的方法，Munday 认为对译者身份标记（marker）的研究要求我们调查这一标记是如何在出版物和译者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中“通过语言”而构成的（同上）。换言之，对翻译中的身份研究离不开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语境，其标记最终还是以语言和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

将研究的焦点置于“翻译与身份”——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翻译与“转换中的身份”（shifting identity）——之上，原文和译文的界限变得模糊；作者同译者之间的区划在某些方面也复杂起来。这也正是当代翻译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身份的杂合与多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作者-译者协同翻译（author-translator collaborations）；作者自译（self-translation）和语言混杂文本的翻译之类的翻译实践中，身份的复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结合拉丁美洲英语写作和翻译实践的具体实例，Munday 分别讨论了上述三种情况。本研究也将涉及协同翻译和自译的一些翻译实践活动，不同的是，Munday 所讨论的身份是把翻译作为一种传统上不同于写作的实践活动，即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界限的模糊，也正是因此，Munday 的论述更多的围绕传统认识上的原文与译文的界限、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区划所面临的挑战。而本研究将聚焦于译者身份的杂合与分裂，转换与扮演的问题。

作为一种文学再创作，译者在翻译中既要忠于原作，又要适当再创造，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主体创造性成为译者完成翻译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创造性的过度张扬又常常是争议产生的源头。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是许多作家会从事翻译活动的原因之一。本节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当作家暂时放下自己的创作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如何处理自己作家身份所带来的作者权力与身为译者所受到的所谓“忠实”和“对等”的限制？作者身份所带来对于文本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翻译活动？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翻译作品，建构自己在目的语文化中的身份的？通过对几个作家参与翻译实践活动的案例分析，本研究将尝试探讨作家与译者的双重角色身份混杂的情况在翻译中的表现。

所谓的作家译者的双重身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作家自己精通

第二种语言，自己动手翻译自己的作品，如张爱玲和下文将提到的范玮；还有一些作家虽然并没有亲自动手翻译自己的作品，但是会积极参与自己作品的翻译或对译作的修改活动，如白先勇，以及后文提到的 Milan Kundera（米兰·昆德拉）；更常见的情况是作家翻译外国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许多推动和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本身就是作家，如鲁迅、矛盾、郭沫若、巴金等；此外，翻译也可以成为作家创作的一种手段，较为常见情况的是采用非母语创作的作家在作品中讲述来自母语文化的故事，如华裔小说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就常常带有这样的性质；最后，作家译者也可以是指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进行文学再创造的努力，这也是目前翻译与创造性结合较为普遍的一个研究方向。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再创造，其实也在译者的角色中隐含了创作的成分，使译者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作者，或者说“重写者”（rewriter）、“再创作者”（recreator）。Susan Bassett and Peter Bushs 主编的论文集《作为创作者的译者》（*The Translator as Writer*, 2006）的主题就是探讨关于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成分。该书集合了一些译者在文章中谈论自己如何从事独特的创造性文学实践的翻译工作，强调翻译中的创造性因素，认为译者就是实际上的创作者或重写者，他们的作品能够被全新的读者所阅读并欣赏。

在讨论作家翻译自己作品的情况时，Munday 认为，研究自译的好处在于：1、可以规避作家-译者合作时潜在的误解或权力斗争这些变量；2、除了疏忽或差错，译文中任何的转变（shift）如果不是语言之间的系统性差异造成的，就一定是翻译的特质（the specificities of translation），换言之，是自译者决定引入的有意的抑或是无意的变化（Munday 2008: 207）。然而笔者认为，虽然没有了作者与译者这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误解的可能性，但这最多只能说明了分析自译文本时减少了分析的一个维度而已。其他的种种因素，如自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的把握、读者期待的不同、自译者自身的目的或意图、以及出版社或意识形态的介入这些问题在自译的文本中并没有变得简单。此外，自译者在其中扮演的双重身份，对原文和译文同时拥有决定性的权威（authority），其翻译的目标、心态和策略更成为分析的重点所在。

自译者（self-translator）之所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正是因为它废止了传统的忠实/背叛以及原作/翻译的二元对立模式（Woods 2007:15）。自译的作家同时是

作品的创作者，又是翻译者，他的双重身份反映在翻译中，表现为对原作的处置权。而作者的权威为翻译带来了独立于“原作”的自治（同上）。因此，当自译者把自己的作品译做第二种语言的时候，常常任意修改原作，而不必担心遭受不忠的指责（如俄裔美国作家Nabokov）。³³然而如下的案例却展示了另外一种的自译情况。并非所有的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这样翻译自己的作品。《剑鸟》（*Swordbird*, 2007）的翻译就是一个例子。

《剑鸟》的作者是 13 岁的美籍华裔女孩范祎，她七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11 岁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这部英文奇幻小说。2007 年 4 月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双语版，其中汉语部分是作者范祎自己翻译的。尽管自译者一般不受到忠实的约束，但不同于那些不受“镣铐”限制的自译者的舞蹈，在这个双语作者的翻译中，再创造的成分被减到最低。比如小说的第一段：

英文：

Beams of light fell through the trees, creating shadows that flecked the thick, moist undergrowth. Hidden in a patch of those shadows, a fortress was under construction. Many woodbirds had been captured and pinioned for this, and they worked wordlessly, carrying stones, clay, and sticks day after day. Usually a coal black crow could be found strutting among them. Whenever possible, he would spring on an unsuspecting victim with curses, yells, and a sound slashing. He was Bug-eye, the driver of the slavebirds, who carried a black leather whip the color of his feathers. （范祎 2007：173）

译文：

一束束阳光透过森林照射下来，在茂密、潮湿的灌木丛上投下斑驳的阴影。在森林的深处，一座堡垒正在秘密地建造。许多林鸟被抓来干活，他们的翅膀全部都被捆绑着。日复一日，他们默默地搬运着石头，粘土和树枝等等。通常，还会有一只煤黑色的乌鸦在这些奴鸟中来回晃悠。他一看到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甚至抡起鞭子毒打。他叫臭虫眼，是奴鸟的监工。他的爪上总是抓着一条跟他羽毛颜色一样黑的皮鞭子。（范祎 2007：3）

作为一篇 12 岁的女孩写作的童话故事，这本小说的语言清新生动，带有孩子的想象。上例中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基本一致，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动。小作者显然

³³ 如俄裔美国作家 Vladimir Nabokov（中文译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就自由地进行修订和阐释，并无表现出对原作忠诚的约束。参见 Jane Grayson, *Nabokov Translated: A Comparison of Nabokov's Russian and English Pro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是紧跟着自己的英文版本来进行翻译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我们在作/译者的前言中的一段话中可以找到线索：

《剑鸟》的英文稿写完后，我开始着手把它翻译成汉语，想通过做这个“作业”来巩固和提高我的汉语水平。读者现在读到的汉语稿是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写成的。每当遇到翻译上的困难时，我就向别人请教，帮我找到既忠实于英文原意又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读者朋友如发现有不妥之处，请予指正。（范祎 2007：2）

《剑鸟》虽然是作者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创作时年仅 11 岁，她还是难以摆脱自己作为“学生”的身份，“学生”的身份在她的身份显著性等级中是排在“创作者”前面的，故此跟学生身份相联系的学习行为，就成为她的首要选择。她写作翻译稿的一大目的就是“巩固和提高汉语水平”，并且是把把这项工作作为“作业”来完成。《剑鸟》的中文版也是亦步亦趋，紧跟原文。在中国的出版更是以中英文双语版的形式，成为很多英语学习者的阅读材料。

范祎当然是众多参与翻译活动的作家中较为特殊的例子，在许多情况下，原作者虽然没有自己进行翻译活动，但会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参与到对自己作品的翻译中，他们或是回答译者的提问，或是向译者提出要求，或是提出修改意见，甚至是直接对译作进行修改，Milan Kundera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Kundera 创作第一部作品不久，其作品自 1970 年开始在捷克就被禁，此后二十年时间，Kundera 一直以拥有极少读者的捷克语进行创作，他的很多作品首次出版问世的都是其法语译本。但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的作品通过翻译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Kundera 作为作家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翻译的，也是因为如此，他对自己作品的翻译有着极高的要求，甚至到后期开始直接用第二语言进行创作。

对 Kundera 而言“翻译就是一切”（Kundera 1988: 121），他对采访者说“翻译是我的恶梦，我因翻译而生活在恐惧中”（Elgrably 1987:17-18）。为此，Kundera 将翻译当做是自己的原文一样看待。在法国居住十年之后，1985—1987 年期间，Kundera 修订了其捷克语小说的法语译本，并声称这些版本是其作品的权威版本（authentic version）。他称自己做这项工作是为了建立新的“原文”，以便于其作

品可以译入更多语言(Woods 2006: 2)。³⁴在Kundera这里,作者不但没有“已死”,而且还掌控了译作。但尽管Kundera一直抱怨译者的翻译都不够忠实,但他自己对翻译的修改也表明,他没有完全依照原先的捷克语原文,而是在不断的进行改写甚至重写,他忠实的对象并非原文。Woods认为,他寻找的是对他的小说理想状态的忠实,或是对“作者风格”的忠实(同上: 6)。原文和译文、翻译和创作之间界限在Kundera的作品及其翻译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早已变得模糊。

Kundera 以创作者的身份直接操控着其作品的翻译,但与此同时,翻译也在以一种隐蔽地方式影响着他的创作。他表示:

从那时起,我被迫只为译者而写作。然而看似吊诡的是,我感觉这对我的母语有很大的帮助.....我很关心自己的作品被忠实地翻译。在写作我过去的两部小说时,我脑中尤其想着我的法语译者。我让自己——开始时是不知不觉地——写作更朴素的,更易于理解的句子。对语言的净化。(Kundera 1977: 4)

Kundera 毫无疑问是一个特例,由于他必须通过翻译才能为大多数读者阅读,他原作的唯一读者实际上就是他的译者。因此,他在创作时心里随时想到的是他的译者。这影响了他写作时的语言,他力图使语言清晰、易懂。同时他对自己作品翻译后的效果也有一定的期待。对翻译/译者的需要,影响了作者的创作。Kundera 创作的时候想到的是译者,想象译者在阅读他的原作时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会句子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然后针对自己预测的译者反应,做出回应,让自己的句子更易懂。作者创作过程中,脑子里随时保持着跟自己所扮演的译者进行的内部对话。此外, Kundera 通过翻译来树立/改变自己在西方读者眼中的形象,确立自己的身份。翻译已经成为 Kundera 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Kundera 的创作成为翻译过程的一部分,是翻译的开始。与其说 Kundera 是用捷克语进行创作,倒不如说,他为自己的法语创作加入了捷克语的腔调。

创作者在参与翻译活动的时候,有着不同的表现。与作家身份相伴而来的是对自己作品的处置权,翻译自己作品的作家,或多或少地都会进行再度创作(如林语堂、张爱玲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自译的作家都是如此。有些作

³⁴ 由于捷克语译者的缺乏,昆德拉作品的许多语言版本都是从法语转译的。

家，如上文提到的范祎，由于自身创作经验、年龄、创作题材（童话故事）、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作为学习语言的途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反而会十分小心翼翼的处理译作。

第二节 《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译者个人身份的凸现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与作者之间亲密而有共鸣的关系有利于译者的工作。也正因如此，一些女性译者会更倾向于翻译同性作家的作品（如朱虹 2003；de Lotbiniere-Harwood 1991），以避免由于性别身份冲突而引致的不快。然而正如本文一再提到的，任何人都身份都不是单一的，每个个体都是由不同的身份组合而成的。即便是同样的身份，个体对身份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故此认同也可能是只是部分的而非毫无保留的全盘接受。要求译者毫无保留地完全认同作者也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以“忠实”为目标的翻译观念所幻想的理想状态。况且，更多的情况是，译者和作者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必须承认，译者对原文作者（以及源语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同和理解有助于翻译活动的完成。就《沉没之鱼》的译写而言，蔡骏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对原作者的认同——尽管这其中也不排除为了某种目的而自我宣称的认同感——同时，他们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认同与差异在译文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以下将以谭恩美的《沉没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的中文译写为例，具体分析其译写者蔡骏的多重身份在《沉没之鱼》中文版本中的表现，试图说明译者的种种个人身份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的翻译和改写被写入译文（第三章），进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建构/重构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集体身份的（第四章）。

一、《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过程及其译写者蔡骏的悬疑作家身份

《沉没之鱼》是美国华裔畅销小说作家谭恩美（Amy Tan）2005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其中译本《沉没之鱼》2006 年九月在中国出版。小说讲述来自美国旧金山的一行 12 人前往中国以及兰那王国旅行的经历，领队陈璧璧在出发前意外死亡，她的魂魄跟随着旅行者，以幽灵无所不知的视角叙述了这些游客的离奇经历。³⁵

这本小说引起笔者的注意就在于它的翻译采取了与一般的翻译方法较为不

³⁵ 所谓“兰那王国”实际上是该小说中文版本的杜撰。原作中讲的是发生在缅甸的故事，并且以高度的真实性描写了缅甸的民俗、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原作者谭恩美也以此为傲。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在缅甸人权问题的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政治争端，在小说译入中文时最大的一个改动就是将故事发生的背景从缅甸置换到一个虚构的东南亚古国“兰那王国”，并添加了一段兰那王国的历史。尽管如此，译文中基本保留了缅甸的文化、民俗和自然风光方面的内容。

同的策略，在其中文版本的译者序言中交待如下：

为使本书被更多中国读者接受并喜爱，最大限度减少语言障碍产生的问题，中文版《沉没之鱼》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第一步，先由译者完成基础翻译稿，原则只有一条：准确表达原著的每一句话及每一个词。第二步，再由中文作家用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将本书的基础翻译稿细致地改写一遍，在忠实于原著情节的基础上，使中文版的语言更加中国化，以适合大多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本书的精髓。（蔡骏 2006：6）

这位“中文作家”就是蔡骏，一名中国悬疑小说作家。由于这一翻译形式的特殊性，出版社与译者采用一个新词“译写”，即“翻译与改写”，来说明这种翻译策略。小说封面上亦署名“谭恩美-原著，蔡骏-译写”。然而，正是这一特殊的署名方式，引起了各方的争议。一些读者和评论者认为蔡骏既不懂英文，又没有阅读英文原文，他没有参与从英文到中文转换的这个过程，因此不具备署名为“译者”的资格。但本文认为，尽管蔡骏并没有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但他在此次翻译活动中的承担的任务同样构成了一般情况下翻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负责将英文原著转换为中文“基础翻译稿”的译者也只是完成了翻译过程的一部分，而剩下的部分，即对中文的修改润色，则是由蔡骏来完成的。据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没有直接阅读英文原著就意味着他不具备署名为译者的资格，何况译界对林纾的大量研究也证明了这种翻译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并无人质疑林纾的译者资格。应当说，蔡骏在其中担任了部分译者的角色，而并非全部。他与直接进行语言转换的那些译者的共同合作促成了《沉没之鱼》中译的完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此次翻译看作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结果，而最终的署名，根据出版社的表示，完全是他们团队内部协商的结果。关于署名资格的问题，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因此不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由于蔡骏是此次翻译活动中最为显著的人物，本文将主要讨论他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与其翻译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不会细分其他那些匿名译者在其中的具体角色和影响。事实上，《沉没之鱼》的中译第一步要求尽量字对字转换，这已经最大化地降低了这些译者在译文中的声音。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即便是最忠实的直译也不能完全使译者隐形，但此次翻译的特殊情况确实使蔡骏成为所有译者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位。

蔡骏本人的作家身份不但没有因为他从事翻译工作而被暂时搁置，变成隐性的身份，反而处于显著（salient）和被激活的状态。在中文译本的封面上，读者可以看到如下的一段推广辞：

东西方华人世界两大文字高手联袂出招，
美国华裔作家第一人谭恩美倾力巨作，
中国悬疑作家第一人蔡骏译写。（蔡骏 2006）

在排版方面，“蔡骏”的名字做了高亮的处理，被明显地標示出来；与之相对应的是作者谭恩美的名字并没有任何的特殊处理。译写者蔡骏被放在了与原作者等同，甚至是更显眼的位置之上。蔡骏之所以被如此强调是因为他“中国悬疑作家第一人”的身份。此外，在中文译作的扉页上，作者与译写者之间的对比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中文译本的扉页上是分别对原作者谭恩美和译写者蔡骏的介绍。谭恩美的简介只有短短的一行半的长度：“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作品有《喜福会》、《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等”（蔡骏 2006：扉页）。与这样一段极其平白和程式化的简介形成对照，其后紧接着对蔡骏的介绍占据了整整半页纸，长达 250 字左右，其中不乏“摩羯座”“灵感的宠儿”等突出其个性的语言，以及对其文学成就的详细列举。像这样将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一再强调，甚至超越作者的情况并不多见，这更凸现了该书的翻译与我们通常见到的翻译作品的不同。

出版社做出这种安排的商业意图非常明显，选择蔡骏担任译写的工作，甚至从一开始决定采用“译写”这种备受争议的翻译方式其实是出于市场方面的考虑（舒晋瑜：2006）。出版商在各种媒体采访中并不否认这一点，承认是为了改变谭恩美的中文译著在中国销量不理想的局面，因此才去找来出生于七十年代的畅销作家蔡骏，并以高调的方式在市场上推广，利用其畅销作家的身份来扩大谭恩美在中国的读者群体。《沉没之鱼》的新书首印达到 8.5 万册，尽管还比不上蔡骏本人作品的销量，但已经比谭恩美的其它中文翻译小说的销量要高出许多。有评论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使该书畅销的是蔡骏，而不是谭恩美（张英等 2006）。蔡骏本人也十分清楚这一安排：“我承认本书的畅销，必然与封面上我的名字有关”（蔡骏 2007：206）。

市场的因素在这次翻译的策划和译者的选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化社会的日趋形成，文学翻译与出版也越来越受到读者诉求和产品的商业利润的牵制。然而尽管《沉没之鱼》中文版翻译策略的市场导向的如此明确，但笔者认为翻译研究者并不应当把它仅仅看作是一次商业操作的成功：发行量的增加同时意味着谭恩美在中国读者群的增加。对于原作者本人而言，在问及对“译写”的看法时，谭恩美在采访中表示，改写是翻译中无可避免的情况，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她在中国的家庭能够阅读并理解她的故事（张英等 20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导向的翻译策略并不见得就是对文学翻译造成损害。无论是对文学原著还是译作，出版和推广都是极其重要的。

市场倾向决定了这部小说在翻译发起阶段的特殊性。蔡骏并不是作为普通的翻译工作者，而是带着他悬疑作家的身份参与了《沉没之鱼》的翻译活动，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作家身份不但没有暂时让位于其所担任的译者角色，反而被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本章在此提出的问题是，除了市场的影响力之外，蔡骏的作家身份对《沉没之鱼》的翻译是否还有别的影响？作家的创作习惯在译作中是否以及是怎样表现出来？他与原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蔡骏对原作/原作者的认同

正如译文出版发行过程中所一再强调的，译写者蔡骏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国悬疑小说作家”。根据扉页中的简介所言，蔡骏生于 1978 年，从 22 岁开始发表小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二部，据介绍创下中国原创悬疑类小说畅销记录，其中一些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从译者的序言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等翻译副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蔡骏首先表现出对原作/原作者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既有他自己作为作者在文学创作题材和方式上与原作者的认同，也有他因承担译者的角色而产生的认同。

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蔡骏表现出与谭恩美在文学创作灵感方面的共鸣。借助译写这个方式，他在完成翻译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创作灵感。谭恩美在小说开始之前的“致读者”中交代了这部小说的创意来源。根据谭恩美的叙述，她在一

个电闪雷鸣的夏日为了避雨碰巧走进“美国心灵研究学会”，读到了一个名为陈璧璧的鬼魂与人通灵写下的故事；谭恩美被她的故事所吸引，进而去访问了与陈璧璧通灵的人，并收集相关资料，创作了这部小说（Tan 2006: xii-xiv）。无论这段小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作者在序言中试图使我们相信，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陈璧璧确有其人，这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和神秘性，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容易进入故事的情境。正如谭恩美自己所说：“无论是否相信通灵之说，读者们沉浸在小说中时都愿意暂时将怀疑搁置一旁”（Tan 2006: xiv）。

中文译本中，作者的上述策略通过“致读者”的翻译得以传达，并且译者的序言延续甚至强化这一策略。在序言中，蔡骏描述了自己两年前做过一个关于某神秘古国的怪异的梦，并且受这个梦的影响，曾构思过一篇类似题材的小说。蔡骏称，当看到《沉没之鱼》的基础翻译稿时，

才发现两年前我的奇异梦境，竟已隐藏在这本 2005 年出版的美国畅销书中了。我怀疑小说主人公陈璧璧是否真有其人，她的幽灵是否也曾向我托过梦。正如在《沉没之鱼》的开头，谭恩美因避雨意外地来到“美国心灵研究学会”，进而发现了陈璧璧幽灵的自述。我也是因为这个两年前奇异的梦，才决定要完成本书中文版的译写工作。（蔡骏 2006: 1）

通过建立一种神秘的联系，译写者蔡骏与作者共享了这个故事的原创性。他自己的创作灵感在原作中实现，并且随后通过他自己的翻译改写为中国读者所知。原作者将读者带入其小说世界的策略在中文的语境中进一步延续了下来。

另一方面，作为翻译改写者，蔡骏又不忘强调自己作为译者的角色。在翻译副文本（包括前言和采访）中，他重申自己作为译者对于原著的认同感，表示进行译写的时候“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作品”，他说

我能体会到作品人物的心灵，体会到作者的种种睿智和机敏，有一股情绪通过作品与我结合在一起。我可能是除了谭恩美本人之外，对这部作品体会最深的人。至少在中文版里含有我生命的一部分。（蔡骏 2007: 206）

蔡骏不但强调与作者的认同感，还不忘拉近自己同原作的距离。在译者前言中，蔡骏特别指出陈璧璧生于上海，在马斯南路渡过童年时代，而他自己也曾

在那里工作过几年。作为一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年轻人，我想我命中注定与本书有缘吧”（2006：7）。尽管这种拉近距离的努力在译文中反客为主，强化并夸大了主人公对“上海”这个地方的感情。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做详细论述。

蔡骏不断地重申他对原作/原作者的认同和理解，这符合了一般情况下社会译者角色的期待——换言之，译者应该透彻地理解原作。通过拉近自己同原作者以及原作之间的关系，蔡骏为自己担任译者的角色进行铺垫，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目的语读者那里树立起自己作为一名值得信赖的译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译写者——的身份。排除由于出版审查制度等因素而必要进行的改写，译写者试图获取目的语读者信任的努力是否就意味着他真的如自己所言，“完全融入作品”，成为原作者的代言人了呢？或者这有可能是借助表面上的认同而实际上暗渡陈仓，实施改写操纵的手段呢？

蔡骏声称自己的工作只是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认识本书的精髓”，“喜爱这部作品”，但显然，应当如何理解“阅读习惯”“本书精髓”的问题显然因人而异。通过文本比较发现，蔡骏实际上对原文的改写还是较大幅度的，其中包括删减“冗长的内容”，“增加了几部分内容”，和“重新编排章节”等（蔡骏 2006：6；7）。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探讨蔡骏在译文改写中个人主体意识的凸显，以及更重要的是，这种主体意识所体现的身份动机。

三、蔡骏的个人身份对译作的影响

本文在第三章中提到，女性认同的译者的矛盾在于，她们一方面努力确立自己作为创造者而非再创造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热切地与原作者结成同盟，尤其是当原作者是女性的时候更是如此（Maier & Massardier-Kenney 1996: 227）。事实上，这种矛盾的存在不仅是女性译者所专有，蔡骏对谭恩美的译写也表现出这种矛盾的倾向，只不过在蔡骏那里，与原作者的结盟更多是外在的表现，而自我创造和改写则是在联盟的掩护之下的暗度陈仓。

谭恩美在这部小说中一改她以前的创作风格，加入了一些流行的创作元素。叙述者在小说一开始就离奇死亡，并作为一个幽灵跟踪并叙述故事的发展，其死因到小说结束时才真正揭开（其英文原著因此而被归为“幽灵小说”）；旅行者

在中国丽江受到诅咒，他们在兰那王国的经历更是一波三折；小说开头以一篇新闻报道的方式交待了游客在兰那王国的失踪情况和种种猜测，谜底直至小说后半部才慢慢展开。这些探险元素和幽灵叙述方式使得该小说在一开始就具有了“悬疑小说”的某些特征。但它又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悬疑类小说，它只是具有悬疑小说的某些特征，谭恩美以她惯用的黑色幽默来表现自己对苦难和救赎这一主题的思考。

而在另一方面，悬疑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特点就在于悬念迭起、情节曲折、惊险刺激的故事。在写作技巧方面，与传统小说重视人物刻画、情节多采用线性叙述不同，悬疑小说更注重故事情节的推进和故事的娱乐性（汪政 2007：4）。作为一名典型的类型小说作家，蔡骏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悬疑小说，他所熟悉的写作技巧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第一次从事翻译工作的蔡骏在采访中声称自己不但不能脱离原著，需要注意克制创作的冲动（2007：205）。然而，事实上尽管他表示自己会尽力去了解原作者、理解原文、并努力靠近原文，但他的创作冲动和独有的写作习惯并没有因为担任译者的角色而隐退。再加上小说题材方面的一致性和译写这种翻译方式带给他的相对于其他译者较大的自由度，使得他原有的写作习惯在《沉没之鱼》的中文版中显露痕迹。在中文译本中，蔡骏专门从事悬疑小说创作的特殊身份相的加入，促成了《沉没之鱼》进一步悬疑化的倾向，译文与原文相比较而言，其中悬疑小说的特征被进一步强化。

蔡骏在译者序言中声称对“原著一些较为冗长的内容”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简。对比原文我们不难发现中文版中确实存在大量删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审查制度的考虑而造成的，特别是与缅甸的军政府和人权问题等相关的部分。除了由于意识形态冲突和审查制度限制导致的删减改写，译文中还有大量关于人物背景叙述被删除，而这些内容中有些并无任何的政治敏感性。谭恩美原著中参加旅行的十二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背景和故事，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境和问题，希望通过这次旅行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从事不同的职业，相互之间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原作中谭恩美以幽默诙谐的笔调描绘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众生相，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多个主题之一。然而在译文中，关于这些游客的许多背景故事却被当作是“冗长”的

内容被删去，极大地削弱了这些人物形象个性特征。例如原文中陈璧璧变作幽灵观看自己的葬礼时列举了几位来参加葬礼的人：

原文：

Luc, my gay haircolorist; Bobo, my gay Brazilian housekeeper; and

(Tan 2006: 5)

译文：

Luc, 我的染发师; 波勃, 我的巴西裔管家。(蔡骏 2006: 5)

在中文译文中，有关“同性恋”的信息被删除。尽管两人并非故事的主要人物，他们性取向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信息。但却都在译文中丢失了。在原语文化中，这一信息并无特别之处，应当不会引起读者的特别注意，“同性恋”这一信息使这些参加葬礼的人物群像更为生动，读者甚至可能会联想他们二人的关系，也符合全篇小说中诙谐轻松的口吻。而在目的语文化的传统观念中，在与故事情节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叙述中加入“同性恋”这一信息，可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力，读者或许会认为这样的信息背后还会有其它的暗示，在译文中就多出了可能会分散读者注意的“不必要”信息。事实上，原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同性恋”，旅行团的领队本尼就是其中一个，他还因此而与父亲断绝关系。但这些信息在译文中全部都被删减。

被删除的这些游客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大多与他们在中国和兰那王国的经历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删改符合了悬疑小说的特征之一，即重情节发展，轻人物刻画。面对谭恩美花费大量笔墨塑造的人物，蔡骏以自己创作习惯进行判断，认为这些内容是冗长的、影响故事效果和情节发展的，因而目的语读者也无须知道这些信息，应当删去。而这些删减所造成人物形象的不完整以及前后文细节方面的一致却被认为是次要的。对原文中“冗长”内容的判断显然夹杂着译写者作为作家自身的创作原则和规范。他以自己的创作标准来判定原文的优劣之处，并将这一判断通过改写强加于原作之上。

除了删除认为是“冗长”的内容之外，译写者还常常在译文中添加一些段落，意在制造悬念、营造神秘气氛。悬疑小说一个常用的写作技巧就是“预示”（foreshadowing）。这种叙述方式预示情节发展的方向，但同时又设置种种悬念，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直到最后其真相才一一揭示。谭恩美在这部小说中多次

采用“预示”的叙述技巧，这些技巧在译文中基本上都得以再现，本文不再一一举例说明。在此基础上，蔡骏还添加了更多的类似结构，如当美国游客们决定提前离开中国，进入兰那王国的时候，译文中加入了这样两段：

通往兰那王国的大门已经敞开，时间是，今天。

我在黑暗中祈祷我的朋友们平安，他们即将踏入未知的旅程，命运之河横亘于他们跟前，而他们自己编织起了一艘小船，将渡过充满瘴疠的波涛，驶向那传说中神秘的彼岸。（蔡骏 2006：77）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原文中所没有，由蔡骏在译文中加入。译文中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添加，又如：

终于，埃斯米成为了这条小狗的主人。它将伴随着我的朋友们，度过今后几十天的疯狂旅程。（蔡骏 2006：44）

或许，就连斯蒂芬·金这样的恐怖小说大师，都难以想像他们即将遭到的悲惨诅咒吧。（蔡骏 2006：52）

这些添加的部分在内容上对原文并无特别的改动或冲突，仅是起到制造悬念，预示后果的作用，增强了小说悬疑的氛围，从而使译文更接近悬疑小说的特征。

在语言风格和段落组织方面译文相对原文也有了较大的改动，主要体现在段落节奏变得更加紧凑，叙述的语言也有原文的冷静幽默变得更情绪化。这一点从小说正文开始第一段的翻译中就可以看到：

原文：

It was not my fault. If only the group had followed my original itinerary without changing it hither, thither, and yon, this debacle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But such was not the case, and there you have it, I regret to say.
(Tan 2006: 1)

译文：

天，请宽恕我的过错吧——假如这真是我的过错。

我最大的过错是：我已经死了。

为何要改变日程？为何要踟躇再三？若我再提前几周，灾难恐怕就不会降临。

但遗憾的是，恶运确实来敲我的门了。（蔡骏 2006：1）

与原文相对冷静和略带黑色幽默的风格（这也是谭恩美在本书中的语言特色之一）叙述语言相比，中文版小说开头的语言变得更加情绪化和夸张的倾向。诸如此类的改动在译文中并不鲜见。此外，像这样把原文的一整段话，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分割成几个小段的做法，更是比比皆是。译文的语言带上了蔡骏强烈的个人特征。该书的出版人李寻欢曾表示，他原本就是要“用蔡骏的语言讲述谭恩美的故事”，因为“蔡骏的语言更适合讲这个故事”（赵明宇 2006）。这种把作品简化为“故事”的想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小说翻译在发起的时候就是被当作悬疑的类型小说处理的。而蔡骏的悬疑作家身份和（再）创作的空间在这本小说的翻译和改写过程中是受到鼓励的。

综上所述，译文在删减与情节无关内容、强化悬疑类小说的写作手法、以及加入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的改写都显示出译写者蔡骏一向的创作惯性和语言特点。而这些特点与他自己长期从事悬疑小说写作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作家的身份带给蔡骏特定的创作习惯，这一身份在翻译出版策划的鼓励之下，不但没有因为其担任译者而退居其次，反而被一再强调，在译文的出版过程及文本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最后，正如本文第二章时所讨论的，翻译的对话常常是多重性的，蔡骏在《沉没之鱼》的翻译中表现最明显的是他作为悬疑小说作家的独特身份，但在译写原文中某些女性特有经验的部分时，他作为一名男性对女性经验的疏离感就显示了出来。谭恩美的小说长于母女关系的刻画，《沉没之鱼》也不例外。女主人公陈璧璧的母亲早逝，她的后母向她描述母亲生产时的惨状：

原文：

You were too big to come out between her legs, so the midwives had to slice her nearly in two and pull you out like a fatty tapeworm. You weighted over ten pounds, and you had bloody hair down to your shoulders. (Tan 2006: 25) (你太大了，没法从她两腿间出来，接生婆几乎把她切成两半才像拽肥绦虫一样把你弄出来。你体重超过十磅，沾满血的头发披在肩膀上。)

译文：

你出生时太大了，难产，接生婆好不容易把你抱出来，满身是血。
(蔡骏 2006: 21)

原文中的叙述简单而又惊心动魄，细节的描述显现出女性对生产经历独有的感受，也为陈璧璧与后母和生母之间的关系发展做出了铺垫。而这段描述经过蔡骏的译写之后被简化成“太大、难产、好不容易、满身是血”这样马虎而粗略的表达，给人敷衍了事的印象。如果我们依然假设此次译写的第一步是字对字地翻译，那么这样的译文应当是蔡骏改写的结果。蔡骏显然无法对原作中赤裸裸的生育场景产生同理心，而是选择躲开了这样一段描述，简单地一笔带过。性别的身分和由此带来的体验（或体验的缺乏），就像身为悬疑作家带来的写作习惯一样，内化成为译写者蔡骏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在无形中影响着再创造过程中的选择取舍。这里的再创造实际上是消极的不创造，甚至是不再现。

身份的缺乏导致了译文的简化，但在紧接着的一句话中，译写者采取了弥补措施。女主人公在听后母的描述时浑身发抖，而在译文中增添了一句她此时的心理描写“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个阿鼻地狱吗？”（蔡骏 2006: 21）³⁶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对原有描述的简单化处理，在这里，蔡骏通过添加“阿鼻地狱”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简单化处理进行了补偿，从侧面来表现女性生育的痛苦。事实上，蔡骏用“阿鼻地狱”来形容这一场景并非偶然，他在自己创作的悬疑小说《地狱的第十九层》（2005）和《蝴蝶公墓》（2007）中都曾用到“阿鼻地狱”这一素材，可谓再熟悉不过。蔡骏以自己所熟悉的内容来补偿由于不熟悉而造成的译文损失，所产生的效果无法一言蔽之，因为读者在毫无语境的情况下，也许无法很快理解“阿鼻地狱”所代表的意义，但毫无疑问的是其自身的创作习惯的再次显现。

作为一种文学再创造的活动，翻译中的改写早已成为应有之义（Bassnett & Lefevere 1990: i）。《沉没之鱼》的独特之处仅在于它把译文中的“改写”这一元素明确地告知目的语读者并大肆宣传，才引起种种猜疑和争议（这也可能是出版社的炒作手段之一）。至于合作翻译这种方式也并非没有先例，如林纾的翻译，在翻译研究界也广为研究。蔡骏参与翻译备受关注的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作家身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这一身份给翻译工作注入了更多的创作成分和个性特征，使作品更多地带有译者的烙印。而实际上，文学翻译本身所要求的创造性，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再创造的工作。从这

³⁶ “阿鼻地狱”，“阿鼻”是梵文的音译，“无间”的意思，因此又称“无间地狱”，指痛苦无有间断的地狱，佛教宇宙观中最苦、最黑暗的地狱，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释义参考维基百科）

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位文学翻译的译者都具有作家和译者的双重身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创作的能动性是多数文学翻译的必然要求，这一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和译者自我的制约和影响。国家的、社会的、文化的、市场的等等各种因素通过译者作用于翻译过程，译者的身份正是链接其间的纽带和关键。翻译的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很多时候这完全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想要做什么”（Schwartz & De Lange 2006: 18）。译者身份本身要求按照社会对翻译的期待完成其翻译任务，译者的其他身份——如本文中蔡骏的悬疑小说作家的身份——又极大地影响了他/她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尤其固然的特殊性，但这并不能遮蔽其普遍性意义。

第五章 文化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改写

以上第二、三、四章分别讨论了译者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而作为不同文化社会沟通交流的主要途径，翻译还为两个文化集体提供了相互审视比照的机会，其文化身份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建立和改写。文化（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与重构是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章主要探讨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在翻译中的重新建构及其与译者文化认同的关系。通过分析《沉没之鱼》中文本中中国形象改写，本文发现，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提升自我文化身份的倾向，译者与作者作为各自所属文化群体的代表，在翻译这个文化交流的边界地带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一节 文化身份与翻译

文化研究学者 Stuart Hall 在讨论文化身份的问题时提出，国家是一种符号社群（symbolic community），而国家文化就是一种话语（discourse），是建构意义的方式之一，这种话语影响并组织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自我认识（Hall 1991: 612-613）。通过国家叙述（国家的历史、文学、传媒和大众文化）、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纯粹的原住民观念等叙述方式，国家的文化身份被逐步建立，而所有这些叙述都几乎难以还原所谓真实的本来面目，有很大的可能是服务于叙述主体的政治意图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文化身份并不是我们生来具有的，而是在“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之中形成和转变的。Hall 认为，国家这个符号社会满足了人们对认同的需求，故而具有生成认同感和忠诚感的力量（同上：612）。关于这一点，在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研究中有同样的观察，个人通过维持和提高集体的身份，来维护自我认同。

翻译，作为言语交流的基本形式之一，本身就是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叙述话语建立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了被解构和重述（re-narrate）的种种可能。既然民族文化身份通过再现建构出来的，那么被成为“再现的再现”的翻译也就具有了转变民族身份的力量。此外，身份的形成离不开自我与他者

之间的相互映照，无论是个人的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需要有他者的存在作为参照才能够得以确立，所谓身份也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分隔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翻译活动跨越了两种民族文化，为双方提供了彼此审视和自我展现的最佳机会。在翻译这个跨文化的语境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得以充分接触，产生碰撞、冲突、对抗、较量、交流、协商、乃至融合（或杂合），而彼此的身份，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建构或重构。

一方面，正如赫尔曼（Theo Hermans）所指出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文化自我指涉或者说自我界定的独特的标识”（赫尔曼 2000：12）。一种文化会把处于自己文化体系之外的文化视为异己，在这种语境之下，翻译提供了获得外来信息（即他者信息）的手段，以便进行文化自我界定，“从这一方面来说，翻译的各个方面都与文化自我界定有关”（赫尔曼 2000：13）。所谓的“文化的自我界定”也就是某文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在与其它文化相比较的过程中对自我的认识和界定。因而，翻译成为一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操控自我形象、建构或改造自我身份的主要手段。

另一方面，通过翻译可以书写新的身份，被重写的身份可以是自我的身份，也可以是他者的身份。André Lefevere 通过对西方部分翻译史的回顾，说明“翻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文化在某一时期的自我形象，以及这个自我形象的所经历的变化”；最终，对翻译的研究不仅能够告诉我们世界文学的情况，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情况（Lefevere 1990：27）。因此，翻译除了为一个文化提供自我界定的异质信息，它还为本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构异质他者文化身份的场所。人们通过翻译认识他者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翻译是他者文化在本土文化中构筑其形象的主要形式之一。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可能想利用翻译的媒介，维护甚至提升自我在他者眼中的形象，塑造自己想要的身份。在中国，将中文的作品译入外语，一向被认为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2006年11月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中华经典外译学术研讨会”，以及2007年4月在北京举行，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主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以及其它种种类似的活动和组织，都让我们看到了学术界、出版界和政府对中译外的重视，亦表明了翻译作为构建文化身份的手段至少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认识和

利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出版，更是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巨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新闻宣传语）。在这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翻译活动中，中国政府希望借助对中国作品的外译，向世界介绍和宣传自己，力图改变外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不足或存在误解的情形，从而树立/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国家身份的努力显而易见。考虑到此类翻译的发起并非是出于对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的考虑，而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推销，这种对自我身份改写的努力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甚或起到相反的效果。《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在境内外的境遇的不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相对于中国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在国内受到推崇，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在国外更受欢迎。由此可见，自我推广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并非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将母语译入外语，译者以及翻译的发起人可能希望外语读者能够通过文本了解源语的语言文化特色。将母语译入外语的翻译大多会带有树立自我身份的目的/潜在效果。

尽管上述的中译外活动主要为国家组织出版界来进行，但译者个人在此活动中的身份认同和心态也颇值得玩味。在这些活动中承担翻译工作的多数是中国的译者，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而言属于源语语言文化的一员。文化身份会带来对源语文本（多数为经典文本）的认同和欣赏，而此类翻译项目的目的（“弘扬本国传统文化”）更会加深译者在其中所承担的使命感。此时，个体身份认同与文化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个体有可能并且有机会通过提高集体身份地位的方式来保护和提高自我认识。在这种心态以及明确的目标的影响之下，译者采取尽力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的策略就不足为奇了。如上文所提到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就属于此列。当然，也不能排除在中译外活动中担任翻译任务的译者会有其他的认同方式，或因其他各种原因而采取不同的策略。整体而言，在当代中国由政府作为赞助人组织的中译外活动中，译者在其中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其文化身份与集体文化身份相一致，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顺应翻译活动组织者的目标的。

翻译对于自我文化身份建构的手段并非只是为当代中国社会所认识和利用，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运用翻译作为身份建构的手段。通过对《新

青年》翻译行为的具体分析，潘艳慧（2006）认为翻译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的作用重大，并且在很多时候它还成为真正的“跨文化”权力运作的所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对译本的选择、对翻译方法的操控、对受众的身份设想等多方面的有意识的行为和选择来对某一异域文化予以取舍；此外，他们在本土文化中还成为某一异域文化的“代言人”或“解释者”，从而潜在地建构了其文化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身份。因之，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诉求是以他们作为译者的身份预设和建构为重要基础与开端的（潘艳慧 2006: I-II）。潘艳慧的研究中，“译者”这一身份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藉以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于“翻译”阵地的争夺，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翻译建构起“现代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建构自我身份的诉求反映出作为译者在翻译的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西方，罗马帝国时期对希腊文化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就是当时罗马文化形成并创新的主要途径。对罗马人而言，翻译帮助他们思考和发现自己语言独特之处，也是创建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方式之一（Moatti 2006: 115）。事实上，罗马人毫不否认翻译是他们身份构成的主要部分。像罗马人那样利用翻译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举措，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翻译参与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一种隐蔽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翻译为强势文化所利用，成为文化殖民的工具时更是如此。

书写自我身份的同时，翻译也进行着对他者身份的改写。从外语译入母语的过程就常常涉及到对他者身份的改写。外语文本所表现的异族文化可能会通过翻译而被改动。这种改写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翻译毕竟不是透明的玻璃，折射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化身份必定不是原原本本、丝毫无损的，而是有所减损抑或是添加了的元素。这种改写也有可能是译者故意所为，意图迎合或者试图改变目的语读者对异族文化的认识。改写的方式和程度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目的语的接受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译者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态度，甚或是目标读者的意志。如许钧（2007: 117-127）对 20 世纪法国作家法郎士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形象塑造的研究发现，法郎士在中国的身份和形象是通过译者或评论者对外国作家的作品或行动的评论（而并非仅仅是译作本身）而建立

起来的。而这种方式的形象建构，往往是由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为我所用”的策略所产生的“操控”力量，它决定了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也决定了译者或评论者的理解视角。随着中国接受语境的逐渐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译者和评论者的评论的变化，法郎士最终以“人道主义斗士”的形象和身份为中国读者所认同。法郎士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充分说明了原作者在异域文化中的身份形象是可以通过翻译的话语而建构起来的。而在这里，翻译的话语不仅仅包括“译文”本身，而是包括了翻译评论在内的其他相关文本。

由于目的语国家“为我所用”的策略而产生对源语国家身份的操控也发生在中国清政府外交信件的中译中。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发给中国的外交信件中精心建构了大英帝国的国家身份，并希望与中国建立相对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而这一关系在给乾隆皇帝的中文译文中被赫然改写（参见 Chen 2006; 王辉 2009）。在信件的中文版本中，英国变成恭顺的臣子，其想要建立平等贸易关系的要求亦被巧妙地淡化处理。诸如“礼物”（presents）被翻译为“贡物”，“特命全权大使”（E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被翻译为“贡使”等此类的改写并不鲜见。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信件中所建构的自我身份（也包括对方的身份）在译文中被完全改写，迎合了信件的目标读者——即当时清朝统治者——所认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图景（world-picture）。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改写并非译者的自由选择，英国使团国书原有中文副本，是经过重译才呈给乾隆皇帝的。使团自译的礼品清单中将其首领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称为“钦差”，而使乾隆大为不悦，斥之为“识见卑鄙，不知轻重”，由此而引致一系列的重译和改写，甚至连底稿也不可存档流传（参见王辉 2009: 30）。“钦差”一词的使用显示出试图在其译文中建立英王地位的努力，而对原译的重译和改写则是清政府上下对自我心中的双方身份地位的坚持和维护。当然，清政府这种试图通过翻译而自欺欺人的行为并未能长久。1842 年的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被迫遵从英方要求，双方的来往信件必须符合平等原则（Chen 2006: 10）。翻译，在这里既是达成沟通的渠道，同时也是阻碍沟通的屏障。乾隆所读到的外交信件的中文译本中所建构起来的中国和英国国家身份，迎合了，同时也蒙蔽了它唯一的读者，在其眼中建构起一个虚假的世界图景，是具有欺骗性的，一厢情愿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关系。

关于翻译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力量的研究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部分，后殖民翻译研究考察和发掘翻译在民族身份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翻译在殖民帝国建立的过程中（coloinze）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也包括了在后殖民时期翻译作为文化去殖民化（decolonize）的途径而成为弱小国家彰显和建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Michael Cronin 对身份问题的探讨更具有后现代意义；此外 Edwin Gentzler 对美洲各国翻译历史的检视也从历时的角度阐释了翻译在文化身份构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翻译活动参与文化身份构成的现象在 Venuti 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他认为翻译所造成的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它参与了文化身份的形成，翻译“可以为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抵制、创新和变动创造可能性”（Venuti 1998: 68）。Venuti 所指的文化的抵制、创新和变动是以国家和民族的身份为出发点的。在这里，身份并非个人的身份，而是国家、民族、种族、文化等集体身份在翻译中、或者通过翻译被重建或改写的问题。翻译所具有的建构身份的力量一方面可以为文化政治机构所利用，而另一方面，又常常使得文化和政治机构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翻译揭露了他们的社会权力所依靠的根基其实并不牢靠”（Venuti 1998: 97）。1960-1972 年间，魁北克政府要求所有的法律、广播电视节目、大学教育、杂志都要从英语翻译成法语。政府希望通过翻译在使用英语和法语的人们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建构一个双语的民族，重整英语同法语之间不平衡的翻译流向。魁北克政府组织的这次翻译活动的结果事与愿违，恰恰暴露了语言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加剧了已有的矛盾。于是在魁北克，翻译成了居间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in-between space），既非英语，又非法语，即是又不是这两种语言。而更具戏剧性的是，这更促使本土文化发现并利用翻译——特别是戏剧翻译——做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成为建构独立的“魁北克身份”的主要工具之一。通过在翻译中使用非标准语（即魁北克语），魁北克人试图消解异域文化的他性，改变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提高魁北克语的语言地位，从而建构魁北克本土的民族主体（参见 Brisset 2000）。魁北克戏剧翻译与 Venuti 提出的异化翻译尽管在翻译方向策略上不尽相同，但是都体现翻译活动对文化身份的建构作用。正如 Gentzler 所观察到的，翻译作为一种“双声话语”（double-voiced discourse），

一方面可以通过沟通联合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改造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改写原有的观念，挑战现存的权力等级（2008：45）。

Michael Cronin 在《翻译与身份》（*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2006）中提出，关于围绕着“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建构的身份的问题，已经在政治交流的领域中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观念（Cronin 2006: 1）。而他正是将翻译放置于现代世界关于身份讨论的语境中，特别是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当代文化研究和政治科学开始重新关注的概念入手，将其与翻译（包括理论与实践）并置讨论，探索二者共通的一些特性，如开放性、多元性、杂合性、反本质主义、在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协商、对单一场所（singular location）的超越、对差异的尊重和对个体的重视等。Cronin 关心的问题是“在工业和后工业的经济社会中出现了何种身份，以及在这种身份建构过程中，翻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Cronin 2006: 2）。

移民现象也是现代社会中集中体现身份、语言和翻译问题的场所。在这个多语的世界中，人类的迁移同时也意味着语言和文化的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移民群体在新的语言文化社会中的生存与翻译息息相关，甚至其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翻译的存在。而移民所带来的语言多样性的挑战对本土文化而言，既可能被当做是存在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而受到欢迎，又可能被当做“未知的他者”（unknown other）——或有待于积极发掘，或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另一方面，移民群体作为外来者所采取的态度也是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依据。移民群体作为语言的他者面临的新的语言情境时，想要将自己“译入”社会的主流语言（translational assimilation），还是将翻译作为坚持使用母语的一种方式（translational accommodation）——当然后者并不等于对本土国家语言的完全排斥——决定了他们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二代移民作家的出现，关于移民与翻译的话题出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在所在国出生长大的移民作家（如美籍华裔作家）用所在国语言（即英语）进行创作时，以及他们的作品被译入其母国语言（即汉语）时，如何处理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移民作家（如汤亭亭、谭恩美等）的作品常取材于母国文化，其作品本身就被视为翻译的一种形式。当这些作品译入其母国语言（即由英文译入汉语）

的时候，作品中两种文化身份的碰撞通过翻译以更明显的方式展现。翻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中的某些身份形成方式，或是其复杂的内涵。这也正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方面。

Cronin 对翻译与身份问题的探讨以宽广和宏大的视野，带入了从当代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身份研究等不同领域中的新观点，向我们展示了翻译是如何成为增强差异并促进文化间对话的强大工具的。作者一再强调翻译通过鼓励新的文化形式，能够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之中日渐“消失”的文化多样性。在这一点上 Cronin 与 Venuti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 Venuti 是在后殖民语境下讨论这一问题的，而 Cronin 关注的是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二者强调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图。必须要指出的是，在 Cronin 这里，“翻译”的概念常常是脱离了其本意而作为一种隐喻的意义而存在的，例如 Cronin 会将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的移民现象看作是一种翻译活动。对 Cronin 而言，翻译并不仅仅是以语言的语际转换为基础，而是可以泛指各种形式的迁移和转换，而这一特点使得他的探讨常常超出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很多时候是在以翻译之名在讨论其它问题。

如果说 Cronin 对翻译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探讨是以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经济全球化作为其大背景的话，Gentzler 则是以南北美洲各国为其地域范畴，结合历史背景来挖掘翻译对那里的文化身份建构所做出的贡献。作为《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1993）的续篇，Gentzler 的《翻译与身份：翻译研究新发展》（*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 2008）将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向美洲，关注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的“新定义”和“新方向”，分别考察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魁北克）的女性主义和戏剧翻译、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拉丁美洲小说中的翻译主题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边界写作与翻译等主题，而以上这些翻译研究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翻译在文化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Gentzler 在书中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在南北美洲，翻译“并非发生在各自独立的的不同文化之间，而是构成这些文化的基本元素”（Gentzler 2008: 5）。

历史背景是 Gentzler 的论述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在他看来，这些国家的殖民和移民历史、各民族语言发展史和翻译历史都为我们了解并剖析其翻译

活动的现状提供了重要信息。例如，通过历史性的论述，Gentzler 指出美国的英语单语主义的霸权所导致的翻译政策的空缺，实际上以一种掩人耳目的方式隐藏了美国文化的多语构成。美国被隐藏的翻译历史（the hidden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实际上在美国文化和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美国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这个“民族”是在翻译中诞生的。而美国目前的单语政策，只是一种虚伪的表象，其中暗藏着异质的语言和翻译过程。

事实上，也恰恰是通过翻译，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他者”找到了释放他们的多语声音的渠道。Lawrence Venuti, Carol Maier, Maria Tymoczko 和 Suzanne Jill Levine 翻译研究学者将翻译现象与边缘、移民、抵抗和身份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其中 Suzanne Jill Levine 的著作 *The Subversive Scribe: 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n Fiction* (1991) 记录了她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反思。例如，在从西班牙语译入英语一段对话中，她在译文融合了美国黑人英语、俚语、街头智慧、情景剧、曲解和模仿等元素，这种翻译策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释放美国内部被压抑的少数族裔的“他者”的多语声音。在这里，通过翻译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异域文化的“他者”，而是生存于北美内部的“他者”文化。可见所谓的“民族文化身份”也是具有欺骗性的，一致性的内部暗含着异质他者的存在，而翻译，既是掩盖这种差异的“帮凶”，也是他者发出自己声音的突破口和途径。

关注在翻译与文化身份建构的问题，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在少数和被压迫的文化种群的身份现状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南美洲各国，翻译显然不是一个中立的场所，而是不同种族和群体的权力斗争之地。胜者获得自由和权力，而败方则要承受悲惨后果，被社会边缘化、丧失身份（loss of identity），并且心理受到创伤（Gentzler 2008: 3）。在这里，翻译显示出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它既是个人的心理实践活动，也可以成为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有力工具；它可能被强权利用，成为征服、压制和殖民的工具，制造出单语文化社会的和平表象；也可以成为反抗者的利器，用以揭穿、抵制和颠覆压迫者们制造的表象，保护和重建自我的身份。当然不只是在美洲，在任何存在语言文化交流的地方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而本文的研究正是围绕着中文的翻译语境所展开的。

第二节 《沉没之鱼》的中文译写——文化身份认同与改写

翻译中个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与群体的文化身份常常是相互勾连映照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个体身份的一个基本的和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与其它文化进行交流的时候，两种文化相互参照，更加强化了个人对自我文化的归属感，这时个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就会变得尤其显著。个人在这里展现的不仅是自我主体，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

译者与作者之间身份的差异或认同影响着译者翻译的态度。身份的一致带来认同和投入，译者可能更容易会对原文或作者有较深入的理解，或产生同理心；而差异或冲突则有可能导致陌生和距离，甚至是挪用和颠覆。尤其是当译者与作者所认同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不单单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关乎到更大两个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节以《沉没之鱼》的作者谭恩美及其中文译写者蔡骏之间的文化认同差异为例，分析个体身份与文化认同在翻译中的表现以及对翻译的影响。

一、原作者与译写者之间民族文化身份的差异

作为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移民，谭恩美的作品多以反映华人移民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像许多美国华裔作家一样，她的作品为英语的读者展示了独特的东方文化。在中国，谭恩美常常被作为“美籍华裔女作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强调其中国移民后代的身份和女性身份，这一身份标签将谭恩美纳入“中华民族”这个集体身份之中，无形中增加中国读者对她的亲近感。然而，谭恩美本人则更认同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的身份。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谭恩美更认同自己“美国作家”的身份：她各种场合都曾经表示过尽管自己有着中国的血统，但她是“美国作家”。为了澄清这一点，她多次申明“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张璐诗，谭恩美 2006）。她更是对于自己常常被当作是“中国的代言人”而感到无奈和沮丧（Zhang 2007: 6）。因此可以说谭恩美是一位为美国读者写作中国故事的美国作家。而她的作品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在美国的英语世界中的翻译和重写，是她所认识理解的中国文化。在对谭恩美、汤婷婷等华裔女作家的作品内的中国元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刘宏认为，她们的作品

中展现的中国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基础上的，或者——考虑到这些华裔作家曾作为外来者造访中国——充其量是游客眼里的中国（Liu 1998: 129-130）。

《沉没之鱼》是谭恩美在创作上的一次尝试，故事不再仅仅围绕华人移民家庭展开（尽管叙述者陈璧璧的童年生活以及她与生母和继母之间的情感牵绊依然是故事的线索之一），而是以一群美国中产阶级游客组成的旅行团（其中只有一对华裔母女）在东南亚的旅游为主线，中国的云南就是他们行程的出发点。在这里，她依然延续了自己的视角——从美国人，或者说美国游客的角度观察和讲述东方。小说在中国的读者的面前呈现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而这一中国形象地呈现，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显然是有差别的。因此，本文将主要从《沉没之鱼》中与中国形象相关的内容及其中文译写入手，考察在译文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份认同和冲突。

与原作者谭恩美不同，《沉没之鱼》的译写者蔡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明确的认同感。本文第四章中的分析说明，蔡骏作为文学创作者从事翻译活动，一方面表现出对原作者的共鸣和一致；另一方面，“翻译”加“改写”的策略使得他在译文中有了比一般译者更大的自由，而他的作家身份也促使其个人的语言习惯和写作惯性以更明显的方式显现。译写者的作家身份同时显现出来的，还有他的文化身份认同。蔡骏在自己的各种简介中的第一句话常常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年轻人”。根据蔡骏的基本介绍，他也没有直接的异域的文化体验。他认定“汉语是地球上最美的语言”，并创作了不少的悬疑小说。蔡骏意识到自己与谭恩美之间民族文化身份差异，并且无法认同谭恩美的视角，他在采访中说：

但作者本人是从美国主流社会的角度出发的，她的视角与我们想象的华人作家不同。谭恩美就是一个美国作家，她的血统和家庭是中国的，但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完全是美国的（蔡骏 2007: 205）。

所谓“我们想象的华人作家”其实就是谭恩美所极力澄清的“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蔡骏显然观察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言语之中将自己与谭恩美区别开来，强调谭恩美美国作家的身份和视角。

在翻译中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文化身份差异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因为大

多数情况下原作者代表着原语文化，而译者则是来自目的语文化。然而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个案例中，原文的相当一部分是对目的语文化社会（即中国）的直接观察和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视角的不同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差异，还可能是冲突。此时，译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就变得更为关键，因为他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参与其中，使得中立的态度更为困难。如何将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往往就在于译者的选择，而许多有意识的重写与操纵就在此时发生。将谭恩美的作品介绍给中文读者的时候，译写者是以何种心态来看待这个来自异域的自我形象？又是以何种方式翻译并改写这样的自我形象，将其呈现在中国的读者面前呢？他的文化身份是如何作用其中的？借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群体身份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分析个体的群体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行为，以及群体间关系是如何通过个人表现出来的。这正是本文在这一部分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化身份的翻译与改写

本文在第一章中曾简要介绍了社会身份理论（包括自我分类理论）的基本思想。社会身份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它从个人的群体身份认同出发，研究群际关系以及群际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将有助于分析作者和译者在原文和译文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和改写的问题。本节将首先对《沉没之鱼》的原文中所呈现的美国民族文化身份——尤其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在译文中被改写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然后尝试以社会身份理论的相关假设来解释这一翻译现象，并试图从中发现规律。

1. 提升原作中的中国形象

《沉没之鱼》讲的是一群美国游客到中国和缅甸（译文中的兰那王国）的经历，旅游的过程中文化冲突和交流障碍不断出现，叙述者以美国人的视角审视着中国和缅甸这两个国家的人们生活、经济、政治、民主、人权的状况。小说中塑造了典型的美国视角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形象，而在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中文译本中，这些内容——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部分——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变。

首先，原文中对与中国相关的负面评价，在译文中都被不同程度的删减更改。

其中较为明显的包括旅游点洗手间内不堪入目的卫生条件（如 Tan 2006: 70），酒店提供的性服务（同上：60-61），边境地区毒品买卖和艾滋传播情况，以及中国工人的待遇和人权状况（同上：48）等。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译文中相当一部分的改写非常细致，可以说已经到了过于敏感的地步，许多内容其实在中文出版物中并不会被列入审查的范围。例如这一句对云南某旅游景点洗手间的描写：

.....with an open trough through which a constant *paltry* stream of water constantly ran, *failing, however, to wash away the deposits*..... The other women crouched and buried their faces in their sleeves, *trying not to retch*.
 (Tan 2006: 80) (.....里边有个沟槽，有极少量的水流不断冲洗，却无法冲走其中的污秽。.....其他女人用袖子蒙住脸蹲下，极力忍住要干呕的感觉。笔者译)³⁷

而在中文版本中，同样的一句话虽然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却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意思：

.....里边有个小槽，有不间断的水流冲洗。.....其他人蹲在那用袖子蒙住脸。（蔡骏 2006: 56）

原文中斜体的部分在译文中被删减，其他保留的部分并没有改动。可以看到这些删减并非是整句的删减，而是小心翼翼地过滤了其中的某些词句，从而使原文中一个令人侧目的厕所在译文中变得无甚特别，甚至还显得颇为洁净（“有不间断的水流冲洗”）。

如蔡骏所言，译文的有些改写和删减是按照出版社要求必须要做的，尤其是政治敏感的内容更是如此。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和审查等因素常常是引起翻译研究者较大兴趣的话题，但笔者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它影响翻译改写的因素。因意识形态而遭到审查的内容在这篇作品的改写中是非常明显的（涉及缅甸的人权问题等），而在上例这样无关政治，甚至算不上敏感的细节描

³⁷ 如未特别说明，本章所引用的英文原文后的中文译文皆为笔者译。

写已超出了审查制度的雷达范围。因此可以说这并非是来自意识形态暗中操控，或是出版审查制度的外部限制，而是出于某种细微的心理因素，是译者自主的选择。在小说中文版本中，这种敏感细致地过滤与中国相关的负面描述的情况处处可见，本文仅取一例以作说明。

有的时候甚至并非是非面的中国形象，而仅仅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内容都有可能被改写。例如原文谈到云南当地居民由于血统混杂而造成多样化的外貌特征：

The majority of the inhabitants were the result of centuries of bedtime mergers among Han Chinese, a dozen Yunan tribes, and over the ages, *British opportunist, European explorers, passing nomads, and fleeing Jews*. The populace was an unplanned and lovely mix, no two ever the same, just like art. (Tan 2006: 65)

如原文所描述的，这些混杂的血统中，除了汉族和十几个云南当地的部落之外，还有长达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加入的英国机会主义者、欧洲探险家、途经此地的游牧部落和逃难的犹太人。原文中对此现象的描述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贬义，认为这意外地造成了当地居民外貌上可爱的组合，人人不同，就像艺术品一样。有趣的是，在中文版本在众多混杂的血统中偏偏略去了“英国机会主义者、欧洲探险家、逃难的犹太人”这三个“外来者”的成分：

当地居民大多血统混杂，汉族和几十个云南少数民族，南下的游牧民族统统杂居于此，不经意间都成了混血儿，没有哪两个人长的一样，仿佛人人都是艺术品。（蔡骏 2006：46）

云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历史上各种民族的混杂是不争的事实。译写者并未完全否认这一事实，遭到删除的是只是英国、欧洲和犹太人的成分，显然这些内容是译者所不愿接受的。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国家、文化意义上而言的共同体，而并非从人种学或血统学所做出的区分，从血统上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统一的“中华民族”。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血浓于水的民族主义血统观十分顽强，“非我族类”的观念也颇为根深蒂固。尽管现代中国“汉”民族的观念逐渐淡化，

而代之以“中华民族”，将少数民族也囊括在内，但如果称“中华民族”也参杂了“英国、欧洲和犹太人”这样外来者的血统，显然是不会受到欢迎的说法。此时，译者的过滤功能发挥了作用，不允许那些影响中国人自我观念的内容出现在译文当中。

事实上，译文中的改动显然与信息真实与否无关，而是关系到文本中展现的“中华民族”的形象，关系到中国人的“自尊”问题。上例中关于中国旅游景点卫生问题的描写也是与“自尊”和“面子”相关的。译文中除了表现出消除与中国相关的负面评价和描述的倾向，在有些时候还表现出提升中国形象的努力。例如，白人男性柏哈利在追求旅行团中唯一的一位华裔女性朱玛琳的时候弄巧成拙引起火灾，他慌乱中把朱玛琳昂贵的礼服用来灭火，结果惹怒了这位女士：

She had stared at him with an implacable Asian face, unreadable, unreachable, unadaptable, like a cat's. (Tan 2006: 247) (她瞪着他，那副亚洲人的面孔带着难以平息的怒气，不可捉摸、无法接近、顽固不化，像猫的面孔一样。)

在这段原文中对朱玛琳的表情描写表现出柏哈利与她之间的距离感，作者用一连串否定意义的形容词(implacable, unreadable, unreachable unadaptable)表达了这位白人男性对朱玛琳怒气的的不解，这种无法理解一方面是出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思维差异(在此之前，柏哈利还幻想着朱玛琳会像小女生那样取笑他的糗事)，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种族的差异。尽管柏哈利为她的女性特质所吸引，但这种吸引并非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朱玛琳对他而言是“神秘的”，就像是“谜语”，而她时常表现出的冷淡和缄默让柏哈利对追求的过程更加兴致盎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冲突发生时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陌生感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在译文中，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所带来的距离被带有民族国家意味的对立情绪所取代：

她死死地盯着他，一副毫不妥协的中国式面孔！（蔡骏 2006：158）

白人男性对华裔女性“不可捉摸、无法接近和顽固不化”的感觉，变成了“毫不妥协”的赞叹，而从“亚洲人”到“中国式”面孔的改变凸显了其中的国家身份。原本

与“妥协”毫无关联的、恋人之间由于性别与种族差异而带来的距离感被代之以对中国人坚定性格的褒扬，影响了意义的流畅（故事情节中并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内容）。

2. 削减原作中的美国认同

身份的建立经常是在自我与他者的比照中进行的。谭恩美的小说一方面塑造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小说人物的眼和口，表达出她对自己所属的美国身份认知，而这种认知常常带有正面和积极的价值。《沉没之鱼》的叙述者陈璧璧的童年是在中国上海度过的，她的母亲死于难产，因而在刻薄的继母身边长大。所以当她们全家准备离开上海，而继母并没有跟着她们一起登船的时候，陈璧璧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她憧憬着大洋彼岸的美好生活和没有继母在身边的快乐：

I imagined what bright life awaited us in a new land just over the horizon. We were going to America, where joy was so abundant you did not have to consider it luck. (Tan 2006: 28) （我想象着地平线那边的新大陆上等待着我们的光明生活。我们就要去美国了，那里充满了无尽的喜悦，你不必将快乐当做是运气好才有的事情。）

对这个小女孩来说，美国是充满无尽喜悦的地方，是代表了幸福新生活的一片土地。而恰恰是这句对美国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在中国曾有的不幸童年的暗示，在小说中文版中变成了对故乡上海的回望眷恋和不舍，那片充满快乐的新大陆也变成了“那个神秘遥远的地方”，关于快乐的美好向往则被隐去：

我想象着未来的崭新生活，我们要去大海另一端的美国了，那个遥远神秘的地方。我人生的大部分光阴将在那片大陆度过。（蔡骏 2006：24）

显然，译写者在这里不但加入叙述者陈璧璧对中国故土的依依不舍，而且还弱化了原文中把美国作为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地方的呈现方式。此外，小说中还有另外一处对美国价值的直接评论。小说中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名叫沃特（Walter）的缅甸导游。沃特的英文非常地道，一位游客恭维他比自己还

要“更美国”（more American）。沃特答道：

Oh, but being American has less to do with one'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nd more with the assumptions you hold dear and true—your inalienable rights, your pursuit of happiness. I, sad to say, don't possess those assumptions. I cannot undertake the pursuit. (Tan 2006: 161) (哦，但作为美国人与英语水平的关系不大，作为美国人更多的是意味着你们珍视并拥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你们对幸福的追求。而我，不幸的是，并不拥有这些权利。我不能追求幸福。)

这段引文中的斜体部分，在译文中被删除。谭恩美在采访中表示，她想通过这篇小说来探讨“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他人的苦难”这样一个主题（张英等 2007）。可以说，谭恩美借沃特这个小说虚构人物之口表达了她作为美国人的自我群体（in-group）优越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积极的评价并非出自小说中的任何美国人之口，而是一个被美国人看作是深陷苦难之中的缅甸人以羡慕的口吻说出，是谭恩美虚构的他者。同样作为他者的译写者蔡骏，显然并不认同美国人这样的自我评价，以直接删除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尽管这部分的删除并不与中国形象直接相关，但译写者依然拒绝把作者的美国身份传达到目的语文化当中。这再次反映出译者与作者之间文化身份的差异对译文带来的影响。如果让一位认同美国文化身份的译者来翻译同样一篇小说，一般情况下应当不会出现这样系统地削减中国的负面内容和美国的积极评价的倾向性。

社会认同理论一直强调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行为不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和自尊这一基本需要决定的。为此，个体为了满足自尊或自我激励的需要会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自己在群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外群体成员更为出色，这就是所谓积极区分原则。从上述小说的引文中不难看到这一原则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谭恩美将自己的美国身份与中国和缅甸进行了积极的价值区分，肯定并赞扬美国的价值观，并且以同情的眼光描述和看待被消极区分的当地居民。她积极并成功地进行群体间的区分可以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认同，并相应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自尊，谭恩美的小说在美国的畅销就说明她所叙述的中国形象迎合了美国读者的口味。但这种区分的结果显然并非都是积极的：而在内群体成员获得高自尊的同时，外群体成员势必面临降低自

尊或自尊受到威胁的处境。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将谭恩美的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努力中。如果中国读者没有接触到她的作品，文化偏见也就只是美国这个群体内部的自我激励，而当小说被移入中文语境，面对中国读者——相对于美国的外群体——时，后者的自尊就受到了威胁。群体间的偏见、敌意和冲突自然相伴而生。其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作为赞助人的出版社的直接干预下大多数都会遭遇直接的删改。而作为负责将其译入中文并呈现给中国读者的译者，就面临着如何处理更为细微的文化偏见的问题。是如实传达，从而面临激化矛盾的危险；还是消解差异，调和矛盾；抑或是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暗中操控，对原文中的积极区分进行反拨。这种情况之下，翻译策略的选取显然与译者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基本上译者的群体认同决定了他的立场与态度。蔡骏作为外群体的成员，他在译文中的改写呈现出削减对自我群体的消极评价、否认对方群体的积极价值的倾向，表现出对文化偏见的反拨。³⁸

3. 在译文中添加中国传统文化成份

在《沉没之鱼》的中文版本中，不但表现出提升中国形象的努力，而且，译写者还利用各种手段对小说进行本地化的处理，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译文中添加中国文化的成分。例如，我们在上例中讨论到童年的陈璧璧一家离开上海出发去美国的时候，中文译本如何弱化了小女孩对美国美好新生活的向往，除此之外，译文中还多出了一份对上海故土的留恋：

我回头看着十六铺码头，还有外滩那些欧洲式大厦。我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像个童话，隐藏在暮春的夕阳之中，忽隐忽现永远难以看清全貌。这将成为我生命中永难忘记的一个梦。

……

再见，上海。

再见，我的故乡。（蔡骏 2006：23—24）

表面上看，这段话是叙述者抒发自己对故乡的回忆和不舍之情，而实际上，这种情感其实并非来自于原作者谭恩美，抑或是她作品中的人物——陈璧璧，而

³⁸ 在社会身份理论中“偏见”一词的使用并非带有价值判断之意味，而是对群际关系中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歧视（in-group favoritism and out-group discrimination）的这一普遍现象的客观描述。笔者亦会尽量避免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带入研究过程。

是译写者蔡骏在所添加的。蔡骏在多次采访以及他的自我简介中提及他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自称“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年轻人”。他在译文的序言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将其与陈璧壁在上海度过的童年相关联，特别介绍了陈璧壁一家所居住的“马斯南路”的现状，而且强调自己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几年。这种关联更让他觉得“命中注定与本书有缘”（蔡骏 2006: vii）。他把自己对上海的感情投射到译文当中，把陈璧壁离开继母开始新生活的喜悦替换为一个去国离乡的华裔对自己祖国的眷恋之情。

如果说这一段的添加可能与译写者自身对上海感情相关，那么，当译文中再次提到上海这个城市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故土情结就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十二名美国游客乘飞机前往中国云南开始他们的行程，已经变成幽灵的陈璧壁也跟随着他们。原文中对他们的飞行过程一笔带过：“经过将近两天的旅行和两次中转，我们抵达了‘彩云之南’的中国丽江”（Tan 2006: 41；笔者译）。然而在小说的中文译本中，读者会读到这样几段话：

当我随着我的朋友们，一同搭上自旧金山飞往中国的航班时，心中忽然有种莫名的激动——我将又一次返回我的祖国，那大好山河依旧，只是物是人非，究竟还有几人能记得我呢？

.....

十几个小时过去，我们来到了中国，上海。

这是我出生以及度过童年时代的城市，我永远难以忘记这里的一切，就连空气都是芬芳的，这是故乡的气味。

可惜我已成为幽灵。（蔡骏 2006: 33—34）

译写者在这里插入了一段游客们在上海转机的过程，实际上这段添加的行程于故事的情节发展没有任何的改变和推动的意义，仅仅是让陈璧壁有了一次对重返中国感慨万千的“机会”。在这里中文读者看到了诸如“我的祖国”、“大好山河”、“故乡的气味”等用来赞美祖国、怀念家乡的陈词滥调。同样，这绝不是陈璧壁，亦或是谭恩美的心声，也不单单是译写者个人身份认同的表现，还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集体身份。

原文中几乎没有提及的“故乡”一词到了译文中却一再出现。中文版的陈璧壁沉浸在对中国上海的眷恋之中。导致这种改写的原因除了译写者本人对中国上海的强烈的认同和情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来自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乡愁情节。

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曾经指出，“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1977：89）。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显然缺少流浪癖（wanderlust）（同上），而乡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有的主题。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思乡不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主题，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乡情怀仍然国民性、民族情感思维的重要内容，并且具有多种感兴寄寓文本表现功能（王立 2003：58）。在《沉没之鱼》的中译文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思乡情结被加之于陈璧璧。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和情感常理，身为中国人的陈璧璧重返祖国的时候，怎能不感慨万千？蔡骏通过改写把中国的文化身份添加到译文当中，使叙述者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既反映了他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迎合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原作者的美国身份认同和作为中国的“外来者”（outsider）的身份在译文中被改写，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将其认作为自我群体的一员。

此外，中国文化身份的添加还表现在译文中与中国古诗词的互文关联的加强。在兰那王国（缅甸），游客们来到清晨的湖边欣赏美景时，叙述者引述了一段中国“著名”的湖边美景感言：

There is a famous Chinese sentiment about finding the outer edges of beauty. My father once recited it to me: “Go to the edges of the lake and watch the mist rise. (Tan 2006: 228) (中国有一句关于美丽湖畔的著名诗词。爸爸曾经给我吟诵过：“去到那湖畔，观赏雾气升起。”) ”

原文中虽然交待了这是来自中国的著名诗词或俗语(a famous Chinese sentiment)。然而，仅凭原文中这一句没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英文，确实很难找到作者想要引用的原文究竟是哪一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是谭恩美的杜撰）。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句译入中文，很可能让中文读者感到疑惑：如果说是“著名的”，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呢？原作者想要制造的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文本互涉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英文读者而言也许是成立的，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则可能产生问题。译写者可能是考虑到了这一问题，在译文中采取了替换的策略，以一首完整的古诗代替了原文中那段来源不明的引文：

中国人对于边缘有古老的审美，我父亲曾向我背诵过一首李白的诗

湖与元气通，
风波浩难止。
天外贾客归，
云间片帆起。
龟游莲叶上，
鸟宿芦花里。
少女棹归舟，
歌声逐流水。（蔡骏 2006: 143-144）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诗，实为李赤仿李白所做《姑熟十咏》其中的一首（《全唐诗》卷 472-11，《姑熟杂咏·丹阳湖》），一些文献中也将其列为李白的诗作³⁹。译者或者是未经考证，亦或者是有意为之，引述一段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诗人李白的诗作，无疑会给中文读者带来熟悉和亲近感，而不会是不知所云的疑惑。原文中并不见有何特色的一句引文，在译文中变成了著名诗人李白的诗作。尽管诗的内容并不是专门描写“湖雾”的，但也并不妨碍它在译文中起到的描摹景物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从一句话变成了整首古诗的加入，使译文的中国文化的气息更加浓厚。

译文中还出现了另外一处与古诗相关的改写，却多了一些戏仿的意味。小说的叙述者陈璧璧死后变做幽灵，从旁观参观了为自己举办的葬礼。当灵车开出停车场，后面跟随着一群学生组成的乐队和一些参与送葬的人。由于追悼会是在博物馆举行，因此还有一些并不相关的游客意外地混在其中，场面显得颇为混乱滑稽：

原文：

In a short while, the mourners, as well as a dozen or so tourists on rented Rollerblades and a few dozen more who had been expelled from the gates of the Japanese Tea Garden, gathered behind the band, following the busy hand signals of the museum staff. The flutes trilled, the cymbals tinkled, the drums rumbled, and a flock of fat pigeons flew up with a windy flapping of wings, and that was how we began our walk to pay tribute to “a great lady lost.” (Tan 2006: 33)（不久，送葬的人们，还有十来个穿着租来的旱冰鞋的游客、十来个从日本茶园中被赶出来的人，跟随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忙乱的手势，都聚集在乐队的后面了。长笛、铜钹、各种鼓乐，一路

³⁹ 苏轼《东坡志林》卷二载：“过姑熟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

上吹吹打打，还有一群肥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就是这样，我们开始了向“一位伟大的女性”致敬的送葬之行。）

译文：

乐队后的各色人等越来越多，*就像中国唐代的一篇美文：笛子与鼓声齐鸣，信鸽与白云共飞*。人们就这样悼念“一位伟大女性的去世”。（蔡骏 2005：27）

较为自由的改写在这里再次出现。但与上例不同的是，这段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对中国诗词或是其他文本的引用，而出现在译文中的所谓“中国唐代的一篇美文”，也是译写者的戏仿之作，并非真正出自唐代任何人的手笔。译文对原文进行了较为自由的改写：以“各色人等”概述了原文中意外出现在送葬队伍里不同的人群，还根据原作场景中出现的物（如乐器和鸽子）杜撰了一句“唐诗”。中国读者可能会看出这并非真正的“唐代美文”，可能还会联想到句式颇为相似的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一来，译文中建立起与中国古诗的戏仿互文，这是原文中所没有的。通过建立互文关系的方式，小说与中国文化背景关联起来，强化了译文的中国文化元素，再次拉近了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距离。

当然，译文除了上述两例中较为明显地对强化或是重新建立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关联，其他采用归化译法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将华裔女性朱玛琳对柏哈利的沉默寡言和冷淡的态度译为“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蔡骏 2006：157）。诸如此类的归化译法可以说是常用的归化翻译，也许并不能特别说明问题。但上文所举实例中乡愁情结的加入和中国古诗词的互文建构，显然已经超出了蔡骏所声称的是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的目的，或是效果。译写者不单是改写了原作中所展现的中国形象，还在译文中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因素，将中国的文化身份加之于原作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原作者谭恩美的文化身份。

三、分析

在翻译活动中，参与交流的各方从微观的层面讲是代表自我的个体，从宏观的层面讲是民族、国家和文化群体。翻译研究中经常讨论的文化身份其实就是集体身份的一种。我们这里所讲的集体身份，英文为 *collective identity* 与前文

提到的个体的群体身份认同(group identity)是不同的。前者是宏观层面的身份,是指群体成员共享的自我意识,而后者个体层面,指个人基于对所属集体的认同而形成的个人的自我概念。显然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Joseph 在讨论二者关系时指出,集体身份不可能脱离构成该集体的个体成员而独立存在;我们常常能在某个单独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身上找到其“具体的”体现(Joseph 2004: 5)。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能够以一种令人信服的个体形式体现集体的身份;我们也可以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领导者或明星都可能承担同样的作用,以较为单纯的形式体现集体身份中某些集体普遍具有或渴望具有的特质(同上)。

人们的自我概念会不断地延伸到他们作为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正如 Cooley 所言,“群体或‘我们’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个人与一个群体认同,并且用‘we’(主体的我们)和‘us’(客体的我们)去表达群体共同的愿望、意见、利益或其它的方面”(Cooley 1983: 209)。而这种对群体共同利益的强烈认同,甚至会达到为群体而自愿牺牲个人的地步。Mead 也指出,人们会以把群体的集体身份体现在自我概念中的方式来增加和扩大自我概念(Mead 1934: 201-207)。也就是说,群体的身份成为个人自我概念的延伸。也正是因此,每个人都倾向于保护他/她所做出的自我认同,甚至是主动地提高及保护自己的身份。

在翻译活动,特别是文学翻译中,两个文化集体进行着相互交流和沟通,译者与作者常常成为各自所属的文化群体的代表,在文化接触的边界地带扮演着重要角色。译者的文化身份在与他者文化的接触中被激活,而处于显著的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翻译当中就是译者会留意到与自我文化身份相关的内容,进行选择时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与提升自我的文化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行为不仅是作为行动主体而实施的社会行为,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或者说体现了其所认同的文化群体的群体行为。翻译活动亦成为群际关系的表现场地。

英文写作的华裔文学作品中常常涉及到中国身份在英语世界的再现的问题。作者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之间寻求自我身份的努力也会在文本中体现出来。正如卫景宜所言,“中国文化是美国华裔作家标榜族裔特性的一块特有的文化想象空间”(2001: 2)。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之一。华裔文学的特点之一在于作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接重合的边缘地带，挣扎于文化认同的两难空间。其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书写既不同于中国本土作家，也不完全等同于异域作家的描绘。这种现象在以谭恩美、汤婷婷和任碧莲等作家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移民作家中尤为明显。不同于美国白人文学中对中国/华人的刻画，华裔作家的作品以族裔“局内人”的眼光呈现中国/华人（詹乔 2007：131）。然而，正如上文对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分析，这个“局内人”的身份却是具有欺骗性的。事实上，华裔作家对中国作为一个文化集合体的疏离在她们的作品中留下了踪迹。她们一方面在作品和各种采访中不断表达她们摆脱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美国文化身份的努力；另一方面又不断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疏离与认同、批判与继承的矛盾构成了华裔作家尴尬的“文化僵局”（杨洁 2008：43）。当这样一种充满了文化杂合与冲突的作品回归其主要素材的来源之地——中国的时候，本土的文化群体（包括译者、读者等）就要面对作品中被杂合了的、变形的自我群像。如果被扭曲了的自我形象是他们认为本应是“局内人”（自己人）的华裔作家所带来的，就有可能更加激化其中的矛盾冲突。

本章立足于翻译研究，以谭恩美的《沉没之鱼》在中文语境下的译写为例，所关注的问题是反映华裔作家文化认同的英文作品被译入中文时遭遇的改写，以及改写背后潜在的文化的认同机制。社会身份理论在群体认同影响下的个人行为 and 群体关系方面有着深入的讨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分析和解释某些与群体认同相关的翻译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依据。群体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心理因素来解释，要全面地理解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Ng *et al.* 2004）。其基本思想是，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即人们总是自觉地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并给予评价，个体会在评价的基础上来确定自我的身份，最终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个体的言行总趋于与内群体成员的特征相一致，以此来区分自己的身份与外群体成员身份的不同（吴小勇等 2008：1）。在身份差异的基础上产生了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in-group favourism and out-group discrimination）；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身份来提高自尊。Tajfel 在社会身份论中提出了一个对社会认同研究影响深远的假设：人们建立社会身份，是为了透过所认同的

社群提高自尊 (Tajfel 1982; Tajfel and Turner 1986: 7-14)。从这一假设可以推演出群体认同的一些基本原理, 这些原理也都在各种实证性研究中得到验证。首先, 社会认同与社会比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们会评价和比较各社群的优劣、社会地位和声誉, 争取把自己编入较优越的社群, 并觉得自己拥有该社群一般成员具有的良好特征。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女性作家, 如王安忆、谭恩美等人, 都更愿意自己被称为“作家”而非“女性作家”, 并强调自己作为作家与男作家之间并无差别, 以此来弱化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意识到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 相对于“女性”群体, “作家”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而传统观念中的“女性”特质并不利于她们“作家”身份的建立。通过弱化“女性”身份, 强调“作家”身份, 这些女性作家试图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尊。同样, 谭恩美对自己的“华裔女作家”身份的否认和对“美国作家”的强调, 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动机, 尽管并不一定是自觉和有意识的。

其次, 当人们认同的社会身份受到攻击或威胁时, 人们会在思维或行动上捍卫该社群的声誉; 他们或在思想上肯定该群体成员共有的特征和价值, 或以具体行动还击。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沉没之鱼》的译写中体现了以译写者蔡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群体对小说中自我群体身份的消极区分进行了反击。通过提升译文中的中国形象, 《沉没之鱼》的中文版本体现了中国文化群体捍卫群体声誉的努力; 通过削减原文中对美国身份的积极建设, 译文对所受威胁进行积极反击; 而通过添加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 译文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

《沉没之鱼》的中译与一般翻译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不仅把异质因素带入目的语文化系统, 还带来了他者眼中的目的语文化形象。当看到他者眼中的自我与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冲突的时候,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文版本是被净化了的, 符合、或者说是迎合了本民族对自我身份的想象。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个案例当中, 译写者蔡骏与目的语读者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 出于这一共同身份, 他可以判断译文读者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并不乐见自己的负面形象, 尤其是这些负面的言论是来自异域的他者。对集体身份的强烈认同导致目的语文化系统否认原文中反映出的自我形象。译者在译文读者和原作之间进行过滤, 保护甚至强化目的语文化系统的自我形象认识。退一步来讲, 即便这些改写是由出

出版社或代表出版社的编辑而非译者本人来完成的，他们依然代表着“我们”这个目的与文化集体的自我认识相一致的群体，本节的论点依然成立。这成为目的语文化系统的一种共谋机制，抵制对自己不利的话语进入。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蔡骏如果对原文里面中国负面形象的描写照原样传达给中国读者，又会如何呢？Berman 在讨论译者的两难境地时指出，如果译者（假设他是属于目的语文化的一员）认为作者、作品和异族语是独一无二的精品，打算把它们最纯正的异族形式强加到他自己的文化王国，他就要冒着看起来像是异族者的风险，被同胞视为“叛逆者”（Berman 1992: 3）。翻译要求译者要身处两种文化间的居间地带，进行调解和协商，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蔡骏的选择即显示出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也避免了被中国读者视为叛逆者的可能。

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与认同的问题。尽管理论上译者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居中空间（in-between space），在文化交流中扮演文化协商和斡旋的角色。但也并非所有译者都能成功抑制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本能反应。正是因为如此，孙艺风提出有意识的文化离散经验会有助于译者更好的完成跨文化交际的任务（孙艺风 2006: 9）。这样，译者才可能（至少是部分地）超越原有的自我身份的界限，更多地理解源语和译语文化。

结 语

身份概念周围集合了大量而庞杂的理论话语，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尽管本文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范围内汲取关于身份的理论话语，所面对的依然是散乱而缺乏系统性的关于身份的种种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更何况翻译研究领域中目前关于身份的探讨尚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大家似乎都在谈论身份，大家谈论的身份又都各不相同。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译者身份分析模式无疑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无序的状态中，笔者在摸索中前进，逐步探索出一个围绕着译者身份而展开的理论网络。这一网络虽不免疏漏，尚存补充和改进的空间，但也不失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入手探索译者身份的开创性努力。

正如本研究所展示的，关于译者身份的研究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文的五章与其说是逐层深入节节推进的一种研究路径，倒不如说是围绕译者身份展开的一个网状结构。这一结构围绕着翻译活动展开，以译者身份为脉络，连接了翻译活动中与身份相关的许多重要话题，贯穿本文始终的，是笔者对翻译活动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及二者之间的互动的关注，其核心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如何通过译者的个体身份认同而影响翻译结果，以及——如第四五章所显示的——译者个体又如何通过翻译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贯穿始终的理论关怀，即探讨翻译活动中个体（主要是译者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在对社会心理学领域内身份相关理论的范畴进行概览，探查其可能用于翻译研究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后，笔者认为借鉴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相关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需要对其中身份研究的不同流派进行整合和改造，充分利用原有的理论资源。因为单独借鉴其中的某一个流派都有可能导致对译者身份某方面关键概念的缺失，而不能建构一个全面的认识。利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角色身份理论和群体身份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和互补差异，根据身份建立的不同基础，笔者初步厘定了适用于译者身份研究的三种身份类型，即角色身份、群体身份和个人身份。角色和群体分别代表了个体在社会中获取身份的两种主要方式，而个人身份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在明确三种身份类型的基础上，本文

亦强调三种身份之间的交叉关联，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僵化的区隔将有悖于笔者对原有理论流派整合改造的初衷。在上述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笔者就译者身份本体和译者的其它身份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在于廓清了“译者身份”这一关键词的含混性。因为“译者”也是个体的身份之一，“译者身份”究竟是个体作为译者的身份，还是个体在作为译者的同时还具有的其它身份，不同的理解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

从基础的理论探讨出发，笔者在随后各章中开始对译者的不同身份进行较为具体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讨。第二章围绕译者角色身份展开，讨论译者的角色身份的具体内涵与实施过程，把重点放在译者角色在翻译过程中与其他各种翻译角色之间的互动对话关系，提出了翻译对话主要是通过译者的角色扮演和内在对话来完成的；此外，通过对译者注释的分析，发掘翻译内部对话的多重性特征，从而以“内部论坛”代替“内部对话”来概括翻译对话的具体状况。而互联网翻译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形式，同时体现了翻译的内部和外部论坛这两个层面同时进行且相互作用的对话互动。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作为译者的主身份之一的性别身份与翻译之间的相互影响。尽管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吸引了大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但应用身份理论中关于身份选择的理论框架和术语来探讨女性主义译者身份选择过程的尚属首次。同时具有女性主义者和译者这两个身份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在翻译活动中可能产生冲突，此时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选择和激活最终取决于身份显著性的高低，而外部情境、对应角色的互动以及选择可能造成的得失等都是影响译者身份选择的相关因素。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更普遍的情况则是译者多重身份有优先次序的共存状态。联系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本文第三章从身份表演的角度出发，对 D. H. Lawrence 的中篇小说《狐》的三个中译本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无论是对原文中性别特征的表演过度还是表演不足，不但与译者的性别认同无本质关联，而且对其出发点和实际的阅读效果的考察更应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

写作所带来的自我创造性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作家所表现出的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个人身份在翻译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样是翻译自己的作品，不同的作家所采取的策略千差万别：其中一些会对原文进行相对

自由的改写，将自己的作者权威带入译文之中；而另一些则成为自己作品的忠实译者，在译文中拒绝任何删减改写。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定位是造成上述差别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讨论了谭恩美的小说《沉没之鱼》在中国的译写项目中，悬疑小说作家蔡骏担任的关键角色，他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宣称自己对原作的深刻认同和他在翻译时的投入，另一方面在译写中又显露出自己作为悬疑小说作家的创作习惯。此外，文本分析也发现，翻译中身份问题常常并非单一的体现，而是多重身份的叠加，比如蔡骏与谭恩美性别视角的差异在译文中同样会显现出来。

文化集体身份的建构与改写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活动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或是被用来提高和推广自我文化身份——如中国政府对中文经典外译工作的重视；或是在译入文本中操控和改写异域文化在本土的再现——如清政府对英国外交信件的改译，这样的例子在翻译史中屡见不鲜。在存在多语族群的社会中，翻译既是他们身份被隐藏的原因，也是他们突破单语霸权、维护和重新建构自我身份的途径。此外，移民团体在移入国和母国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中，亦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本文第五章针对《沉没之鱼》这一部华裔作家用英文创作的小说的中文译文内的文化集体身份的改变进行了探讨，目的在于检视译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对译文中集体身份再现的影响。蔡骏的译写中对中国形象进行了积极的建构，不但从各个角度提升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削减美国认同，而且还添加了中国传统文化成分，这印证了关于身份理论中关于个体通过积极区分来维护甚至提高自己所认同的集体身份的假设。

本文研究围绕着译者个体的身份认同展开，从各个角度探讨了社会结构如何通过译者的心理认同而影响其翻译行为。研究证明，社会结构对翻译行为的影响除了通过外在的途径如审查制度或客户要求等之外，还可能通过诸如角色期待、内在对话、群体认同等译者的心理机制来完成。此外，本研究还运用大量案例分析来支撑相应的理论假设，不但丰富和补充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其本身作为翻译实证性研究的价值也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贡献之一。

从宏观的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理论的借鉴来分析和解释翻译研究中的身份相关问题。社会心理学的身份理论是贯穿全文的基础。这一借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翻译研究领域内译者身份概

念含混不清的问题，为译者身份研究开拓了一定的分类范畴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空间。此外，跨学科的理论借鉴和应用一方面为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推动原有理论充实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据笔者了解，社会心理学中的角色身份与群体身份研究尚未涉及与翻译活动相关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性研究，因此本文中的借鉴和应用本身就是对身份理论的贡献。更何况，在借鉴和应用的过程中本文亦不断尝试对原有理论的调适，所采取的整合角色身份理论与群体身份理论的方法不但符合而且推进了身份理论自身的发展进程。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多种身份优先次序的共存、多重互动对话以及身份表演等问题都构成了对原有理论的丰富和补充。翻译的社会实践所特有的跨文化特性也为研究群体身份和群体间关系提供了极佳的研究素材。

进行跨学科翻译研究常常面临的一个局限是研究者对所借鉴理论的全面掌握的缺乏，这也是本研究无法避免的局限。笔者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也是从博士论文研究之初才开始接触与了解社会心理学与身份理论，尽管在过去几年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尽力拓展与深化自身在这方面的知识，但仍不敢妄言对身份理论的全面了解甚或掌握；并且由于篇幅所限，文中亦无法对社会心理学身份理论的某些观点展开论述。然而，考虑到本研究的立足点在于翻译，身份理论当为翻译研究所用，而非反之。在理论借鉴的过程中也有必要注意避免在对原有理论进行解读时偏离本研究的既定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在身份与翻译这一主题之下衍生的研究话题相当广泛。本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译者的身份之上，并以此为出发点尝试对译者身份进行定义和范畴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研究否认翻译研究范围内其它的身份定义和研究途径的存在和研究的价值。如在翻译的跨文化交流中集体的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以及群体间关系的问题只是在本文第五章略有涉及，事实上翻译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颇有成果，此外，翻译研究中还涉及到的诸如学科身份、翻译活动的身份界限、口译者的角色等等，都属于翻译研究范围内的身份问题，其中的“身份”一词所指各有不同，虽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但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发展前景。

同样，本研究中虽不断强调译者的其他身份对译文生产的重要影响作用，但并不会简单地认为身份是在所有翻译活动中都相关的或者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译者的种种其它身份在翻译活动中的影响也可以用“激活”的概念来解释。只有当译者的某一身份被激活的情况下，这一身份才会左右或影响译者的选择。而在未被激活的情况下，译者所具有何种身份，与其翻译行为或者相关的翻译研究并不直接相关。

以译者身份作为研究的题目确实不免过于宏大而未能穷尽译者与翻译相关的所有身份。在译者身份三个类型之中，本研究只是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身份或相关话题进行探讨，在译者的社会角色、群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的领域内都仍存在巨大的研究发展的空间。此外，限于篇幅，有很多有趣的案例亦未能完全展开。互联网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另如《沉没之鱼》的译写在本文中也只是选取了与身份相关的方面，其它方面如意识形态和政治审查等都是这个案例中值得探讨的方面。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可以说是笔者在本研究接近尾声时所带的遗憾，但也构成了今后研究的起点。

征引及参考书目

英文作品

- Bassnett, Susan.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ase for Doctoral Research." *Rimbaud's Rainbow: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d. Peter Bush and Kirsten Malmkjæ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105-118.
-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Pinter, 1990.
- Bassnett, Susan and Peter Bush ed. *The Translator as Writer*.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 Berman, Anto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al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 S. Heyvaer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Brisset, Annie. "The Search for a Native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43 - 375.
- Burke, Peter J. "Identities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2003 Cooley-Mead Award Addres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7.1(2004): 5-15.
- . "Introduction." *Advances in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Ed. Peter J. Bruk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
- . "The Self: Measurement Implications from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3(1980): 18-29.
- Burke, Peter J., Timothy J. Owens, Richard T. Serpe and Peggy A Thoits. ed. *Advances in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
- Buzelin, H. "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or* 2(2005): 193 - 218.
- Castells, Manuel.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 Chamberline,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Signs* 3(1988): 454-472.
- Chen, Chia-Hwan Eric. "Diplomacy, National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Early British-Chines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Norwich Paper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Vol 14,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y: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ntexts*. Norwich, UK: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2006.

- Cooley, Charles Hort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3.
- 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de Lotbiniere-Harwood, Susanne. *The Body Bilingual*. Toronto: Women's Press, 1991.
- . "About the her in other." Preface to *Letter from an Other* by Lise Gauvin. Toronto: The Women's Press. 1989.
- Elgrably, J. "Conversations with Milan Kundera." *Salmagundi* 73(1987):3-24.
- Erikson, Erik.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 Flotow, Luise von. "Feminist Translation: Contexts, Practices and Theories." *TTR* 4(1991): 69-84.
- . "Gender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Developments in 'Transformance'." *Textus XII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ited*. Ed. Susan Bassnett, Rosa Maria Bollettieri Bosinelli, Margherita Ulrych. Genova, Italy: Casa Editrice Tilgher-Genova, 1999. 275-288.
- .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ar of Femini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1997.
- . "Dis-Unity and Diversity: Feminis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Lynne Bowker, Michael Cronin, Dorothy Kenny & Jennifer Pearson.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3-13.
- Fowler, Roge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77.
- Genzt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Godayol Nogué, Pilar. "Interviewing Carol Maier: A Woman in Translation." *Quaderns. Revista de traducció* 2(1998): 155-162.
- Godayol, Pilar. "Frontera Spaces: Translating as/like Woman."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 Ed. José Santaemilia. Manchester, UK and Northampton, US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5. 9-14.
- Gouanvic, Jean-Marc.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Field, 'Habitus', Capital and 'Illusio'." *The Translator, A Special Issue on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1.2(2005): 147-166.
- Grayson, Jane. *Nabokov Translated: A Comparison of Nabokov's Russian and English Pro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Ed. Stuart Hall et al.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595-634.

- . “Who Needs ‘Identity’?” *Identity: A Reader*. Ed. Paul du Gay, Jessica Evans and Peter Red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5-30.
- Harvey, Keith. “Gay Community, Gay Identity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TTR* 13.1(2000): 137-165.
- . “Translating Camp Talk: Gay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Transfer.” *The Translator* 4.2(1998) : 295-320.
-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 Hewitt, John P. *Self and Society: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ocial Psychology*. 8th ed. Boston, London, Toronto, Sydney, Tokyo & Singapore: Allyn and Bacon, 2000.
- Hogg, Michael. A. and D.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 Hogg, Michael A. and Craig McGarty. “Self-categoriz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Advances*. Ed. Dominic Abrams and Michael A. Hog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c1990. 10-27.
- Hogg, Michael A., Deborah J. Terry & Katherine M. White.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8.4 (1995): 255-269.
- Holbrook, David. *Where D. H. Lawrence Was Wrong about Women*. Lewisburg/ London and Toronto: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Associated Unierity Presses, 1992.
-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2-185.
- Howard, Judith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ies.” *Annu. Rev. Sociol.* 26(2000): 367-93.
- Hunt, O. Matthew. “Identities and Inequalities: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Self and Stratification Processes.” *Advances in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Ed. Peter J. Bruke, Timothy J. Owens, Richard T. Serpe and Peggy A Thoit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
- Hyun, Theresa. *Writing Women in Korea: Translation and Feminism in the Colonial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4.
- Kadish, Doris and Francoise Massardier-Kenney. ed. *Translating Slavery: Gender and Race in French Women’s Writing, 1783-1823*.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undera, Milan. “Comedy is Everywhere.” *Index on Censorship* 6.6(1977): 3-7.
- . *The Art of the Novel*. Trans by Linda Ash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8.
- Lai, Amy. “Two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inderella Story.” *Perspectives: Studies*

- in *Translatology* 15.1(2007): 49-56.
- Lawler, Steph. *Ident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8
- Lawrence, D. H. "Cocksure Women and Hensure Men." *Selected Essay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50. 31-35.
- . *The Fox*. New York: Bantam Book, 1967.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41-56.
- . "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Ed.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0. 14-28.
- Lessing, Doris. "Foreword." *The Fox* by D.H. Lawrence. London : Hesperus, 2002.
- Levine, Suzanne Jill. "Tanslation as (Sub)Version: On Translating Infante's Inferno" *Sub-stance* 13.42(1984)) : 85-94.
- . *The Subversive Scribe: 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n Fiction*. Saint Paul: Graywolf Press, 1991.
- Li, Bo. "Transferred or Transformed? The Translation of Gay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Norwich Paper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14(2006): 69-84.
- Maier, Carol. "Woman in Translation, Reflecting." *Translation Review* 17(1985), 4-8.
- Maier, Carol S. and Françoise Massardier-Kenney. "Gender in/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6(1996): 225-242.
- Martín, M. Rosario. "Gender(ing) Theory: Rethinking the Targe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arallel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Feminism."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 Ed. José Santaemilia. Manchester, UK and Northampton, US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5. 27-39
- Massardier-Kenney, Françoi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lating Slavery: Gender and Race in French Women's Writing, 1783-1823*. Ed. Doris Kadish and Françoise Massardier-Kenney.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25
- McCall, George J. and J. L. Simmons.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 Mead, Geor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 "A Behavioristic Account of the Significant Symbol."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1922): 157-163.
- . "The Genesis of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35.3(1925): 251-277.

- Mira, Alberto. "Pushing the Limits of Faithfulness: A Case for Gay Translation."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rains and Creativity*. Ed. Jean Boase-Beier and Michael Holma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109-123.
- Moatti, Glaudiva. "Translation,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Three Aspects of Movement in History." *Classical Antiquity* 25.1 (2006): 109-140.
- Munday, Jeremy. *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 New York : Routledge, c2008.
- Ng, Sik Hung, Chi Yue Chiu, and Christopher N. Candlin.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Overview and Synthesis." *Language Matter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Ed. Sik Hung Ng, Christopher N. Candlin and Chi Yue Chiu.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4. 1-23.
-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 Rudvin, Mette. "Professionalism and Ethics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ist versus Collective Group Identity." *Interpreting* 9.1(2007): 47-69.
- Sakai, Naok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 Santaemilia, José. "The Translation of Sex/The Sex of Translation."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 Ed. José Santaemilia. Manchester, UK and Northampton, US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5. 117-136
- Schäffner, Christina & Helen Kelly-Holmes, e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c1995.
- Schwartz, Ros and Nicholas De Lange. "A Dialogue: On a Translator's Interventions." *The Translator as Writer*. Ed. Susan Bassnett and Peter Bush.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c2006. 9-22.
- Sela-Sheffy, Rakefet.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arget* 17.1(2005): 1-26.
- Sidiropoulou, Maria. *Linguistic Identities through Translation*.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4.
-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 Simpson, Hilary. *D. H. Lawrence and Feminism*. Kent: Croom Helm Ltd., 1982.
- Skryker, Sheld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Menlo Park:

- The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97-416.
- Stets, Jan E. and Peter J. Burke. "Gender, Control, and Inte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Special Issue: Gender and Social Interaction* 59.3(1996): 193-220.
- Stets, Jan E. and Peter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 (2000): 224-237.
- Stryker, Shelden. "Identity Salience and Rol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0.4(1968): 558-564.
- Stryker, Sheldon and Richard C. Serpe. "Commitment, Identity Salience and Role Behavior: Theory and Research Examples." In *Personality, Roles and Social Behavior*, ed. W. Ickes and E. Knowle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2. 199-218.
- Tajfel, Henri.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ajfel, Henri and Colin Fraser. "Social Psychology as Social Science." *Introducing Social Psychology*. Ed. Henri Tajfel and Colin Fras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 21-53.
- Tajfel, Henri and John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Ed. Stephen Worchel and William G. Austin.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86. 7-24.
- Tan, Amy.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nd Sydney: Harper Perennial, 2006.
- Thoits, Peggy A. "On Merging Identity Theory and Stress Research."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4.2 (1991) : 101-112.
- Toury, Gideon. "What are Descriptive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Likely to Yield apart from Isolated Description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James S. Holme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Kitty M. van Leuven-Zwart and Ton Naaijken. Amsterdam ; Atlanta, GA : Rodopi, 1991. 179-192.
- Turner, John C. "Some Current Issues in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ies." *Social Identity: Context, Commitment, Content*. Ed. Naomi Ellemers, Russell Spears, and Bertjan Doosj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6-34.
- Turner, Jonathan H.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5th ed. Belmont &

-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 "Local Contingencies: 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 Languag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Ed. Sandra Bermann and Michael Woo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7-202
- Wahrman, Dror. "Gender in Translation: How the English Wrote Their Juvenal, 1644-1815."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New Perspectives in British Studies* 65 (Winter, 1999): 1-41.
- Wheeler, Anne-Marie. "Issues of Translation in the Works of Nicole Brossard."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6.2(2003): 425-454.
- Wolf, Michaela. "The Female State of the Art: Women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Eds. A. Pym, M. Shlesinger and Z. Jettmarova.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129-141.
- Woods, Michelle. *Translating Milan Kundera*.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6.
- Woodward, Kath. *Understanding Identity*. London : Arnold, 2003.
- . "Introductio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1-6.
- Zhang, Kun. "I'm not a spokesperson for Chinese: Amy Tan." *China Daily*. 03/27/2007 page 5.
- Zhang, Ya-Jie. "A Chinese Woman's Response to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 Casebook*. Ed. Sau-ling Cynthia Wa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20.
- Zwarg, Christina. "Feminism in Translation: Fuller's Tasso and Günderode." *Feminist Conversations: Fuller, Emerson, and the Play of Reading*.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59-96.

中文作品

-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明之译。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巴赫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蔡骏译写。《沉没之鱼》。原著：谭恩美。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 。“序言”。《沉没之鱼》。谭恩美著：蔡骏译写。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7。
- 。“译写：一种翻译的新尝试”。《译林》2（2007）：205-207。
-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4.1（2003）：19-24。
- 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中国翻译》25.2（2004）：3-7。
- 陈赛。“互联网翻译家”。《三联生活周刊》4（2008）：108-110。
-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 段峰。“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外语学刊》2（2007）：64-67。
- 范文美译。《狐》（*The Fox*），D.H.劳伦斯（D. H. Lawrence）著。台北市：洪范书店，2005。
- 。“自由女性、互文关系和翻译（代序）”。《中国比较文学》2（1999）：110-121。
- 范祎。《剑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赫尔曼，西奥。“翻译的再现”。《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谢天振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20。
- 克莱博，伊安（Ian Craib）。《当代社会学理论——从派深思到哈伯玛斯》。廖立文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五年（1986）。
- 劳伦斯。《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 李波。“翻译研究的对话性路径——巴赫金思想与翻译研究”。博士论文。香港岭南大学，2008。
- 。“译者的隐形与在场——以严复翻译《天演论》采取的策略为例”。《翻译季刊》42（2006）：40-61。
- 李红满。“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中国翻译》28.5（2007）：6-9。
- 李红玉。“浮出翻译史地表——性别视角下新时期以来英美女作家作品翻译研究”。博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 。“性别与翻译——论翻译中的性别视角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2007）：49-52。
- 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李建春译。《狐》，D. H. 劳伦斯著。台北市：开今文化出版，1995。

- 李文静、穆雷。“翻译性别他/她者——论译者的双性视角”。《四川外语学院学报》3 (2008): 97-101。
- 刘若愚。《中国诗学》。杜国清译。台北: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7。
- 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 刘绍铭。“张爱玲的中英互译”。《到底是张爱玲》刘绍铭著。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 穆雷等。《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 穆雷, 孔慧怡。“翻译界: 男性的一统天下?——香港女翻译家孔慧怡博士访谈”。《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0.2 (2002): 108-111。
- 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外国语言文学》1 (2003): 41-44。
- 潘艳慧。“<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006。
- 舒晋瑜。“蔡骏译写谭恩美《沉没之鱼》招质疑, 谭恩美首度回应”。《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2日。
- 孙艺风译。“无题的风景”。作者: 于晓丹。《名作精译: 汉译英》。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3。164-166。
- 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4.3 (2003): 3-9。
- 。“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中国翻译》27.1 (2006): 1-10。
- 。《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汪政。“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论纲”。《艺术广角》3 (2007): 4-9。
- 王辉。“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中国翻译》30.1 (2009): 27-32。
- 王建国。“青年学生性别差异与翻译中的性别视角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6 (2005): 80-83。
- 王军。“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3.3 (2007): 140-142。
- 王立。“中国古代思乡文学主题的历时性检视”。《大连大学学报》3 (2003): 56-58。
-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 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 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博士论文。暨南大学, 2001。
- 魏小萍。“‘主体性’涵义辨析”。《哲学研究》2 (1998): 22-28。
- 文美惠译。《狐》。《狐: 劳伦斯小说(经典印象)》, 劳伦斯著。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 译。《狐》。《劳伦斯: 性爱小说》, D. H. 劳伦斯著, 赵少伟选编。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 译。《狐》。《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D. H. 劳伦斯著，冯季庆选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 。“名家推介”。《狐》，劳伦斯著，文美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5。
- 吴小勇，黄希庭，毕重增，苟娜。“身份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08）：8-13。
- 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外国语》31.1（2008）：75-82。
- 邢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中国翻译》28.5（2007）：10-15。
- 许钧。“法朗士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形象塑造”。《外国文学研究》2（2007）：117-127。
- 杨朝燕，胡素芬。“朱虹与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的女性译者主体性”。《湖北社会科学》5（2007）：118-120。
- 杨洁。“荣耀背后的文化僵局——美籍华裔女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尴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4（2008）：43-47。
- 约翰逊，D. P.（D. P. Johnson）。《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国际文化公司出版，1988。
- 詹乔。“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7。
- 张筠艇。“闽籍女性翻译家群体”。《龙岩师专学报》2（2004）：113-119。
- 张雷。“张雷谈译言网做中国维基百科贡献社会价值”。草根说网第29期：<http://www.20ju.com/content/V16643.htm>
- 张璐诗、谭恩美。“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新京报》2006年4月15日。
- 张英、谭恩美。“谭恩美：为母亲而写作”。《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日：D27。
- 赵明宇。“‘译写’是译还是写：《沉没之鱼》惹争议”。《北京娱乐信报》2006年10月11日。
- 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社会学研究》5（2005）：202-246。
- 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4（2008）：46-53。
- 朱步冲。“译言：从自发兴趣到文化逆传播”。《三联生活周刊》4（2008）：116-118。
- 朱颂。“闪光的球体：《沉没之鱼》主题的多重性”。《外国文学研究》6（2008）：83-91。